

第32卷第2/3期合刊

總第219期

2005年11月30日出版



堅拒政改方案 齊心爭得普選

歡迎各國民間組織來港反世貿！

中國的生態危機——兼論現政權的性質

資本主義在今日中國

史學界平反「中國托派是漢奸」錯案

關於委內瑞拉的決議

曼德爾關於向社會主義過渡的理論

堅拒政改方案 齊心爭得普選

本刊評論員

「新的特首」會同他委任的政務司長許仕仁，在上任不久推出第五號政制改革報告書。正如廣大社會人士和民主派所批評的，它完全拒絕了07、08雙普選的港人民訴求，連實行普選的時間表和方向路線圖也沒有。反而維持委任制，將會部分地由他所委任的人選他為另一屆的特首。像這樣毫不民主的倒退方案，理所當然要激起廣大港人（包括民主派人士）的憤慨、反對。

官方辯護說，方案已表現出香港民主的大進步。例如，將選委會人數由800增加到1600，並加入全部經選舉產生的同委任的區議員為選委，但實際上，這依然是小圈子選舉，人數增加並不能把不民主變成民主的本質上改變。

它又建議立法會議席增加10席，其中5席由直選產生，另外總共6個功能界別議席則由全體區議員（內包括委任區議員）互選產生。假若選舉制度不變，則現時已在區議會內佔有多數的民建聯等保皇派，就很可能經此增加其席位。由此可見，非由港人普選產生議員的方案，就並不是真正民主的。

曾特首及其支持者侈言這個方案得到大多數港人支持，代表主流民意，並以初期的一些民意調查結果為證。其實，這只是表面上的數字，表示接受方案的人，其中很多人是迫於無奈接受，因為覺得07、08年雙普選已被人大常委會在去年專橫地否決了。舉例來看，中文大學在方案公布後一週進行的民調顯示，雖然有近6成人接受，但其中「欣然接受的」只有32.8%，而「無奈地接受」的則有27.7%。而且，對於雙普選何年落實的問題，覺得應在07、08年的仍有34.2%，在2012年的則有34.8%，兩者相加便顯示有近7成人贊成在近期7年內實行雙普選；又有65%受訪者認為，現階段應為雙普選訂定具體日期，更有8成多人認為實行普選對香港有好處，認為沒有好處的只得10.2%。

與此同時，《明報》選取政府早前所作民調的一些主要問題再作調查，發現方案支持度急跌11個百分點至44.18%，而《明報》的另一民調亦發現，多數受訪者不贊成委任區議員可以選舉特首或立法會議員，更有逾半數人要求政府提出普選時間表。

隨著時間的延長，市民對方案的支持很可能會再減，要實現民主普選的訴求會再度揚起。事實上，近幾年的大遊行，已經由港人用行動表達出這種強烈的

訴求了。曾特首本人已在第4號報告書收集意見時表示，當中有很大部分是支持07、08年普選的。他在美英推銷政改方案時，也一再大言不慚地說：「個人來說，我支持香港盡早推行普選」，「越早普選越好」。這些表態正反映民意壓力的強大。但他只是想以此來投機取巧，哄騙港人，否則就絕不應推出如此不民主的倒退方案。

他還威嚇說，如方案不獲通過，不但本港民主會原地踏步，更會毀掉香港與中央的互信。這話的潛台詞透露出，港府曾經承諾依照京方的指示推行這些方案。

京方的意見反映在英文《中國日報》的署名文章中，文章指若政府在政改5號報告書中訂下普選時間表，是違反《基本法》及「不現實」的做法。這又是官僚慣用的扣帽子手法，京官懼怕香港倘若實行普選，將可能引起大陸同胞的響應，群起要求普選。國務院最近發表的《中國的民主政治建設》白皮書洋洋3萬多字，卻不見「普選」一詞，這表現出北京對普選的態度，與中國現任最高領導人所許諾的「以民為本」和「新三民主義」是相違背的。

這樣就又一次證明了：民主權利不是靠統治者恩賜、施捨，而是要靠人民發揮力量方能爭取到的。現在，民陣和立法會民主派已號召港人在12月4日上街遊行，表達反對這個不民主方案的訴求。主要的宗教、教育、社工等界別團體也加以響應，並呼籲大家屆時參加遊行，以清楚明確地表達人民的民主訴求。

另一方面，現時立法會已有24名議員聯署及登報反對小圈子選舉，要求07、08年全面普選。如果他們都能繼續堅守這一原則立場，始終抗拒當局的威迫利誘分化，而在立法會表決5號報告書時投反對票，就可使政府的方案依法得不到通過。加上其他的立法會以外各種反對行動，就會匯合成一股洪流，像03年7.1的50萬人大遊行阻止了「23條惡法」那樣，再寫下港人又一次勝利的篇章。只要港人齊心協力，再接再厲，就可能促使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決議改變「4.26」的否決態度，爭取到最近期的普選時間表和路線圖的方案，取代現時政府的假民主建議。

2005年11月10日

歡迎各國民間組織來港反世貿！

微波

今年12月中旬，世貿部長級會議將在香港灣仔的貿易中心舉行。各國民間組織及人士也針鋒相對地準備向港府申請來港，以反對世貿會議之推行資本主義全球化、加劇貧窮的全球化。據說人數可能超過一萬人，包括韓國的農民。

美國一直利用世貿組織在經濟上壓榨發展中國家，訂立許多只對工業國八強（尤其是美國）有利而對貧窮落後國家不利的規則條例，例如，保護它們的昂貴產品享有長期專利，用配額來限制落後國家的低廉產品「傾銷」，它們的工、農業產品則得到國家大量補貼以壓價傾銷，使得發展中國家和地區的工、農業產品無法與先進國的產品競爭，因而發展停滯不前，以至破產倒閉，工人大量失業，農民更加困苦。因此，美國等國把資本主義推向全球化，就等於製造全球的貧窮化，必然激發起各國人民的強烈反對。這也就是各國民間組織，尤其是韓國、菲律賓等國農民此次要到香港來反對世貿會議的原因。

世界各國民間組織許多年來都很積極地集會遊行反全球化。今年7月上旬在蘇格蘭舉行了對抗八大集團峰會的民間反資本主義的運動，取得了重大的成功。這一另類的八大峰會（G8A）是各政黨、工會、教會團體、非政府組織和人士的廣泛聯盟，來自世界各國，有數千人參加集會和遊行，反對資本主義製造貧窮的全球化，要結束貧窮的歷史。去年以及較早前，在美國、拉美或歐洲等城市都舉行過規模巨大的反全球化示威遊行、集會，表現出人民的偉大力量，以及民間反全球化運動的此起彼伏，持續不斷。

香港特區政府對於世貿部長級會議在香港召開，自然極之高興，無任歡迎，認為對香港有益，可提高香港成為亞洲金融中心之一的地位，因此招呼週到。而對於各國民間反全球化組織及人士來港進行活動，卻絕不歡迎，但又不能完全拒絕他們入境，而只能找些藉口拒絕其中部份人士來港。保安局長宣稱，「當發現入境者會對公眾利

益構成不利」的時候，港府有權拒絕「好戰份子」入境。這樣，就是向國際社會暴露港府的侵犯民主自由和人權，不但不能像港府官員預料那樣可提高香港的國際形象，反而會有所損害；且可能有人以司法覆核挑戰入境處。

保安局長又表示，會根據《公安條例》在年底世貿部長級會議進行期間，將會展一帶納入禁區，而事先會交由立法會批核。香港人權監察主席何秀蘭擔心，如果政府拖延至12月才將有關建議提交立法會審理，由於會議已經要進行，屆時議員就算想在28日內提出反對，亦無補於事，「（政府的）任務完成，卻損害本港的法治精神」。

在安排民間團體的示威集會地點方面，港府負責人又採取拖字訣，要到11月，即世貿會議舉行前一個月，才可定出；也不肯協調遊行路線，並且列出距離世貿會議很遠的修頓球場和維園，作為非政府組織活動集中地。這兩個地方都遭到當地區議會的反對，認為距離會場太遠，示威群眾看不到會場，會激化不滿而走到鬧市的街道上，大大影響當地的交通。民間組織提出改在灣仔碼頭巴士總站和灣仔運動場，但當局沒有答應。當局以盡量不給予民間反全球化以方便，來討好和幫助世貿組織，用心和做法應受到各國和香港人民齊聲反對和指責。

後來，特區政府有關負責官員曾俊華，在非政府組織成員與世貿總幹事拉米舉行圓桌論壇時，不肯在約定時間與請願者會面和接信，反而從側門溜走；於是請願者轉向拉米，不滿他在論壇上侈言世貿功能是「創富」而非「分富」，包圍他的車，有人更跳上他的汽車頭，在他出來接了信後，群眾才讓他離去。這次風波可說是曾俊華的處理不當釀成的。政府官員應從中汲取教訓，避免激化群眾的情緒。

2005年10月17日

阻止當局偷聽竊密 維護市民私隱等權利

振言

香港政府從港英時代到回歸以後，各部門都實行秘密偷聽市民電話、偷拍、拆看私人信件等胡作非為，嚴重侵犯市民的自由權利（包括私隱權利），簡直到了無法無天的地步，被侵犯的市民（特別是政治上持異議或從事政治活動的市民）都會感覺是生活在白色恐怖之中，生命安全毫無保障，當局也是公然違反《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和香港《基本法》保障的人民有權行使各種自由權利的規定。

直至今年4月底及7月初，香港區域法院才先後對兩宗不同案件都裁定廉署以偷拍和竊聽手法蒐集證據為非法，判廉署敗訴，並提醒廉署以後不得再以偷錄取證，否則就是蓄意違法。

可是，上任才一個多月的新的特首，卻越過立法會的權力，簽發行政命令規管秘密監察。這個做法表現出他要實行「強政勵治」的鐵腕統治，也自行揭破了他想學胡錦濤標榜「以民為本」的偽善，因而立即引起了強烈反對。

香港大律師公會發表聲明指出：《基本法》只賦予特首行政管理權，特首無權力授權秘密監察；這項行政命令是意圖將一項非法行為定為合法，分明是訂立法律；特首可能在未經許可情況下行使立法權；對特首無透過立法規管秘密監視深感失望。

資深大律師李志喜也以《監控耳目無所不在》為題撰文，批評政府「這項命令」由行政長官根據《基本法》第48條（4）頒布，有關條文賦予行政長官發布行政命令的權利，但行政命令並非法例，只是行政措施。行政措施無權褫奪公民的基本權利和自由，亦不能令不合法的活動變為合法授權。」

「九七年香港主權回歸前，立法局通過了一條《截取通訊條例》，旨在為截取以郵遞或透過電訊系統傳送的通訊提供法律監管，並廢除《電訊條例》第33條。該《截取通訊條例》已列入香港法例第532章達八年之久，但迄今仍未（批准）生效。」

「假如《截取通訊條例》已經生效，上述（電訊）條例中賦予行政機關的廣大權力便會宣告廢除。」

政府頒布了這項《行政命令》，是要「為執法機關提供一個藉口，不管合法不合法也繼續他們一貫的做」。〈轉引自8月13日《蘋果日報》《論壇》〉

律師會會長羅志力也批評：「行政令不符《基本法》30條」。「特首令的法律效力受到質疑」。

港英當局為了維護英帝殖民主義者的利益，打擊和鎮壓港人的反抗，在這以前便訂立了《電訊條例》，賦予港督幾乎沒有任何限制的酌情權，授權政府官員截聽電話通訊。這條例源自英國相關的法例，後者已遭歐洲人權法院裁定為違反歐洲人權公約中關於私隱的保障。英國也在1987年修訂了《截取電訊法》，卻不適用於香港。到1997年，涂謹申提出私人法案，並成功由立法局通過《截取電訊條例》。但通過至今8年，特首仍沒有指定生效日期。在壓力之下，便推出行政命令，企圖轉移公眾視線。

這項命令遭到社會各方面（包括法律界、輿論、民主派等）的反對、抨擊。其中立法會議員梁國雄（長毛）更連同四五行動成員古思堯，入稟高院申請司法覆核。

梁在申請書中指出，他多年來活躍於本港的政治及示威遊行活動，被視為「反政府分子」。梁相信自己一直被香港政府及相關組織監察，除了多次被跟蹤之外，其辦公室、住所以及電話均被監視及盜聽。

梁要求法庭裁定有關行政命令屬違法及無效，下令撤銷，並要求行政長官就1997年通過的《截取電訊法》，定出正式生效日期。

在社會上廣泛反對之下，保安局局長李少光被迫轉口表示：政府計劃下個立法年度就偷錄偷拍等秘密監察行動建議立法，也準備同時為俗稱「勾線」的竊聽電話等截取通訊行為，提交立法建議。

儘管如此，民建聯副主席譚耀宗仍曲意替政府辯護：現時有行政命令，相信會對執法部門有幫助。問到應否規定部門在進行秘密監察前，需向法院申請，譚耀宗稱，政府需要詳細解釋向法院申請的技術困難，他說：「那麼多部門，是否每次都要到法院申請？」（8月7日《明報》）這又一次表現出保皇黨人的媚主本色！

經過「7·1」大遊行、反23條立法勝利的香港人民，將會繼續努力，成功爭取到阻遏當局非法竊聽、盜取通訊等胡作亂為，從而維護市民的應有權利！

2005年9月30日

對自然環境的大規模破壞：

中國的生態危機

——兼論中國現政權的性質

喬治·菲殊著

兆立譯

外交事務委員會高級研究員依可諾咪女士（以下簡稱「依女士」）在這本討論中國生態危機的書的第一章中，就清楚詳細地描述了2001年7月底影響淮河的污染危機。淮河是中國東部在黃河和長江之間的主要水道。

當380億加侖以上的高度污染的水流入淮河以後，河水確實變黑了，農業、漁業給摧殘了，污骨症肆虐，其長期後果無可計量。淮河的水連供工業及農田灌溉之用都不行，更不必說給人類和動物飲用了。

中國官員對淮河這個危機的反應，正像他們自從毛澤東時代以來對待其他環保危機一樣，是緩慢、猶豫和半心半意的，所以淮河及其肥沃流域的命運，到現在為止依然是不確定的。

但是，正如依女士在《河裏流著黑水》書中較詳細地指出的，因中國領導層大力追求它所定義的“經濟發展”所引起的較大生態危機和環境惡化，由來已久，而且正在繼續。這個“經濟發展”所引起的中國環境惡化是否將會受到探討，更不必說受到糾正，是非常令人懷疑的。上層的美麗詞藻和主動力常常因地方及省級官員執意維持他們從“發展”中得來的特權而變得毫無意義；而且儘管政治上有所開放，工人、農民和知識份子仍被要求對上級服從和保持靜默。

對生命及發育的威脅

隨著中華人民共和國拋棄了它以前的經濟上的自給自足政策轉而積極地向世界資本主義市場“開放”，也隨著工業化和新的經濟方案以忙亂的步伐向前進——中國的國內生產總值有了快速的增長。

可是，正是這個經濟增長之是否切實可行、是否能夠保持一定速度，現在因為當局一直容許對自然環境的損害而成為問題。正如依女士在本書第一頁上說的：“今天，自然環境正開始對中國人民造成傷害，正開始阻礙經濟的繼續發展，正開始強迫人民進行大遷移，而且正開始對人民的健康造成巨大損害。”

其實，依女士在《河裏流著黑水》的開頭部份，就列出了幾個已因狂亂地，據說是非依據意識形態地著重“經濟發展”而引起的生態問題。

對自然的損害包括：

- 長江及其他主要河流重複出現的、失控的洪水泛濫；
- 沙漠化的擴大，致使現在中國十分之一的土地變成沙漠，而且逐漸吞噬了越來越多的可耕地，造成北京及其他北方城市的天空因重複出現的沙暴而變暗；
- 嚴重的、越來越多產生的缺水現象；
- 森林的日益縮小，多數現有森林區因非法砍伐而繼續縮小；
- 以及巨大的、日增的人口。中國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但可耕地從開始就不足、而且遭受繼續不斷的污染和自然環境惡化。

依女士有點是一個認為通過自由市場就可以改善人民生活、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的社會改良者，雖然她不迷戀毫無節制的市場經濟。她雖然承認，中國從1976年開始的“經濟改革”——這個“改革”使中國的經濟增長轉向到依靠市場力量，而且不管社會損失有多大，融入到世界資本主義經濟中去——是釀成中國目前生態危機的一個主要因素；她也認為，這同一的以市場為主要導向的做法，也能夠成為中國解決其生態危機的方法。

在依女士對中國生態危機的這個解決方法中，除了她希望中國能對它的專制政治結構進行更廣泛的非意識形態的民主化以外，所缺乏的是人民大眾的反應，這個反應最終會達到徹底的經濟和社會的革命。她設想一個“非意識形態的”、由技術專家掌權的方法，這個方法把世界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以及中國之參與其中，不但看成為永恆的“已知事實”，而且看成為上帝賜與中國及世界的東西。

以市場來解決一切問題嗎？

在這方面，她把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和外國資本家投資者向某些環境保護措施提供資金、向中國提供不會產生污染的技術，再加上中國官員對環保規章採取較認真的態度等等，作為值得支持的事情，又把市場作為一個非意識形態的技術工具來加深對生態問題的關心。

在這一點上，依女士倒沒有像從1976年開始的、從鄧小平一直到當今的胡錦濤主席和溫家寶總理等中國“經濟改革”領導人那樣的著迷，因為中國這些領導人幾乎完全把市場本身作為目的那樣來利用、繼續利用市場為促進經濟增長的手段。

獨立的環保機構是在“經濟改革”開始後的二十多年以後才在中國政府官僚機構中成立的。在那以前，環境保護一直在經濟發展部和對外貿易部的控制下，而且仍舊易於受到它們的反對。

中國代表們在聯合國各種關於環境的會議上，總是堅持主張，全世界的人對於中國的污染和環境惡化的關切其實是西方經濟發達國家的詭計，其目的是要阻礙第三世界的經濟發展，而且使它一直處於依賴的地位。

雖然依女士也立即排除中國的這些反對之詞，她卻沒有注意到其中所牽涉到的半真半假的陳述，即西方資本主義經濟的增長最先產生世界污染危機。不過，她正確地注意到中國的領導層認真地對待世界對中國的污染和環境惡化的關切，是從1992年里約熱內盧會議開始的。

基層民眾的積極綠色活動

依女士也以讚許的口吻，廣泛地記載了中國日增的綠色運動，一個由公民、非政府團體所組成、已被准許存在、但有時得到官方的贊同、有時受官員的騷擾的基層民眾運動。這個運動已帶頭促進公眾對中國生態危機的認識，進行反對某些較明目張膽地對環境誤用的行動。

從政治角度來看，這個綠色運動包括各種人物，從注重回收利用和其他減輕作用的環保措施、真正不談政治的人，到把中國政府之忽略環保與在中國的政治過程中之缺乏民主聯繫起來的積極份子。中國的政治過程仍舊是專制主義的，儘管在胡錦濤的帶領下官方做法有“透明化”的趨向，而且與毛澤東時代比較起來，有相當大的寬鬆。

依女士也注意到，以經濟發展的名義對環境的忽視，不但在日期上早於1976年的“經濟改革”，或者甚至在1949年革命以後毛澤東和中國共產黨的統治。這個對環境忽視的觀念也是深深植根在傳統的中國文化和精神氣質中的。

儘管道教和佛教著重人與自然的調和，佔統治地位的儒家思想卻認為，自然只是一個工具。人類選擇怎樣利用它，就怎樣利用它。在這裏，人是主動的，自然只是一個被動的工具。孔夫子的這個思想，在毛澤東的統治下，被給以共產主義的面目；這個新面目，在1976年的“經濟改革”開始以後，仍被沿用。

所以，對自然環境的關切，在中國人的思想中，在四千多年之久的中國文化中，一般說來，是一個新現象；這種關切，不但在中國的官場上，而且在中國人民中間，決不是普遍有的。

以上的一切，我已扼要地提出，在《河裏流著黑水》一書中，詳細說明、列舉和用豐富的中、英文資料和與主要人物的訪談來加以證明。它也以如此的方法來陳述，以致使非中國問題專家可以了解，使中國問題專家得到豐富的資料。

一個更廣闊的看法

在緊接著最後的有極大吸引力的一章中，依女士說明了中國的生態危機與在東歐、蘇聯“已存在社會主義”的指令經濟及在東亞、東南亞的發達資本主義經濟（南韓、日本、台灣、馬來西亞和新加坡）所發生的生態危機有相似之處。

她說，這些危機的發生，都是由於精英份子在選擇經濟發展的道路的時候，沒有對他們的公眾負責。她注意到，正像與今日中國一樣，東歐、蘇聯的指令“社會主義”經濟和東亞、東南亞的自由市場發展經濟都一直缺乏透明度、缺乏民主、缺乏它們的普通公民在政治上參與經濟政策和發展的各種決定。

像在中國那樣，不受限制的污染和環境惡化，不達到災難性的程度，是不會有人管的，因為“社會主義的”和資本主義的精英份子，喜愛和受惠於只注重國內生產總值和各種工業計劃的“成功”的經濟增長，不能夠受到普通老百姓的監督，他們也應該從這些經濟進步中“得到利益”的。

夠有趣的是，依女士對於東歐的綠色運動，怎樣破壞“已存在的社會主義”的整個穩定，談了很詳細。因為參與非政治性的環保活動是唯一被准許的參與形式，進行其他改變的政治欲望就偷偷摸摸地在這些環保運動中蓬勃發展了。

依女士看到同樣的過程在今日中國的綠色運動中不斷地發展。在這些運動中，有些環保積極份子公開地把生態的繼續惡化跟民主化和政治參與等問題聯繫起來。

不能確定的前途

在最後一章中，依女士為中國生態的未來，定出了三個可能出現的情況。她認為，在目前，在這三個情況中，出現任何一個的可能性是均等的。

第一個可能出現的情況是：為了促進經濟的發展，生態惡化繼續加重，以致也許隨著生態損害之無可挽回，生態惡化猛烈向這種發展踩煞車。

第二個情況是：“中國的綠化”和生態意識終於在中國政治和經濟民主化過程中的加深，也許再加上像上海市長所領導的綠化活動那樣的地方綠色計劃的成功傳佈。在這裏，上海市長曾經成功地領導了將上海這個無計劃地擴展、世界上污染最嚴重的城市轉變為一個綠色城市的工作。

第三個情況是：目前不穩定現狀的繼續。那就是說，官方在不惜任何代價地促進“經濟發展”的大前提下只猶豫不決、半心半意地催促大家關心生態，但人民大眾的聲音仍被壓抑。

那末，在《河裏流著黑水》中詳細描述的中國生態危機，對我們這些主張面向平民民主的社會主義者有甚麼意義呢？首先，我們應該知道，生態的問題是與社會、經濟和政治的問題分不開的，後者不解決，前者是不能完全解決的。

因此，期望中的中國綠化，是與在中國的工人、農民和左派知識份子的支持下在中國完成社會主義革命分不開的。

一個不穩定的混合物

這就導致在左方的我們現在要探討一下中國目前的政權的性質了。依本文作者的意見，這個性質仍是up for grabs〔美國俚語，“人人都可爭取得到”之意，在這裏，暫譯為：沒有最後決定——譯者註〕，因為中國現在是在不穩定的半途之中。最重要的市場社會主義理論家David Schweickart認為今日中國是一個“專制的市場社會主義”，而對毛澤東主義派和一些其他的非毛派的理論工作者（例如，張開在美國《逆流前進》雙月刊第113期〔張開原文刊在《十月評論》第215期〕）而言，中國已經“恢復了資本主義”〔譯者註：譯者查看了張開原文，只發現他說“中國的資本主義復辟正接近全面地完成”。兩者意思是否差不多，請讀者自己判斷。〕

本文作者認為今日中國在基本上是一個專制的、在中國革命1949—1953年新“民主主義”時期佔優勢的那種形式的經濟混合物。它是公共和私人經濟專業的一個混合經濟，儘管是一個已向世界資本主義市場“開放”、不是被冷戰時期的敵對和孤立所強迫進行的那種自給自足的混合經濟。

其實，中國領導層“開放”中國的同時，西方資本主義列強也向中國“開放”，當然後者的意圖是把中國及其廣大的市場潛力融入世界資本主義市場制度。

在這裏，只要提出以下指出的就夠了：雖然中國經濟的國有企業部門因這些公司之被出售而繼續收縮，這個部門大多數企業本來就是無效率的經濟累贅。還有，多數中國公司是合作社式聯合——股份企業，其工人本身是該公司的股東，而所有在中國的外資企業，都需要與中方單位合股。

當然，在中國官方所稱的“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中，含有很多資本主義剝削的成份。但是，對本文作者來說，光是爲了那一點而說中國是“資本主義”，就像我們宣佈瑞典是“社會主義”一樣。

無論如何，我們這些“從下面來推動的社會主義者”從來不認為國家所有制本身是用來決定某國是否社會主義的特徵。對我們來說，社會主義總是包含了整套與解放有關的關係。這些關係必定是經濟的，也是社會的、文化的和政治的。我們贊同馬克思、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對社會主義的定性，說它的意思是一種社會安排，在這種

安排中“每個人的自由發展便是所有人自由發展的條件”。

斯大林否定了這個定性，把以下的觀念當作聖言：社會主義只意味著一件事，那就是“正確的經濟關係”。可悲的是，太多的反斯大林主義的社會主義者像斯大林主義者那樣，不加批評地吞下了這個靈丹妙藥。

其實，當我們考慮例如中國領導層之臭名昭著的寵物工程、那個以在長江上建築破壞中國無價的文化遺產、破壞環境的水壩來創建巨大的蓄水池和水力發電廠的三峽水壩工程——一個使中國及非中國人都義憤不已的工程——的時候，我們就以最懷疑的目光注視中國領導層所追求的“經濟改革”。

但是我們也以最懷疑的目光注視像Robert Weil那樣的毛澤東主義者。他在《紅貓，白貓》一書中，在批評中國“經濟改革”的同時，卻讚美毛澤東領導下的所謂“適度的經濟增長”。甚至在三峽水壩開始動工的很久以前，毛澤東所領導的“經濟改革”也意味著巨大醜陋的怪異——像大躍進、文化大革命那樣的專制主義的、受政治操縱的、突然向暴力傾斜的舉動。

這些災禍，不但不能產生“適度的”或非適度的“經濟增長”，而且在它們之後，留下要好好收拾的經濟、政治和社會的爛攤子。我們之作爲承諾支持平民民主、平民參與的社會主義者，決不把自己局限在接受這一個或那一個“主流”範例以作爲唯一可能的範例。

我們既拒絕接受“社會主義”只是由高層領導人所公布的東西的觀念，也拒絕接受經濟發展只能在資本主義的支持下發生的信條。而在我們拒絕接受的時候，我們注意到昨天在東歐、蘇聯只知道從上面向下面發號施令的“社會主義者”卻變成了明天的資本家。

中國向何處走的問題，對我們來說，在實際上和在理論上，都是一個重要問題，因爲它的確提出了關於任何形式的集體所有制的可存活性和可行性的實際、理論的問題，不只是關於社會主義的可行性問題，因爲社會主義應該是民主的。

所以我們必須密切關注中國的各種發展。特別地，我們應該密切關注中國的生態危機及新興的綠色運動。我們不但要對中國，而且要在所有政治工作中，要求綠色運動的紅化和紅色大地的綠化（the Redding of the Green and the Greening of the Red），而且爲這兩種變化努力工作。在這樣的工作中，我們就會發現依女士的《河裏流著黑水》有價值而且有豐富的資料。〔譯自《逆流前進》雙月刊，第116期，2005年5、6月號〕

註：本文所評論的書名：《The River Runs Black: The Environmental Challenge to China's Future》《河裏流著黑水：環境對中國前途的挑戰》，作者：Elizabeth C. Economy（依可諾咪女士）

資本主義在今日中國

張開

筆者在去年4月，曾經撰文評論人大會議對憲法保護私有財產權和繼承權的修正，「顯示中共要不遺餘力地推行資本主義，反映出中國的資本主義復辟正接近全面地完成。」並具體指出資本主義在中國的實際發展情況，表明中國還沒有全面恢復了資本主義制度。一年多以來的具體表現，仍在持續朝這方向發展中。

非公有經濟獲得大力支助和發展

國務院於今年2月24日發佈了《關於鼓勵支持和引導個體私營等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的若干意見》，明確提出了7個方面的重要政策優惠措施，清理和修訂限制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的法律法規和政策，消除體制性障礙。具體的措施包括：

一是放寬市場准入，公平待遇。允許非公有資本進入法律法規未禁入的行業和領域，並在進入壟斷行業、公用事業、基礎設施、社會事業、金融服務業、國防科技工業等領域明確了改革方向和措施。

二是改善金融服務，加大財稅支持。具體表現在加大各類銀行信貸支持力度，同時，亦將完善有關財稅支持政策。

三是發展社會中介服務，完善社會服務體系。

四是維護非公企業和職工的合法權益。

五是引導企業提高自身素質。鼓勵有條件的企業做強做大。……<1>

在中共這樣大力支持幫助下，非公有經濟的發展更突飛猛進。在這之前，非公有經濟在行業分布上以輕工紡織、普通機械、建築運輸、商貿服務等領域為主，現已開始向重化工業、基礎設施、公用事業等領域拓展。據統計，在40個工業行業中，非公有經濟在27個行業中的比重已超過50%，在部份行業已經佔到70%以上。

市場經濟的擴張

國務院在04年中，實施了《關於投資體制改革的決定》，就是要充分發揮市場配置資源的基礎性作用，實行政企分開，減少行政干預。要按照“誰投資，誰決策，誰收益，誰承擔風險”的原則，改革投資管理方式，保護投資者的合法權益，營造有利於各類投資主體公平、有序競爭的市場環境。這是建立和完善市場經濟體制的一項重要措施。在這樣盡力的推

動下，市場（商品）經濟更加如虎添翼地發展起來。

中國的市場經濟化進程，從以下的一份報告可具體見到。這份《2005中國市場經濟發展報告》，是北京師範大學經濟與資源管理研究所承擔的國家社科研究基金重點項目和商務部委托研究的項目，對中國2002—03年的市場化進程進行了詳盡的分析。

《報告》認為，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以來，中國經濟在完善市場經濟體制的諸多方面取得了新的重大進展：

第一，政府行為更加規範。

第二，經濟主體更加自由化。國有企業的公司制改革取得新進展；03年，非國有經濟創造的增加值佔GDP的比重為69%。

第三，各種生產要素市場化程度顯著提高。勞動力流動明顯加快，招標、拍賣、掛牌出讓面積佔出讓土地總面積的比重由01年的7.3%增加到03年的28%，資本交易市場體系和規則日益完善。

第四，貿易環境更加公平。貿易主體多元化格局已經形成，進出口貿易的關稅和非關稅壁壘不斷減少。

第五，金融業對外更加開放、競爭更加劇烈，外資金融機構數量大幅增加，利率市場化加快。

《報告》認為：上述結果表明，中國市場經濟程度不但已經超過了市場經濟臨界水平（即市場化指數為60%），從總體上看毫無疑問地屬於發展中的市場經濟國家；同時，也表明中國加入WTO後的兩年內，已更深更廣地融入全球市場經濟體系。

《報告》還對02—03年的市場化程度進行了測算。結果，02和03年我國經濟的市場化指數分別為72.8%和73.8%，高於01年的69%。<2>

私人資本的積累

私營資本家致富的手法之一，是勾結、賄賂官員或國企管理人員，以很低價格廉買國有資產。許多國企管理人員也利用職權，化公為私，侵吞國企財產。根據大陸官方研究機構的保守估算，國企資產每年流失約4百億人民幣，還有不斷上升的趨勢。近期懷疑侵吞國資的典型例子，是7月底被捕的新進富豪、格林柯爾董事長顧雛軍，他收購4家公司時，都以自己

一手泡製的公司大幅度虧損為由，壓低收購價。〈3〉

另一種手法是串通官員，利用當局實行土地出讓制度之後，經過協議的方式獲取大量土地的使用權，再進行房地產開發，最終成為富豪。“上海首富”周正毅是典型的事例。他被指通過違規手段，強迫遷拆民間房屋園地，奪得上海市中心“東八塊”的土地，炒賣土地，一夜致富，也因而被捕繫獄。〈4〉

民間資本在市場經濟蓬勃發展中迅速積累、壯大，數量日益大增。單以浙江省溫州市為例，據人民銀行溫州市中心支行的調查顯示，2004年末的民間借貸資金規模為410億元。作為一種自發的民間資金運作方式，溫州民間資本規模超過了3千億元，民間融資已經成為當地部分中小企業取得流動資金和建設資金的一個重要渠道。〈5〉全中國有2百多個直轄市和市，加上2千多個縣，全國私人資本的數額便難以統計了。但其總額遠遠超過國有資產現有10萬多億元，則是肯定的。

由於民間資本的活躍，往往以高利貸的手法殘酷榨取中下層和窮人，溫州市政府要加強對民間融資的管理，規定個人借貸利率超過人民銀行公布的金融機構同期、同檔次貸款利率4倍以上的，即是高利貸行為，其超過的高息部分不受法律保護；同時繼續對金融「三亂」保持打壓態勢，禁止開辦地下錢莊，控制互助會規模，打擊「拾會」等詐騙活動。〈6〉由於民間融資的趨利性，「潛伏著較大的經濟風險和社會風險」，這是當局要出上述規定的原因，也可見資本主義在這方面發展的危害性之一。

《物權法》的作用

《物權法》一方面重申了憲法中的規定：「國家維護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另一方面又對憲法中規定的保護私有財產權，作出了詳細而具體的表述，以便有效地加強保護。在它關於所有權的一般規定中，第47、48、49條都將國家、集體和私人的所有權同列一起，相提並論，地位似乎是完全平等的。

對於多年來時常發生的官民之間的紛爭，《物權法》新增了規定：「國家保護私人的所有權。拆遷、徵收私人的不動產，應當按照國家規定給予補償；沒有國家規定的，應當給予合理的補償，並保證被拆遷人、被徵收人得到妥善安置。」「禁止以拆遷、徵收等名義非法改變私人財產的權屬關係。違法拆遷、徵收，造成私人財產損失的，應當依法承擔民事責任和行政責任；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不過，儘管有如此的規定，實際的結果仍然是弱勢平民敵不過財雄勢大者，尤其是黨政官員。被迫遷拆所得的賠償，總是遠低於實際應有的價值的。即使可依法訴之於法院，但諷刺的是，僅僅在《物權法》草案公佈徵求全國人民意見之後，由8月11日起，被拆

遷戶若要通過法院維護權益，將要先通過「政府仲裁」的關卡。最高人民法院發布司法解釋稱，全國各級法院將不再受理當事人因不服拆遷補償安置協定而提出的民事訴訟，不滿徵地拆遷日後只能向政府機關申訴。有學者批評法院推出新解釋只為「減輕工作量」，並勢將會加劇社會矛盾。

新浪網一篇評論文章批評，法院有關拆遷訴訟的解釋與以上（《物權法》草案）條文有衝突，更指出：「徵地拆遷主體多半是地方政府（或者有政府支援的發展商），被拆遷者對拆遷有意見只能到政府機關去申訴，政府豈不既是運動員，又是裁判員？與虎謀皮，公平、正義從何談來？」〈7〉

這顯示出，《物權法》雖然對一般的私有財產明文予以保護，但弱勢平民僅有的一點物權卻得不到真正保護。

國有財產日益減少

北京至今堅持以公有制為主體。所謂「主體」就是主要部份。國務院研究室課題組解釋：公有制經濟不僅包括國有經濟和集體經濟，還包括混合所有制經濟中的國有成分和集體成分。公有制的主體地位主要體現在公有資產在社會總資產中佔優勢；國有經濟控制國民經濟命脈，對經濟發展起主導作用。公有資產佔優勢，要有量的優勢，更要注重質的提高。我國國有及國有控股企業的資產總額2004年末比1997年增長71.9%，達到10.16萬億元；實現利潤增長11.4倍，達到5312億元。另一方面，目前全國經濟增量的一半以上來自非公有制經濟，城鎮新增就業崗位90%以上是個體、私營等非公有制企業提供的。〈8〉

中共要對國企實行改革，理由是要創立新的制度，以革除制度弊端和缺陷，即是在大型國企中建立現代企業制度，即股份制，讓境內外民間投資者買入國企股票，成為國企的股東，共同過問國企的經營管理，等於部分地把國企變質為私營企業；或者是國有資本、集體資本、非公有資本等參股的混合所有制；對於其他的大中型國企進一步做好政策性關閉破產工作，到08年全部解決大中型困難國企退出市場，即把這部分國企完全消滅；對中小國企則採取多種形式放開搞活，即放棄它們，讓它們自生自滅。據國資監管會主任李榮融在今年6月中說：全國一半以上需要退出市場的國有大中型困難企業和資源枯竭礦山已關閉破產，目前，全國國有及國有控股企業共有15萬戶，其中中小型為14.7萬戶。這即是說，大型國企只有3千戶。

在李榮融如此表示之前不久，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陳清泰便已透露：國有企業正面臨第二次改革，大方向將會是整體上市，而非現行將優質資產分拆上市的做法。他預計未來國有資本佔內地生產總值

的比例將逐步減少，將由目前的約 1 / 3 降至 20 %，惟未有披露時間表。〈9〉 這不會只是他個人的意見，而會是官方立場的反映。托洛茨基認為，前蘇聯成為工人國家（雖然是墮落了的）而非資本主義國家的重要條件，是她的國有財產制。從這個觀點看來，如果中國的國有財產制（加上集體財產制）已不再佔優勢的主體地位，則構成中國為工人國家的重要條件也會被淡化，因而會被認為已恢復為資本主義國家了。

既然國有企業要減到如此少的比重，則它同集體經濟等合成的公有制經濟，又怎能擁有量的優勢，繼續佔主體地位呢？而由於民間私有資本日益雄厚，加上外資湧入，已有資金可用合資、收購等方式佔有國有經濟（只要當局「放開」的話），使公有制經濟原有的主體地位逐漸為私有制經濟所取代。

從官僚式「計劃經濟」到宏觀調控

中共在新中國建立後不久，曾推行它所稱的「計劃經濟」，由於那只是由官僚制訂、控制、管理，而非全體勞動生產者民主地制訂、經營管理，尤其是政府的政策措施時常錯誤（例如推行大躍進、大煉鋼、人民公社化等等），導致經濟發展緩慢，有時甚至倒退。在改革開放後，中共把這種結果歸咎於計劃經濟原則，而改為「宏觀調控」，但由於資本主義勢力的迅猛發展，有它自己的發展規律，不受當局的宏觀調控指揮，多年來更出現經濟「過熱」的結果，官方要「調控」也難以如願。這反映在《文匯報》記者和新華社如下報導中：

「今年以來，國內宏觀經濟形勢比較紛雜，既有重新反彈的壓力，又有過度回落的危險。（具體的表現是：）

1. 固定資產投資、消費及出口三大需求均未減速，今年經濟增長約為 9 %；
2. 1 - 5 月份城鎮固定資產投資增長過快，仍保持在 26.4 % 的高水平上，反彈壓力大；
3. 房地產投資依然過熱，在強硬的宏觀調控政策下仍增長 24.3 %，而前 4 個月在建施工項目個數多達 8.6 萬個，計劃總投資 10 萬億元，在去年同期增幅 40.5 % 的高基礎上仍然同比增長 26.2 %；
4. 居民消費價格指數（CPI）急劇下滑，4 和 5 月僅為 1.8 %；
5. 5 月國內工業企業利潤增幅放緩，比去年同期下降 27.9 %；
6. 信貸增長持續低迷，困擾工商業的增長。」〈10〉

前三項是「重新反彈的壓力」，後 3 項是「過度回落的危險」，這些表現了投資、經營的無計劃性，將產生出生產方面的無政府狀態，或多或少地像其他

資本主義國家一樣。

中國的投資和生產缺少計劃性，還反映在銀行近 3 年來借給非國有企業近 3 萬億元的貸款上面。國家發改委宏觀經濟系會常務副秘書長王建說：「有關統計顯示，在 2004 年的總投資中，65 % 來自非國有投資主體。2005 年一季度，它的投資比例繼續攀升至 71 %。貸款被非國有企業拿走，如果他們的投資出了問題，產品賣不出去，貸款還不了的時候，政府不可能再像當初那樣拿錢去維持，企業不得不倒閉。倒閉就會牽涉到國家的銀行體系，這樣就可能使生產過剩在全國範圍內蔓延。

「未來幾年，中國可能要首次面對生產過剩問題，這是對中國政府實施宏觀調控的新挑戰。」

王建說，收入分配的差距導致了相對的過剩，要解決過剩問題當然應該從解決收入差距入手。但是解決收入差距絕對不是一兩天的事情。〈11〉

國家發改委主任馬凱近日更指出：上半年以來，一方面，GDP 增長高達 9.5 %，固定資產投資規模仍居高不下。另一方面，銀行貸款規模收縮、工業企業利潤增幅驟降、產成品庫存過快增長、CPI（消費品物價指數）降至 2 % 以下，又令人擔心經濟已出現「冷」的跡象。（這種產品滯銷，是經濟開始蕭條的現象之一。）

因此，他提出宏觀調控要注意「雙防」，既要堅決防止盲目投資等不健康、不穩定因素出現反彈，經濟出現大的起落，也要防止經濟增長出現慣性過度回落。

但就在報道這談話的同一天，又有報道國務院日前發佈《關於投資體制改革的決定》，其中規定，政府對外商投資項目只核准「項目申請報告」，毋須再審批。〈12〉 這亦即表示，外商今後即使是「盲目投資」，也不需中國政府「再審批」阻止，而只是依報告「核准」，這又怎能加以「堅決防止」呢？

外商在中國的投資

中國允許外資公司在中國市場以前所未有的規模進行投資，在 90 年代，北京允許新的外資獨資趨向，從中外合資轉向外資獨資；現在，外資獨資公司佔了中國外資投資中的 65 %，他們主導了市場，在 04 年，外資企業的產品佔了中國企業出口的 55 %，並主導了高科技出口行業，中國已成為美國高科技產品的主要市場。〈13〉

為了吸引外商直接投資，中國採取優惠政策，例如在稅收方面，目前中國外商投資企業名義稅率為 15 %，實際稅率是 11 %；內資企業名義稅率是 33 %，實際稅率為 23 % 左右。後者比前者的實際稅率高一倍。同時，還可不必受制於地方政府的政策和規管。而且，據內地報章報道，這些「外資」中去年約有 1/3 是國內資本回流形成的假外資，回流目的是

要享受到外資才能享有的一系列「超國民待遇」。因此，內地報章最近已呼籲國家取消外資這些優惠。

中國目前吸收了外商直接投資的存量達2130億美元（約合人民幣17231億元）。而據國務院副總理曾培炎表示，在華外商獲利豐厚。據初步統計，從1990到2004年，境外投資者共匯出利潤約2500億美元。調查表明，目前在華獲准設立的50多萬家外商企業有2/3實現了盈利。曾培炎還表示，目前外商投資企業工業增加值佔中國工業增加值的比重已經超過1/4，繳納稅收佔全國稅收的比重達到1/5。〈14〉

而據《香港經濟日報》9月17日報道：近年外資企業報稱虧損的比率高達5成。有稅務部門官員認為，有三分之二報稱虧損的外資企業，並非真正虧損，而是為避稅製造出虧損的帳目，估計每年因而流失的稅款達300億元。

資本主義的意識及其表現

在中國經濟日趨於資本主義化的時候（雖然還沒有完全恢復了資本主義），社會上的個人意識和行為也趨於「資本主義化」，人們和機構爭相追求財富，唯利是圖，官員化公為私，並與商家勾結狼狽為奸，爾虞我詐，損人利己。具體的重大事實是：

一，不顧工人生命健康，雖然生產條件惡劣，安全設備缺少，致使工業生產很不安全，廠主仍迫令工人工作，以致每年有大量工人傷亡、殘廢。最近廣東省興寧煤礦事故，就是新的典型顯例：地方官員收取礦主金錢，容許後者強迫工人下井掘煤，雖然明知井下已有漏水，專家也警告有塌陷發生。結果出事，123名礦工罹難。這個事故只是冰山一角。又如山西省濫挖煤礦，有7分之1土地懸空，塌陷危機威脅著數千萬人民。全國各省都有這種隱憂。〈15〉

二，資本家只顧自己謀利，不理生態環境遭受污染破壞，在生產中散發出有毒空氣，又不先處理工業毒氣、廢液和污水，便把污水等流入江河，使周邊及下游的居民不得不飲用。

三，生產和銷售大量假冒偽劣有害食品，使用高毒農藥，農產品產地用污水毒水灌溉，用違禁的工業原件加工食品或漁農產品（如最近由傳媒揭發出來的出口漁產品）等等，損害人民健康。

四，當局實行「醫療改革」後，公共醫療機構高收費，賣貴藥，損害民眾利益。調查顯示：這使得5成病人因無錢而不能求醫，3成需留醫病人無力住入醫院。農村病死兒童有一半是失救的。

五，大中小學亂收費，10年刮了2000億元，單在03年就違法多收了21億元以上（《青年時訊》近日報道：中小學教育在去年成了10大暴利行業的次位，僅居於房地產業之後；醫藥業也名列第8；某些學校領導私吞收費，搖身變成富翁）。〈16〉

資本主義的趨利性，把人們浸在它的冰水中，變得冷酷無情；許多人憎貧喜富，見利忘義，為圖利不擇手段。內地報章揭露的如下兩則見死不救事例，前一則被內地網民批評為「沒有人性的社會」的反映：

其一是：遼寧省東遼縣一水庫日前發生遊客溺水事件，岸上數百圍觀者見死不救，有人開價500元人民幣才下水救人；有見義勇為者曾打算下水救人，但水庫方面卻收回他已穿上的救生衣。眼看落水男子溺水身亡浮屍水面數小時後，悲慟的家人懸賞500元撈屍仍無人回應。最後有路過的殘疾人下水，才將在水中漂浮了數小時的屍體打撈上岸。〈17〉

其二是：河南省一名十五歲少年日前不幸遇溺，在場十多名公安說因不懂游泳而束手無策，其他人士又因少年的家屬未能付四千元「救人費」而不肯救人，少年最終溺斃。〈18〉

另有一則報道說，上千人以看熱鬧心情圍觀一名要跳樓女子，也顯現出現時中國社會充滿冷漠、殘忍而毫無同情心的一面。《文匯報》9月19日刊出《華商晨報》18日消息：望遠鏡、凳子、餅乾、礦泉水……有人為了看跳樓，用上了看明星演唱會的裝備。昨日，一女子在瀋陽市北三經街一爛尾樓上欲跳樓。在女子滯留高空的6個多小時裏，上千人圍觀，三經街交通一度受阻。最後，消防員才把她救了下來（但圍觀者卻無人嘗試過去救她）。

貧富日益懸殊

中國走向資本主義的另一巨大惡果，是造成社會不公，兩極分化，富者越富，貧者越貧。

根據聯合國開發計劃署公布的數據顯示，中國目前反映貧富差距的基尼系數為0.45（國際標準為0.4或以下），佔總人口20%的最貧困人口在收入或消費中所佔的份額只有4.7%，佔總人口20%的最富裕人口佔收入或消費的份額則高達50%。勞動和社會保障部近日發表的報告警告說，中國居民的收入差距目前已達到第2嚴重的「黃燈」警戒水平，今後5年內若不採取有效措施，將惡化到「紅燈」危險水平。〈19〉

中國勞動和社會保障部一名所長蘇海南也表示，中國貧富懸殊已經遠遠超過國際警戒線，達到危險水平。自從2003年以來，收入差距還是急劇加大。據中國國家統計局最新預測，中國城市居民人均所得將在今年內超過人民幣1萬元/年。但去年，中國農村居民年均所得只有2936元。前者不僅高出農村人民幾倍，還每年以8-9%的速度增長，而農村人民的收入增長速度只有4-5%。

《文匯報》同時刊出內地傳媒早前報道過這樣的貧富懸殊衍生出極端的社會現象：在廣州有一名女大學生，因赤貧而到垃圾桶尋找食物。但瀋陽一個國際美食節中，有人將價值20萬元的「滿漢全席」展出

3天後，當垃圾倒掉。令人震驚的是，全國每年在餐桌上倒掉的剩餘飯菜價值高達600億元！<20>

國家在徵收個人所得稅方面，十多年來都是不公的。事實上，薪資階層（這應該是中下階層特別是基層的代名詞——筆者）是內地個稅的主要來源。據統計，內地在2004年徵收到的1700億元（人民幣，下同）個稅，65%來自薪資階層；至於高收入者則由於收入來源多元化，享有多元扣除，逃稅和漏稅現象較多，因此造成不公。中共高層對這些情況當然很清楚，也警惕會引起社會的動亂。因此，最近提出了個人所得稅修正案（草案），主要修訂內容是：

- 由月薪800元調高至1500元，即月薪1500元以下不用納個稅；
- 首階段要求高收入者定期自行報稅；
- 不報或不實報稅者，處以少報稅款的50%至5倍作罰款，構成犯罪者追究刑責。

官方估計這樣的修訂其實是很保守、低效的，民間已認為免稅額仍然過低。修訂後的新例提高至1600元，施行首年，全國個稅收入將減少200億元，目的在於令不少基層民眾減少稅務負擔，縮小貧富差距，「構建和諧社會」。這樣的目的顯然是絕難達到的。即使低收入基層民眾減免了稅款，但與高收入的少數人之間的貧富懸殊仍會有增無減，社會矛盾更趨尖銳化。

反私有化的鬥爭

中國的走向資本主義化，公有制經濟的「民營化」（私有化的美麗修辭）和醫療改革等，給人民帶來生活及醫療等費用高昂、失業下崗、賤價收地、強迫拆遷……的痛苦，更加激發起民怨民憤，抗爭更加頻繁、激烈，而且群體化。這從官方的如下數字可以看到：

在7月中旬舉行的全國政協常委會會議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周永康不無憂慮地指出，群體性事件已成為影響社會穩定的突出問題。數據顯示，群體性事件出現的次數，由1994年的一萬多起大幅上升至04年的7萬4千多起，十年間增加了6倍以上。參與人數同期由73萬人次躍升至376萬人次，規模增加四倍以上。<21>

民間抗爭的壓力，也激發起傳媒和社會人士對國企產權改革等的大討論和質疑。據姚中秋（北京九鼎公共事務研究所研究員）寫的《中國正清算市場化？》一文指出：去年夏天朗咸平與顧維軍之爭，引發大規模的國有企業產權改革大討論。朗咸平自豪地宣稱，在網絡上，95%的民意都支援。這種民意的基本取向，就是反對民營化改革。人們普遍將國有企業產權改革中存在的種種問題，例如「國有資產流失」、官員腐敗，歸咎於民營化本身及貪婪的民營企業家。

教育領域的市場化改革，同樣成為輿論攻擊的靶子。而最近輿論談論最多的是醫療市場化改革的失敗。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的正式報告的結論稱，「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醫療衛生體制……暴露的問題更為嚴重。從總體上講，改革是不成功的」。這也就是說，失敗的。

事實上，否定市場化改革方向的意見，從去年年底開始已在衛生部官員的多次內部講話中出現。大約在今年六月，衛生部政策法規司司長劉新明在一次公開會議上宣稱，市場化非醫改方向。<22>（這反映出民間反對醫療改革的壓力的強大！）

但是，制訂重大方針政策的大權，一直都握在中共的最高領導層手裏，而全國人民（包括生產者、消費者）都沒有權。只當民眾的抗爭力量充分發揮、奪回自己應有的國家權力、廢除了官僚專制獨裁的時候，才能從根本上改正當局的各種錯誤方針政策，維護群眾的權益。

2005年10月18日

註解：

- <1> 引自2月28日《文匯報》。
- <2> 轉引自8月15日《人民日報》曾學文文章。
- <3> 8月17日《蘋果日報》載《中國經濟時報》報道。
- <4> 同上。
- <5> 8月21日《文匯報》。
- <6> 同上。
- <7> 8月13日《蘋果日報》的轉載。
- <8> 8月8日《人民日報》。
- <9> 5月30日《文匯報》。
- <10> 7月14日《文匯報》。
- <11> 8月2日《文匯報》。
- <12> 9月12日《文匯報》。
- <13> 見3月29日《文匯報》《百家廊》載俞揚的《中國，誰的經濟在崛起？》一文。
- <14> 9月9日《文匯報》。
- <15> 8月28日《明報》。
- <16> 分別見04年2月21日和9月3日《明報》。
- <17> 7月19日《蘋果日報》轉載《河南商報》／搜狐網報道。
- <18> 7月18日《明報專訊》。
- <19> 9月20日《明報》。
- <20> 8月24日《文匯報》。
- <21> 7月25日《蘋果日報》何洋文章。
- <22> 8月17日《蘋果日報》論壇。

中國——資本主義的超級強國？

吉爾伯特·艾其卡爾（Gilbert Achear）著 王敬譯

（艾其卡爾在巴黎大學教授政治及國際關係課程）

荷蘭雜誌Grenzeloos簡短的訪問吉爾伯特·艾其卡爾討論中國是否能夠達到超級強國的地位，足以向美國抗衡。

問：你對預言短短的幾十年後，中國將成為一大超級強國，可以在全球的平面上向美國抗衡，有甚麼意見？

答：這些推測一般是基於目前中國生產率的較高增長，然而這樣的增長率不但遠非能確定地將持續數十年，更不用說目前貧富懸殊增加，產生緊張的局勢，沒有人能斷言中國社會是穩定的。

另外，美國和中國的軍費支出的差距是越來越大，並非減少。美國目前軍費支出超過世界各國的總和，嚴密監視可能的敵人，包括中國，其目的是要保持“全面的支配”。如你所提到的預測，事實上是華盛頓及其國防部用作藉口以證明龐大軍備預算的需要。

事實的真相是目前只有一個“超級大國”（包括一些附庸國家）在內，就是美國，走向侵略性的帝國主義的道路，正危害著全球人類。

問：從地緣政治的重要性來說，把中國和世界資本主義經濟結合在一起，有甚麼含意呢？

答：這就牽涉到很多相關的問題，這裏讓我只提到一些關鍵性的：一方面，中國越是在世界資本主義市場扮演重要的角色，這市場便要越多倚靠中國這個國家的經濟，而中國是否穩定，使全球資本主義的利害關係構成問題。

中國已經變成一個巨大市場，也變成一個大出口國家，因此，它已完全不同於伊朗這類國家的範疇。例如，一個不穩定的伊朗，華盛頓仍然是樂觀，不一定會影響伊朗石油的出口，但若中國局勢嚴重不穩定，便可能導致全球資本主義經濟的很大危機。另一方面，中國不僅越來越要依賴美國的市場，同時也要依靠美國經濟的好轉，正如它擁有相當大量的美元、公債和債券，且開始進入美國股票市場，這就是意指中國政府是越來越採取加強與全球資本主義體系連結的政策——與持有幻想的人的信念相反，中國會成為第二個蘇聯，成為新興的在地球上兩極對立關係。事實上，中國比之俄國，更應該適合成為富有的高峰大國。

問：美國在裏海及中亞的軍力增加，對中美關係有甚麼影響呢？

答：實際上，我剛才提到的目前局勢發展的展望，只有美國的極端行為會造成危險：中國人對國家尊嚴非常敏感，而且憎恨美國繼續侵犯他們認為是中國領土的國家主權，包括對台灣的爭議。

他們怨恨美國霸權主義者的行為，這是理所當然的，他們感到——有充份事實證明——美國正從事將中國包圍：自從阿富汗戰爭以來，美軍已入駐中亞，正在中國西北邊緣，配合東邊在日本和南韓的美國軍力，就像一把虎鉗，從東西兩方面將中國壓制。還有派駐到中亞大陸的美國軍力，連接於俄國歐洲心臟與中國之間，這明顯是要阻止自蘇聯瓦解後早已建立的北京與莫斯科間的軍事合作。最後，但並非是不重要的，美國在裏海地區的勢力，增加了對阿拉伯—波斯灣石油的直接控制，抓緊中國對石油的供應，保證在美國的控制下，中國油源供應脆弱的地位。

問：如果中國能夠過渡成為資本主義的強國（即使在地區上），具有帝國主義的野心，結果造成中美敵對的局面，國際社會主義者會採取不同的立場嗎？

答：目前來說，美帝國主義正處於世界支配地位，即使降到地區性水平，將中國放在同樣帝國主義範疇內，是非常錯誤的。收復失去的領土——至少在中國人的心目中——基本上是國家主權完整的要求：在19與20世紀裏，中國受西方列強的壓迫，有過苦難的歷史，且時至今日仍在進行洗脫這項過去的恥辱。

關於台灣的爭議及該地人民的自決權利，中國提出的對台灣領土合法要求，每一社會主義者都應提出討論，但可以肯定地說，華盛頓是無權插手干涉的。

在中美對台灣的衝突中，北京確信是要採取行動去收復侵佔的領土，而華盛頓是維護帝國主義對全球霸權的要求，在這情形下，反帝國主義者是不能守中立的，首先主要的任務是要停止美帝國主義的侵略行動。

（王敬譯自《國際觀點》第368期，2005年6月號）

史學界平反「中國托派是漢奸」錯案

軍行

眾多學者否定官方的舊定案

北京出版的《百年潮》雜誌，在2005年第2期的《史事辨証》欄刊出題為《中國托派不是漢奸》的文章。作者是曾憲新先生。自從中共統治大陸以來，在中國權威刊物上如此公開明確地平反托派漢奸罪名的「辯証」，這幾乎是第一次，雖然對陳獨秀同樣罪名的平反文章早已存在，而公開讚許陳獨秀的評論更在持續出現。

曾先生這篇文章(下稱曾文)首先指出：自抗戰以來，把托派稱為漢奸，在中共黨內幾乎成為「共識」。中共11屆3中全會後，這個罪名開始得到關注，「經過多方的查証研究，眾多黨史研究工作者對此持否定態度，明確認為中國托派不是漢奸。1989年出版的《鄧小平文選》第一卷註釋2這樣寫到：『把托派與漢奸相提並論，是由於當時在共產國際內流行着托派與帝國主義國家間諜組織有關、中國托派與日本帝國主義間諜組織有關的錯誤論斷所造成的。』1991年出版的《毛澤東選集》第二卷第516頁註釋〔9〕也作了內容相同的註釋。這兩條註釋都是經過中共中央文獻編輯委員會審核批准的，因而具有權威性。它在政治上、道義上為中國托派是漢奸翻了案、平了反。」

在以前的《毛澤東選集》第二卷這條註釋，以及其他地方都有與以上引文相反的指責。但官方後來承認這是斯大林的共產國際的「錯誤論斷」，畢竟仍是某種程度的翻案、平反，即使採取的是如此不夠明確和不夠鄭重的形式，去平反如此重大的問題。

錯案的發展過程

曾文接著分析「這個歷時半個多世紀的錯案」，「首先來自前蘇聯和共產國際的肅托運動。」斯大林加諸托洛茨基等高級領導人的眾多罪名的罪証，「現在已經證明是靠逼供捏造的、無根據的誣陷。」其中有一條是托洛茨基指示中國托派「不阻礙日本侵略中國。」「據說中國托派執行了托洛茨基這條指示，因此它也成為中國托派是漢奸的一個罪証。」為配合蘇聯的肅托鬥爭，中共「當然要遵從指示開展反托鬥爭」，「便成為中國托

派是漢奸這個錯案的直接形成原因。」

這也「有一個發展過程。開始，中國黨並沒有把中國托派看成是漢奸，而是看作是一個可以爭取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內的政治派別。」

曾文記述道：「據張國燾回憶說，在王明(從蘇聯回延安)得知黨中央曾與羅漢聯系與陳獨秀合作抗日的事宜後，在一次政治局會議上王明聲色俱厲地說，我們和什麼人都可以合作，只有托派是例外。在國際上我們可以與資產階級的政客軍閥甚至反共劊子手合作，但不能與托洛茨基的信徒們合作。在中國我們可以與蔣介石及其屬下的反共特務等合作，但不能與陳獨秀合作，並誣指『陳獨秀是每月拿三百元津貼的日本間諜』。當場有人指出：『……說陳獨秀是日本間諜，究非事實。』王明卻無理地堅持說，斯大林正在雷厲風行的反托派，而我們卻要聯絡托派，那還了得！陳獨秀即使不是日本間諜也應該說成是日本間諜。王明的蠻橫無理，公開誣陷，躍然紙上。」

「康生緊跟王明，於1938年1月在延安《解放》雜誌第29、30期發表《鏟除日寇偵探民族公敵的托洛茨基匪徒》，文中說：『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變，日本帝國主義佔領了我們的東三省，……托洛茨基匪徒(答應)「不阻礙日本侵略中國」，而日本給陳獨秀的「托匪中央」每月三百元的津貼，待有成效後再增加之。』……他的文章一出來，立即在社會上引起嘩然，紛紛要求他拿出証據，但他始終拿不出來，於是他的文章理所當然地成為眾矢之的。」

托派「不能辭其咎」？

不過，曾文後來認為「托派是漢奸錯案的形成，除上述原因外，公平地說，中國托派在抗日戰爭問題上的極『左』的策略路線，也不能辭其咎。」這說法其實也不是完全「公平」的，即使是曾文仍跟着承認：「中國托派在整個抗日戰爭期間始終舉着抗日的旗幟未曾放下。1937年11月，托派在上海開的黨員代表大會通過了《目前抗戰中我們的任務與策略的決議》，提出了他們

的抗戰綱領，表示願與中共及一切小資產階級派別直至國民黨抗日各派共同進行抗日，『抵抗當前的死敵——日本帝國主義』。他們創刊了新的政治機關報《鬥爭》，復刊了理論機關報《火花》，宣傳抗日。他們也進行了一些實際的抗日活動，如……。這些實際表現，確實證明中國托派不是漢奸。」

曾文具體談到的中國托派極「左」抗日策略錯誤，其一指它對國民黨的抗日態度，其二是指它對中共政策的攻擊。但事實上，它對國民黨抗日的最初態度錯誤主要是估計上的；它對中共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的「攻擊」，主要是認為中共放棄了自己的政治原則，而公開宣言「願為(國民黨的)三民主義的徹底勝利而奮鬥」；放棄了以前的土地革命綱領，不再推行沒收地主土地分給貧農，而只實行二五減租；並取消蘇區及紅軍名義，改受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的統轄；主要以這些條件實行第二次國共合作，而沒有汲取第一次國共合作導致當時革命失敗的慘痛教訓。這樣的統一戰線，與列寧堅持的聯合戰線主張並無共通之點，列寧主張在聯合攻打主要敵人時，必須保持自己的立場、主張、政策，即所謂「共同攻打，分別進兵」的政策。對中共當時錯誤的嚴正批評、指摘，並不等於無根據的「惡毒攻擊」，也不能說成為「客觀上在破壞抗戰」。相反的，若果中共真的把那些錯誤及時改正，則更可能促成抗戰早日勝利呢！

曾文又批評托派「在國際上，他們要打倒一切帝國主義，罵英法美『所謂的民主陣線……』」；這其實不是極「左」的錯誤，而是一戰時期第二國際內以李卜克內西、列寧等代表的革命左派主張的延續。列寧們當時提出「主要的敵人在自己國內」，「轉變帝國主義戰爭為國內革命戰爭」的口號，要打倒自己本國的帝國主義政府；列寧正是以這一反戰立場爭取得俄國兵工農的擁護，共同贏得了十月革命的勝利。托洛茨基和第四國際，繼承了列寧這個傳統主張，在二戰時期拒絕在英法等「民主帝國主義國家」採取「保衛祖國」而反對法西斯帝國主義的立場。這些都已成了不可否認的歷史事實。中國托派對「民主」的與法西斯的帝國主義的態度，只是秉承列寧等導師的態度，因此不應被看成為極「左」錯誤。

錯案須予以正式平反

不錯，曾文最後也公正地重申：「當然，錯誤歸錯誤，漢奸歸漢奸，有錯誤不等於是漢奸，這是歷史已經證明了的。」「……在黨史研究過程中，批評托派的錯誤，同時在政治上為強加給托派的罪名辯護，還托派以

本來面目，這是實事求是思想路線在黨史研究中的落實和擴展」。

從曾憲新先生這篇「辯誣」文章可以看出：曾先生同「眾多黨史研究工作者」(應該說是歷史學者專家)「經過多方的查証研究」，已對「托派是漢奸」這個長達大半個世紀的冤假錯案作出了平反的結論，比諸中共多年前只在註釋中說的更加明確、清晰無疑。

在這之前，1988年中，蘇聯最高法院宣佈30年代莫斯科舉行的三次公開審判等案件完全是冤案，各案的被告都無罪。即是說，托洛茨基和托派並非「偵探間諜、殺人兇手，受外國偵探機關僱用而活動的工人階級死敵」。

這些平反表明：中國俗語說的「歷史自有公論」、「公道自在人心」是很對的；冤假錯案終有平反的一天到來！

中國托派不但長期受到「漢奸」、「帝國主義走狗」等罪名污蔑，而且在肉體上還遭受壓迫、折磨。例如，在中共統治全中國後的1952年冬至當日，全國各地的托派份子，以及前曾參與但已消極不再過問政治的人，他們的親人，同情者，等等，都被拘捕、逼供，其中許多人被監禁或後來轉為勞改失去自由達27年之久；他們的「莫須有」罪名是「反革命」，重要的罪狀就是「漢奸」、「帝國主義間諜、走狗」。這種遭遇同前蘇聯的托派份子等的情形頗相類似。

遠在延安時期，中共就以托派份子「罪名」無辜地處死了王實味。後來，官方承認這是一宗冤案。

長期以來，尤其是在統治全中國後，中共製造出大量的冤假錯案，使無數的人或無辜枉死，或被拷打至終生傷殘，或家破人亡。1978年，在怨憤深重的強大壓力之下，中共被迫宣布要「實事求是」、「有錯必糾」，要平反冤假錯案。但對於1952年中國托派被打成「反革命」而長期遭到折磨、監禁這許多冤假錯案，卻一直不正式予以平反，致使受害者終生仍扣著這頂政治帽子。即使其中的「望百之年」老人鄭超麟在1997年4月再度致函中共第15次代表大會要求宣布1952年12月22日「肅托案」為錯案，並予以平反；但依然得不到回答，而只在出版文集的註釋中承認是由於共產國際當時的「錯誤論斷」所造成，但卻不是法院正式作出平反而宣佈的。

這顯示中共還沒有誠意承認錯誤，真正汲取歷史教訓，與它的「實事求是」、「有錯必糾」的許諾相違背！

2005年10月1日

第四國際關於委內瑞拉的決議

兆立譯

委內瑞拉正在體驗一個革命過程。這個革命過程的特徵，一方面是在政治、經濟和社會領域與前政權作部份的破裂，另一方面是與帝國主義作部份的破裂。委內瑞拉正走上社會轉變的道路，而且有望使這個社會轉變與拉丁美洲國家的社會轉變聯繫起來。

最近幾年來在公共醫療保健計劃方面意義非常重大的發展，掃除文盲及增加入學人數的運動，優先考慮組織合作社，農業改革以及對商用漁業系統的改革等等，都是推動這個過程的這些社會轉變的重要標誌。

在國際上，委內瑞拉已決定勇敢地面對美帝國主義（拒絕參加哥倫比亞計劃，拒絕參加全美洲自由貿易區，拒絕讓美軍駐紮在它的領土，與古巴作更密切的聯繫，譴責帝國主義戰爭）。委內瑞拉正日益變成全球正義運動的一個參照標準。

人民群眾的動員，是使以下這些政治突破成為可能的一個決定性因素：不管是在2002年4月與政變抗爭的時候，或者是在實行使所有這些社會計劃（教育、保健、房屋、水等等）成為可能的社區組織的時候。

這個過程正在尊重資產階級民主機構的範圍內展開。儘管各種要轉變這個國家的努力，這些機構仍然是以附屬主義和貪污腐敗的做法為其特徵。這些做法是政府決定政策時的一個障礙。

對被壓迫的各個階級而言，這個革命過程還沒有變成革命的勝利。這個阻力主要來自委內瑞拉右派，但也來自某些部份的“查韋斯主義者”多數。這個過程仍然在革命動力和朝向忠誠地管理資本主義之間爭辯。

我們的任務是：

1) 著手進行一個提供消息及與委內瑞拉革命過程團

結的運動：在我們第四國際網址上開闢一個專門的委內瑞拉網頁；進行政治和工會方面的對話；宣傳及推廣社會轉變方面的正面結果；著重指出那些我們認為有別於社會自由主義做法的委內瑞拉經驗；宣揚敢於對抗統治階級的那些群眾動員的基本重要性。

2) 在與玻利瓦爾革命進行團結的大前提下，我們支持那些使革命的激進化成為他們的政治干涉的軸心的部門。我們將要與這些部門接觸，與他們計劃政治上的合作，邀請他們參加我們的會議，以及與他們討論我們對於建黨的觀念和一個國際所應扮演的角色。

3) 2006年的世界社會論壇將有一部份於2006年1月在委內瑞拉舉行。在這個論壇上將是全球公義運動與委內瑞拉的群眾組織進行聯絡、表示團結的主要時機。

4) 我們的同志應該參加和玻利瓦爾進程有關的各種活動，例如人民權力大會和（在2005年8月舉行的）世界青年節。我們應該在我們各自的工會中積極提倡參加新的工會聯盟，和進行工會團結活動，包括如果可能的話邀請工會會員參加團結活動。

5) 我們建議把我們在公民參與決策的民主方面的經驗，特別是通過與我們的巴西同志的合作，貢獻給委內瑞拉革命進程。

（譯自《國際觀點》2005年3月號，總第365期）

拉丁美洲的盧拉和查韋斯的兩極分化

薩巴多著

兆立譯

最近在阿雷格里港舉行的世界社會論壇，是盧拉和查韋斯之間產生象徵性和政治性的兩極分化的場合。除了兩國之間關於拉丁美洲的統一和結合以及在兩國之間外交關係上有一致意見以外，盧拉和查韋斯各自的經驗還有極為不同的動力。

拉丁美洲的局勢仍然是極端不穩定，在有些情況中簡直充滿了爆炸性。它是世界上受新自由主義政策的蹂躪最大的地區之一，也是積累了最多革命經驗、見證了革命運動發展的地區之一。

然而，各國的經濟已被嚴格地“調整”為適應金融市場和國際金融機構的邏輯。公用事業已被大量地私有化，勞力市場已多半被解除管制，農田種植則要服從農產品輸出的要求，而且受到大莊園主和大經濟集團的控制。總而言之，整個部門已因新自由主義的破壞而變得一片荒蕪；而在阿根廷，整個國家已被毀壞了。

在這種情況下，拉丁美洲經歷一波又一波的鬥爭浪潮，出現了不斷地激起抵抗新自由主義模式的各種社會運動：玻利維亞人的爭取控制自然資源（煤氣和水）的起義；在阿根廷的抗拒失業和貧窮的工會工人、失業工人抗議運動；在厄瓜多爾的以原住民運動為基礎的社會、民主動員；在巴西的與無地農民根深蒂固的運動結合起來的、反對養老金改革的公務員和銀行職員的動員；在委內瑞拉的玻利瓦爾革命進程。

這些社會運動所凝聚的力量，也已在左派的選舉勝利中表現出來：厄瓜多爾的古鐵雷斯，阿根廷的克奇納，巴西的盧拉，烏拉圭的塔巴勒茲及廣大陣線。它在委內瑞拉也在查韋斯在最近的公民複決投票的勝利中表現出來。這些事件的同時發生又倒回來促使我們進行一連串戰略性的爭論。

盧拉向新自由主義適應

盧拉為了保持前任總統卡爾多索的傳統，一上任，就指派幾位新自由主義方案最出名的代表人，擔任政府要職：帕洛西部長和中央銀行行長米雷萊斯。在這同時，他宣布，巴西會承認並如期支付一切需償付的款項，特別是對它的外債。

這就界定了這樣一個在財政和預算上屬於正統觀念的古典政策：預算的剩餘率從——IMF為使債務能夠償付而要求的——3.75%增加到4.5%；利率上升到18.25%；社會預算被削減，特別是對

於分派給“零飢餓”計劃的基金；由於為土地的佔領籌措資金出了問題，對土地改革施加限制；拒絕兌現在選舉中所作的提高最低工資的承諾；在養老金基金的增強上，採取新自由主義的改革（新自由主義的改革可能是指削減養老金的金額以及／或者提高退休年齡——譯者註）；通過以非常低價格將電銷售給私有部門，事實上把電力供應部門私有化了；進行以減少工作場所工會支會的權力為目的的反改革來限制罷工權和協商權。……總而言之，這些措施雖然抑制了通貨膨脹和支持了農工部門的輸出，但對農業的改革極為不利。它使巴西有了中等的經濟增長，卻加劇了巴西社會中的不平等。

除了使巴西工人的社會動員忽上忽下以外，這些措施還對群眾產生以下的結果：在與老板的力量對比上，它減弱了工人的力量，使工人們解除武裝、迷失方向和停止進行動員。……

巴西的事例是有啟發性的：如果你接受新自由主義秩序的準則，如果你拒絕對抗統治階級，希望統治階級會頒佈一個滿足人民要求的政策是極渺茫的。一個替金融市場服務的政府不會同時向任何種類的社會政策提供基金。問題不是在經濟上。它是在政治上。

玻利瓦爾革命進程

以上所描述的巴西情況就是與委內瑞拉的玻利瓦爾進程的經驗根本上不同的地方。盧拉曾設法遷就金融市場和國際機構，而且與右派結盟，但查韋斯及在他周圍的人們卻選擇了將他們的基石建立在委內瑞拉人民廣大的動員上；勇敢地面對美帝國主義及其在委內瑞拉右派中的盟友。政府能夠強行收回國家石油工業的管理權，將大部份石油收入轉移到資助社會福利上來。外匯管制，土地改革的動力——土地改革的方案准許無地農民佔領被大地主拋棄的不生產的土地，以及最近的被沒收了因政治理由被其主人所關閉的委內帕爾造紙廠，所有這些都加強了這個革命“進程”的熱情支持者的動員。

我們還要指出在基層上組織了健康和教育委員會的重要性。這些在基層的委員會，通過了古巴人的幫助，在健康和教育這兩方面，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委內瑞拉人民現在都可以得到免費醫療。數以百萬計的人民重新開始上學，從基礎的識字班一直到較高等的教育。六所優先收容從窮家庭來的學生的新大學已

九月二十四日舊金山的反戰遊行

趙京

今年初以來，全美的各反戰團體就開始策劃在九月二十四日組織一場大規模的反戰遊行。其間有組織出於現實考慮，建議不要涉及巴勒斯坦問題，而專注於從伊拉克撤軍問題。這個分歧到九月初仍然沒有解決，甚至傳出分別游行的計劃。這引起了廣大的反戰人士、反戰團體的擔憂，包括筆者的中日美比較政策研究所在內的團體和個人都聯名呼籲統一行動。

正是基於壯大聲勢的考慮，在聖荷西等城市的反戰人士決定都集合到舊金山去參加遊行。二十四日早上，我趕到集合地點，與上百名同志和朋友乘車前往。

這是我第一次到舊金山參加抗議活動。我過去一直因為交通擁擠、停車困難不願去舊金山。我們在會場附近停車後，就遇到許多人從不同的方向朝會場會集。我一下子就感到一種自由和解放的氣氛，在這裏可以遇到幾乎所有的美國進步力量團體或個人的訴求：無政府主義、社會主義、共產主義、工會、婦女運動、宗教人士、高中學生以及保守人士等。我特別注意到有不少亞洲系的學生。有一個女學生看到我簽名後用中文向我致謝。除了各種招牌外，許多社會主義團體也在積極推銷他們的報刊、書籍。十年前，我剛到美國時在威斯康星大學校園加入過“國際社會主義組織”（ISO），在嚴寒中叫賣其報刊Socialist Workers，今天又看到這份報紙，好像見到分別了很久的老朋友。

我與剛結識不久的馬克思主義者D·E律師交談較多。他在越戰期間受組織派遣去越南幫助越共抗擊本國的軍隊，回國後曾被美國警察拷打，至今後背不能正常

活動。作為舊金山進步律師協會的一員，他被總部設在印度的國際律師組織派遣到北朝鮮進行為期一周的考察，剛回來。他介紹說，今天在舊金山活躍的許多進步團體的組織者過去都是毛澤東、文化大革命的信徒。伊拉克戰爭以來，有一個叫“Not In Our Name”（不要用我們的名義）的組織有聲勢，在歐洲、日本的反戰示威中也常常看見這個標語，但在今天的遊行中卻不見踪影。D·E告訴我，該組織者過去是毛澤東的信徒，現在自稱是美國的“毛主席”，搞個人崇拜，失去了上千名成員。運動造就了這些名人、“英雄”，也容易將他們拋棄。

集會一個半小時後開始遊行，遊行進行了兩個半小時才結束。我無法數出有多少參加者，後來讀報道，說有兩萬至五萬人，是伊拉克開戰以來人數最多的一次抗議活動。同一天，在華盛頓有十幾萬人參加遊行，也是開戰以來最多的一次集會。美國的報紙、電視都作了廣泛的報道。這是一次成功的遊行。

如果聯繫到最近的新奧爾良等處的自然災害，可以說小布什當局正處於內外交困的境地。但這並不自動地等於進步力量的增強，相反，AFL-CIO（勞聯-產聯）在連續衰落的頹勢中卻分裂出40%的工會成員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顯示美國勞動運動的危機。在全球化的震盪中，作為震源的美國社會矛盾正在日益加深，更需要更多的九月二十四日這樣的政治動員抗議社會不公，以建設一個較好的未來。

2005年9月24日於聖荷西

經開學了。五十萬份以上的贈款，每份一百元，已經分配給極需要的人民。所有這些利民措施都激勵了直接民主的經驗。在世界社會論壇上，委內瑞拉一位工會份子說得好：“查韋斯的話已經使人民大眾釋放出活力。”

這就是查韋斯的選擇——推行一個與美帝國主義和統治階級局部決裂的政策。這個選擇正在開啓了數以百萬計的委內瑞拉人的動員和自我組織。這不是為它而得出一個新模式的問題。玻利瓦爾領導層還沒有推翻財產關係。看起來，也沒有有組織的革命政治運動正在興起。因此預料這個新政治經驗將來會怎樣逐漸演變，是困難的。但是，玻利瓦爾進程證明，天下不是“只有一條”被迫接受新自由主義模式的統治的

道路。石油的收入當然使查韋斯能夠多向社會計劃提供資金。但是他仍舊選擇勇敢地面對美帝國主義，一直到2002年4月11日的政變。盧拉就拒絕進行這樣的針鋒相對。可是，巴西企業和大地主的巨額利潤也構成了實現財富再分配的基礎。這是一個政治決心的問題。在那裏，玻利瓦爾革命進程是一個令人敬畏的支持點。

〔譯自2005年3月號的《國際觀點》（總第365期）。本文原載於革命共產主義同盟，第四國際法國支部2005年3月3日的機關報《Rouge》（紅色）週刊上。作者François Sabado是該同盟的政治局和第四國際執行局的成員。〕

美帝的一次慘敗：西貢的陷落

史密斯著

兆立譯

三十年前，越南戰爭隨著西貢的陷落而結束了。這是越南人民爲了解放和統一他們的國家而進行的英勇鬥爭的最後一個階段。在超越三十年的戰爭和苦難的經驗中，他們使帝國主義遭受了不只一次、而是二次大失敗。

早在1954年，越盟軍隊，在武元甲領導下，已在奠邊府使法國殖民軍隊遭受一次軍事慘敗。這個勝利，不但對印度支那很重要，它在全球，也對其他殖民地人民爭取獨立的鬥爭，提供巨大的鼓勵。

1954年，越南被分爲兩部份：在北部，越南共產黨在河內建立了它的政府；在南部，一個親西方的政權以西貢爲其基地。很快就變得明顯的是，在1954年日內瓦協議中所提到的統一，不會和平地實現了。還有，西貢政權無情地追捕它所定義的共產黨員。1959年，在河內的共產黨領導層決定發動一場爭取國家統一的武裝鬥爭，而在1960年，南越的民族解放陣線成立了。

在這個時候，西貢政權的主要後台老板不再是法國，而是美國了。美國的參與迅速升級，從1961年的幾百名顧問到1965年的五十萬戰鬥部隊。越南人把最強大的帝國主義國家的軍隊打得一蹶不振。1968年初的春節攻勢使美國人相信他們不可能取得軍事上的勝利，而反戰運動也在動搖美國的人心。緊接著巴黎和約，最後一批美國軍隊在1973年3月離開越南。那就是越南人使帝國主義遭受的第二次大失敗。

這時候，西貢政權要獨力去支撐。河內就在1974年底決定發動軍事攻勢以終結統一國家的最後階段。越南領導人以爲需要兩年時間來完成這個任務。那知道，幾個月的時間就把南越軍隊解決了。到了3月底（1975年）古都順化及前美國大基地峴港相繼陷落。4月30日西貢的陷落是最後一幕。華盛頓及其越南顧客的大失敗可用從美國大使館頂的混亂的撤退作爲象徵。

三個因素解釋越南人的勝利。第一個因素是越南人的鬥爭。這個鬥爭，不只是軍事的。軍事的鬥爭表

達了由群眾所支持的、民族和社會解放的革命過程。當然，北越軍隊扮演決定性的角色。不過，例如，北越軍從未滲透到湄公河三角洲主要區域。在那裏，戰鬥是由當地民族解放陣線單位來進行的。其實，在西貢陷落的時候，三角洲基本上早已自己解放了。<1>

第二個因素是美國軍隊的士氣低沉和瓦解。這不但是傷亡慘重的結果，而且是由於當時主要是徵召入伍的美國大兵認識到他們所面對的是整個人民。美國軍隊的不滿因〔第三個因素〕國際與越南人民團結運動、特別是美國群眾性的“把軍隊撤回（bring the troops home）”運動而大大加強。當然前者也助長了後者。深入越南的泥潭，加上越南對美國社會的影響，這兩個因素的結合使尼克遜認識到現在是自越南撤退的時候了。

三十年以後的今天，記住越南人是怎樣和爲甚麼取得勝利，是非常重要的。也是重要的是，不管人們對1975年之前和之後的越南政權的看法是甚麼，不管人們對越南今天的進程看法如何<2>，美國仍沒有從“越南綜合症”中復原過來。

不管布殊及新保守份子的侵略性多大，美國統治階級仍然受到越南記憶的纏繞，不只是因爲五萬七千名美國兵的死亡，而且因爲由於越南的影響，美國社會的激進化和不穩定。當布殊在繼續威脅伊朗、敘利亞、北朝鮮、古巴、委內瑞拉.....的同時拼命想從伊拉克的困境中擺脫出來的時候，值得記住的是美國帝國主義，縱然有強大的軍事力量，但還是跟三十年前一樣，不是不可戰勝的。

譯自《國際觀點》，第367期，2005年5月號

〔註釋〕

<1> 2005年5月2日的《Le Monde》。

<2> 見《對籍秋收的訪問》，《國際觀點》第366期2005年4月號。〔此訪問記也在本期《十月評論》刊出。〕

解放三十年以後的越南

——法籍越南裔社會活動家段的訪問錄

兆立譯

段：我是每年都回去看看的。今年回去，我看到了“中產階級”的出現。當然這只在城裏面的。現在開了許多公司，工業的、商業的都有。資本來自黨員，他們由別人出面，因為根據舊法，黨員不可以做生意。也蓋了很多新大廈，二十層高的，真正的摩天大廈。

記者問：黨員可以當老板嗎？

段答：原則上，不可以。但是他可以用一個親戚或朋友的名字。

問：如果我了解正確的話，跟前蘇聯的不同是，在那邊，前黨領導公開變成富人，在這裏，卻要躲在人家背後而變為有錢人。

答：是呀！大多數幹部，有一點教育水平的，都變成大企業家。他們送兒女到國外留學，這些人回來後，變成經理，慢慢把生意接過來。他們在學中國的經驗，但落後了很多年。可是他們做得比較快，因為，如果你拿兩國人口來比較，這裏的幹部變成企業家的比例大很多。

不過，雖然這麼說，這裏卻沒有像中國有的那種“王國”，因為在中國，一個“王國”可以達到一個省那麼大，這就有分離出現的危險了。在中國，某些大企業家不隱瞞其黨員身份，因為他們替黨賺錢，替國家賺錢。

在越南，黨員沒有做生意或辦工廠的權利，但是我見過有些人，有些軍人，他們做生意，他們可以利用軍隊辦的銀行。我問他們：“如果你是一個公司老板，你一定會賺到利潤的。那麼這利潤屬於誰呢？屬

於軍隊或是屬於黨，因為不管怎麼說，軍隊是受黨控制的？他們回答說：“不是，不是！我們有非常特別的制度，這要慢慢解釋。一部份屬於軍隊（作為修營房或加薪用）。另一部份則作再投資之用。”

問：那麼誰管這些錢呢？

答：當然是企業家自己了，他們自己也拿了一部份.....。

問：真正說來，跟東歐國家大的分別，是黨還在那裏，還在控制每一件東西？

答：絕對是這樣的，它還在那裏，還在控制每一種東西，特別是在鄉下，以及在少數民族中。這些人仍舊信任它。如果你到中部山岳地帶去，開始批評區政府，你不會受到很好的接待。胡志明叔叔仍是他們的偶像。在少數民族中，很多人的名字叫志明。當你問他們為甚麼不替他們的子女取個有“地方色彩”的名字，他就回答說：這是一種感激胡叔叔的表示，因為他解放了我們，給我們糧食，幫助我們進步等等。在城市裏，就不同了，因為黨在那裏真正有危機。

這件事醞釀了五年了，現在就以各種不同方式表現出來了：在報紙上，在給政治局的信上，用互聯網這個你可以得到一切你所需要的文件的、威力強大的消息來源.....。因此，在經濟方面，有了大的進步；但是，還是跟過去一樣，普通老百姓並沒有得到甚麼好處。但是中產階級及無產階級的“精英”就不同了，他們的消費品供應就多了很多。比起一年以前，真會令人大吃一驚。

例如，Cora超級市場在河內及胡志明市〔舊稱西貢〕都開了幾年了。美國公司Metro也開得很好。它的口號是“你自己選，你付錢，你拿走。”他們買了大塊土地，為新階級的車子蓋停車場（不是為平民的腳踏車……）。因為他們比Cora更靠近胡志明市，所以搶去了後者不少生意。

進入Metro，你需要一張卡片，因為他們說這裏以批發價錢賣出，只賣給商店、工匠和協會。他們以低於市價向較遠一點鄉下的農民買農產品（像旋花蔓、檸檬等等）。但是這就開始影響農村婦女的生意了，因為一束旋花蔓的價錢在Metro中比在西貢市場上便宜多了。

問：有錢能買多一點東西的人是人口中少數，還是全部人口，因為大家的生活水準都提高了？

答：大家的生活水準是提高了，不過有的人提高多一點，有的人少一點，不是平均的。工人有辦法拿到Metro的入店卡，但是小農就有困難了。越南、特別是南部的特色是家庭商業。家庭從離胡志明市15公里的鄉村把農產品運進城裏，但是因為售價太高，賣不掉。

問：政治方面有甚麼新的發展？有人說現在有了某種“開放”。

答：就目前而論，政治上有一點開放，知識份子的角色受到了賞識。過去，他們都要“聽領導的話”，現在，可以偏離一點。這與越南現在融入國際社會有關。越僑現在可以在越南買地買屋，即使他們不去住。此外，1975年以後逃離的越南人可以把他們的房子、他們的財產拿回來；如果房子有別人在住，當局就叫過去的房主與租客把事情弄清楚，安排租客到別的地方去住或者給他們一點錢去搬家。目前，所謂“買屋熱”正在高漲，房價非常昂貴，因為大企業、大富翁拼命買屋。今年屋價至少比去年漲了80%。每樣東西都比巴黎或紐約貴。

現在回到政治。許多年來，許多越南人到國外留學，很多人自費。過去到蘇聯、東歐或中國。現在，

那裏都可以去，澳洲、美國、法國等等。你的家裏人出錢，或者國家把需要學習現代管理技能的雇員送出去。許多人就這樣到外國去，看到不同東西。他們回國後會問：“我們為甚麼不這樣那樣做？所以現在，我還不能說有民主，但是有某些自由。”

問：可以在報紙、無線電或電視上看出這種自由嗎？

答：目前，我們還看不到不同的意見在爭論。許多人只夢想到國外去。過去，他們只派學生到國外的大學去讀書，現在，如果你有錢，你可以送至少12歲的子女出去留學。我曾經在〔法國南部城市〕蒙彼利埃見過許多這些孩子，都沒有父母跟他們一起，因為那裏有一個專門管他們、替他們找地方住等等的團體。

問：我想他們在越南讀的歷史課本仍然跟著黨的路線走？

答：那個沒有。仍然有以“馬克思主義”為基礎的歷史書，如果我能夠那樣稱呼它的話。但是有趣的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現在已被“胡志明思想”所代替。

在另一方面，對於阮安寧〔譯音Nguyen An Nink〕這個人現在有了明顯的開放。阮安寧在1930年代非常出名。他是托派領袖Ta Thu Than (藉秋收)的朋友，兩人曾合辦一份叫“La Lutte”〔鬥爭〕。他自己不是托派，因為他沒有加入這個黨。事實上，他描述自己是一個“非黨的共產主義者”。依我之見，他是一個真正共產主義者。他在胡志明1941年回國以前，替黨招募了將近75%的黨員。他於1943年死在Poulo Condor監獄中。

以前，他很少被提及。提到的時候，只說他是個好人，偉大的愛國者。胡志明好像常常想到他。過去，在吳廷琰政權下，有兩條通向西貢大市場、面對面的街道就以阮安寧和藉秋收命名的。這兩條街名只在1985年才被改掉。

現在，一條大街又以阮安寧街為街名。至於藉秋收，他們常常談起他了。書籍也被出版了，特別是范

文宏〔譯自Pham Van Hūm〕的書。他也是一個托派，1945年被斯大林派所暗殺，像藉秋收一樣。出版公司“文化與信息”去年剛剛出了一本他的主要著作之一。我家裏有一本。

我對書店的人說，“你在賣托派的書了？”他看看我，說：“托派，是的，是的！”但是他是個愛國者。他的書非常暢銷。你現在已經買不到了，因為只印了600本。至於阮安寧，我們不能說他被平反了，因為他從未受到譴責，只是完全被忘掉了。他們在胡志明市附近，為他蓋了一座“紀念館”，你可以在那裏找到各種關於他的文件，包括藉秋收的相片。該館於2003年開幕。在目前，1930年代的這段時期，常常被各種不同的人在“回憶錄”中提到。他們甚至翻譯了Daniel Hémery的《從民族主義到共產主義》一書。

所以我現在很樂觀，不過從另一方面來看，黨內有尖銳的權力鬥爭。黨裏有一個代號T2（意思是情報局第二單位）的組織。在這個單位裏，有一個代號T4的情報員，專門寫出批評武元甲及所有“老人”的報告。我有個想法，那就是他們正在改寫黨的歷史，想把所有“老人”排除掉。所以，他才說了關於這些老人最壞的話。這就是斯大林的方法：誹謗！誹謗！這樣就會把人卡住。但是現在已經有了一個開始反對那樣做法的運動。

武元甲已寫了一封抗議信。我有它的越文本。現在談談目前的領導層。這個領導層缺乏一個有水平的領導人。總書記農德孟〔Nong Duk Mann〕只是黨內各派之間妥協的結果。我聽到一個謠言，說他是胡志明的私生子。記者問過他，他笑笑，說：“你應該知道得很清楚，胡志明是全部越南人的父親！”

問：所以，明顯的是，資本主義逐漸地在越南取得主導地位，但是他們甚麼時候承認這一點呢？越南會不會發生像在俄羅斯所發生的那種事情呢？

答：我想不會，因為他們對1989年東歐的事情不作行動：他們雖從1987年開始“開放”，後來看到匈牙利的情況，就趕緊煞車、譴責匈牙利的發展，

說匈牙利有了幾十個政黨等於製造“混亂”。自從他們進行“革新”以來，已有15年了。現在有一個新階級，這個階級需要消費品，要求櫥窗裏多陳列些東西，要求買汽車：這裏賣千萬歐元一部的梅塞德斯牌汽車，那裏要賣10萬歐元。還有，一碗湯的價錢一年漲了一倍。只有出租汽車還沒有漲，因為旅客不多，而且競爭很厲害。

問：越南人現在對美國人的看法如何？好像是，跟美國人苦戰以後，現在正接納他們的許多習慣了。

答：這是毫無疑問的，因為現在美元掛帥呀！他們現在“模仿”美國人。年青人對1975年結束的這個戰爭不感興趣，因為已過了30年。那時參加抗戰的人，現在不是灰心喪氣，就是聽天由命。許多人正等著第十次黨大會開幕。這個大會應該在明年開。我看，這一次大會除了丟一點骨頭給人民啃以外，不大可能有甚麼好處。

問：在這個矛盾的情況下，隨著資本主義的重新建立和民主開放的開始，我們能做甚麼呢？

答：我們至少要要求恢復上一輩革命家的合法地位，而通過阮安寧之受尊崇使所有過去被屠殺的托派得到平反。我們一定要再度談起1930年代，因為現在的年青人不知道過去的情況、老一輩的人趨向於不去回憶。阮文宏的書的出版是件鼓舞人心的事。接著，應該出版“鬥爭”團體所有成員的著作。我們要知道，這個團體開始活動的時候，胡志明仍是個無名小卒.....。除了以上這些以外，我們現在能夠做的是把托洛茨基的著作以及托派關於越南革命的著作翻譯成越文，使大家知道我們在抵抗時期和現在的立場。

〔譯自《國際觀點》，第366期，2005年4月號〕

憶籍雲龍

李平

1941年我到上海升大，良叔安排我與“小謝”同住。其實他並非姓謝，而是姓籍，筆名為“竹雲龍”，比我大幾歲，江蘇人，身材魁梧，能說會道，他不在大學唸書，而是每天上班工作，我們租到白克路弄堂一幢石庫門的屋頂房居住，兩邊沒有一人高，當中我們一人一張小鐵床和小桌子，簡單到連凳子都沒有的。

他對我唸土木工程系很不以為然，認為我們是革命者，應全力加強理論修養，將來革命勝利了，工程技術人員有的是。我解釋說，自己感興趣便報考那個系了，我想，將來鬧革命，還可以團結一些工程技術人員哩。那時候他正在啃馬克思的《資本論》，晚上如果不出去參加會議，就埋頭學習和寫作。我看到他在刊物上發表的短篇小說，寫得很感人，據說得到王凡西的好評，認為他寫工人疾苦的小說是少見的，是極其難能可貴的。我知道他愛好文藝，會寫小說，也很感興趣，我在西流劇社時，跟陸續一起也創作獨幕劇。我向他請教寫作方法，他很認真地回答我，每次我們兩人都坐在地板上，面對面的聽他講說，從生活是文藝的源泉，講到故事情節的發展，小說的結構和寫作技巧等等，可惜我當時沒有記錄下來，否則是很完整一篇《論寫作》了。

他非常重視保密工作，連他工作地方也不告訴我的。後來知道他是在金源錢莊負責出納工作，錢莊的老闆夏先生思想前進，同情革命工作，並給予財力上支持，《青年與婦女》和《求真》雜誌便是部份得到他資助而出版的，款項則經由雲龍支付，家良叔有一段時期也住在該錢莊的倉庫裡。

在他的桌上，總是放着一大本聖經，房東什麼人看到還以為他是耶穌教徒哩。他嚴肅地對我說：在敵人的鐵蹄下，組織常遭破壞，損失重大，因此我們時刻要提高警惕，不要把住址告訴別人，時刻注意有没有人盯梢，一旦發現，立即要兜圈子把尾巴摔掉。他教我在電車上可以微微閉上眼睛去看人，不讓人家發覺。由於他保密做得好，因此在後來發生的案件中，他都沒有被牽連。當然，在後來1952年“大肅托”時也毫不例外地被捕了。

我和他同住約一年，當中搬過一次家，後來便分手了。

抗戰勝利後，在《青年與婦女》（後來改名《新聲》）雜誌上幾乎每期都有他的一篇小說，描寫工人、教師、職工等生活。他是《青婦》的編委，那時我的一篇《剪頭髮的故事》，經他修改為《結婚前後》也刊登了出來。我寫的另一篇講敵偽時期工人罷工鬥爭的，編委認為不合適，不予發表。後來在大型綜合理論《求真》雜誌上，也看到竹雲龍的經濟論文，大家都感到驚奇，說他能文能武，會寫小說又能寫論文，真不簡單！但他對我說，兩者都是差不多推理，找出結論或結局。他後來與一位女作家結婚，作家胡山源寫了一篇文章來祝賀，題目是《社會科學與文學的結合》，認為雲龍是搞社會科學的，愛人是搞文學的。

我最後看到雲龍是在1957年上海監獄裡，我們作為囚犯，公安部組織我們20餘人，到東北參觀學習，“改造思想”。那時候他的身裁更大了，是大伙中很活躍的一個，談笑風生，不過他的健康顯然不大好，不時用手撫摸肝部。我們在一起約有一個月光景，幹部不在時，大家嘻嘻哈哈，好不熱鬧。當時上面口口聲聲說，你們的案子今冬明春就要解決的。但後來的政策越來越左，“今冬明春”並沒有解決問題。

後來，聽說雲龍因肝癌醫治無效，慘死獄中，時年僅四十餘歲，好一個英才，為追求革命真理而獻身了！幾十年後，聽說雲龍妻子臨終前，告訴兒子爸爸的情況，吩咐兒子去尋訪爸的友人，了解爸生前的事蹟。結果找到了鄭超麟，然後再寄信他爸爸的好友告訴他雲龍著作發表的刊物和筆名，以便他找到後能保存下來。

『緊急措施』公佈後八個月，『改革方案』公佈後僅兩個月，中國的經濟危機，又以更可怕的姿態向前發展了，其主要的特徵就是物價飛漲。時隔八月，物價上漲六倍至八倍不等。後面是幾種商品相隔八個月的比較數字：

名 稱	二月十五日市價	十月十三日市價
白 梗	十二萬元	八十萬元
本廠油	二十四萬元	一百八十萬元
二十支雙馬紗	四百四十萬元	二千六百萬元
龍頭細布	十六萬元	一百萬元
白報紙	十萬元	八十五萬元
固本肥皂	二十一萬元	九十三萬元

在這二百四十天中，人們渴望了將近一年的美國大借款仍無下落。外國的『私人存款』之『動用』令雖公布已久，但尚在『擬訂辦法』。『財產稅』與『財產登記』更不知何年何月能弄得良好。官僚制度行動之遲緩，與物價之飛漲兩相對照，不但人民全體對政府失望反感，就是執政者也如熱鍋上的螞蟥一般，忙著以種種新法令新方案新辦法去應付同一個經濟危機之相異階段的諸種問題。在平常時期，八個月本來不算長，但就戰後中國如此緊急的形勢而言，不能不算是個相當長的時期了，政府在這八個月之中，玩了許多套魔術，開了不少張藥方，但經濟危機却更加嚴重起來！每月幾萬億元的軍事支出，隨戰線的擴展及物價之上漲而增加，但貧苦不堪的人民，再也不能負擔千稅萬捐以及濫發通貨的無形搜刮了！政府之無能解決經濟危機，有其內在的基本原因，戰後二年來已為事實所證明，但近數月來因國際國內局勢的緊張，現政府之基本政策與經濟危機的關係，更昭然於世，人們已用怨言來代替希望了。

八個月來物價上漲百分之六百，但工資僅增加百分之二百左右，公教人員的薪金增加更少，數千萬倚賴固定收入的『薪水階級』，八個月來實際上失去了收入的一半以上，而近日來的瘋狂漲風，將有吞食其已經維持清苦生活的收入額之四分之三的可能了！這是一個極大的生活方面的威脅，如果往復的基本情勢不能改變，則人民的生活資料必將日益受『漲風』的掠奪，多數人民將陷於求生不能求死不得的絕境，貪污之風勢將更加發展，盜賊搶劫將

老問題的新發展

竹雲龍

日見橫行，失業將日益增加，工潮將此起彼伏地在各部門發生，禁令繁多，黑市愈瘋狂，貪污的機會越多，人民的負擔因而更沉重。如此，這個業已非常痛苦且黑暗的社會，必然弄得更混亂更可怕更黑暗！經濟危機必然引出社會危機。

禁令在漲風之前失效已不止一次，政府十年來『努力抑平物價』，暗中又在濫發通貨，漲一萬抑下一千，如是一漲一抑，物價愈抑愈高，現在許多物價都比偽幣價格高得多了，這現象十分可怕，『薪水階級』都在恐懼着未來更難熬的日子，從前還有一線希望，現在都只有絕望和怨恨了！到處談論着物價飛漲，生活指數不合理，工資跟不上物價還要打折扣，配給品有名無實等各種問題，社會的不安現象，隨着生活艱苦的情形更普遍了。

政府對公用事業的貼補政策，本來的用意是在維持法幣的虛偽價值，最近顯然有逐步放棄貼補聽任公用事業漲價的趨勢，與其濫發紙幣的行為配合在一起觀察，我們很可以相信政府為事實所逼，已走上『高物價政策』後期的

迅速發展的階段，這是政府於經濟危機的最後階段中不能控制經濟發展的情況，是總崩潰的信號。因為漲風一陣緊跟着一陣，週期越短，倍數越加越高，通貨膨脹的速度越來越快，總崩潰便只有依照其自身的邏輯待時而發了！

要阻止經濟總崩潰的爆發，首先必須立刻停止戰爭，進一步從根本上改革幣制。然而這又必須有一個全般的澈底的政治改革才有可能。因此，要想挽救當前經濟危機，必須從政治的改革着手。此外一切臨時應急的經濟緊急措施或救急方案都是無效的。因此我們希望人民大眾挺身起來謀取政治的改革吧！

原刊於《新聲》第二卷 一九四七年七月

中國托派在抗戰中的主張和行動

張開

前言

托洛茨基派（簡稱托派）是堅信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黨派。中國托派自20年代末形成以來，由於她一直處於備受壓迫的地下狀態，她的政見和活動情況鮮為人知。一般人幾乎祇從中共的攻擊中，誤以為托派在國際上是帝國主義的走狗、蘇聯的賣國賊，中國托派在抗戰期間是日本偵探、匪徒漢奸，抗戰後是反革命份子。這些污蔑流傳了半個多世紀，「謊言說上了千百遍就變成真實！」

不過，歷史始終是會還原其本來面目的。在1978年中共11屆三中全會被逼宣佈要平反冤假錯案後，中國的一些學術界、史學家便突破一向的禁區，著文發表，為陳獨秀不是漢奸、托派沒有接受日本每月300元津貼而辯誣。

1988年8月6日，上海《解放日報》刊載一則新聞：蘇聯平反30年代四大錯案——為托洛茨基、加米涅夫、季諾維也夫等恢復名譽。這則新聞的副標題就明白顯示出托洛茨基同加米涅夫、季諾維也夫等一起得到平反。

1991年，為紀念中國共產黨70週年出版的《毛澤東選集》第二版刪去了第一版有關托派的誣蔑性註釋，改寫的第二版的新註釋，正如1989年出版的《鄧小平文選》第一卷註釋2一樣地指出：「抗日戰爭時期，托派在宣傳上主張抗日，但是攻擊中國共產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把托派與漢奸相提並論，是由於當時共產國際內流行著中國托派與日本帝國主義間諜組織有關的錯誤論斷所造成的。」這是用「有中共特色」的認錯方式推倒了流行50多年對托派的誣陷之詞（但「反革命」的帽子仍沒有同時摘下）。

不過，儘管有這樣的改變，不少評論對托派的不正確傳統觀念和習慣了的偏見，仍不能一下子完全拋棄掉。舉例來說，唐寶林在他所著《中國托派史》一書中，便流露出這種情況。該書的自序寫於1992年9月（在《毛選》第二版面世一年之後），曾說明該書初稿完成後已經過4次修改補充，但結果仍不能從根本上清除掉中共過去污蔑托派為漢奸的遺毒，依然在基本上重彈中共的舊調。例如，該書寫道：

「很顯然，托派的『抗戰』路線，依然是『極左』加反動。口頭上參加抗戰，實際上破壞抗戰，成為日本帝國主義的幫兇。」（該書第224頁）

「所以，他們依然把主要攻擊矛頭對準國民黨和共產黨及國共合作為中心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客觀上還是為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服務。」（第249頁）

「彭述之的所謂『保衛主義』、『支持抗戰』只是說說而已」。（第253頁）

「由於他們的主張實際上有利於日本侵華，所以他們的組織在更加殘暴的日本法西斯鐵蹄下，反倒沒有再受到過去那樣大的打擊。」（第255頁）

像上引那樣的敘述、論斷，在該書中還有很多。儘管此書作者有機會從中共收藏的資料檔案中博覽托派文件，並選擇性地加以引用，使讀者從中得知中國托派的許多情況；但由於觀點角度的不同，不少地方（有如上引4段文字所說的）便會誤導了讀者，致使真相仍未能大白。此書的一些論調，同上引《毛選》第二版該註更正後的基調雖有些接近，但該新註只說「托派在宣傳上主張抗日……」（是否含有「行動上沒有抗日」之意則沒有說），且沒有唐書那樣屢用類似於「漢奸」的字眼（雖然唐書有加上「客觀上」、「實際上」的形容詞）。

直到70年代中，向青在比較自由的香港，雖有機會看到許多有關資料，卻仍然撰文指責中國托派組織「沒有參加抗日戰爭」；對於「實際參加戰爭活動，設法同工人、兵士、農民以及一切抗日積極份子密切聯繫起來，按照每一步鬥爭的需要來提出鼓動口號，藉此對抗戰發生實際影響，取得群眾的信仰，在這方面，中國托派組織一絲一毫也沒有做到，而且根本沒有認真努力去做」。「中國托派在整個抗戰八年中，並沒有由組織派遣和指導任何同志去參加抗日軍事鬥爭——一個都沒有。」（引自向青寫的《中國托派與抗日戰爭》一文）

為了提供當時的實際參加者或耳聞目擊者所敘述的資料，以及現時能找到的有關文字記載，給有興趣的人士加以比較、研究，增加對歷史真相的了解，同時澄清某些誤解或曲解，還歷史以原來面目，我們特輯寫出以下這篇實錄。

抗戰前的托派概況

1937年以前，中國托派的力量非常弱小，最重要的原因是：

一、她堅持馬列主義的傳統理論，要建立一個無產階級政黨，以作將來領導革命的準備，因而一直在大城市中工作；但在1927年革命悲慘地失敗後，工人階級運動陷於低潮，尤其遇上蔣介石國民黨的白色恐怖鎮壓，使得城市工人運動在其後一段期間內不能復興，這個重要客觀因素加劇了托派工作的困難，制約了托派力量的發展；

二、國民黨的白色恐怖鎮壓，不但使中共在1933年初為止的白區工作幾乎損失了百分之百（劉少奇在中共第八次黨大會上的報告）；而且也使托派遭到一連串摧毀性的打擊。據王凡西列舉出，從1931年4月到1936年冬的5年半期間，托派在上海的中央領導機關和重要幹部，連續遭到了5次的破壞和逮捕。具體的就是：「1931年5月，只距中國托派四組織統一後不到一個月，全體中央常委會（除陳獨秀外）及另外一些重要幹部同遭逮捕；數月後，即在1931年秋，上海區委員會全體同志被捕；次年10月，以陳獨秀為首的臨時中央委員會，又全體被捕；1935年初，第二次臨時中委會（除陳其昌外）全體被捕；1936年冬，第三次臨時中央委員會組成後工作了僅僅五個月，又遇到了嚴重破壞，工作完全陷於停頓。」從這樣頻密的破壞中，可見國民黨鎮壓的厲害，和對托派打擊的嚴重。這些打擊連帶使她的各地方組織得不到正常的領導，使原已不多的成員大都消極，祇有少數堅強不屈的份子在繼續最艱難的地下工作。

抗戰爆發後的立場主張

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國主義強盜發動了對中國的侵略戰爭，在佔領了華北後，再向各地推進，轟炸南京等地，國民黨政府準備從南京撤退，提前釋放囚在南京監獄中的全部托派陳獨秀、彭述之、鄭超麟、王凡西、劉家良等人。彭述之等人於8月末返回上海，重新參加領導工作。

他們當時的組織「中國共產主義同盟——布爾什維克派」對於日帝的不斷侵略中國，一直採取堅決反對而主張積極抗戰的態度。她在日軍進攻上海時（1937年9月15日）發出傳單，題為《武裝保衛上海，發動全面抗戰》，號召把日本帝國主義強盜驅逐出境。而要完成這個任務，必須全國工人及一切勞苦群眾動員武裝起來，和前線兵士站在一道積極參加這次戰爭；必須立刻組織各種義勇軍、宣傳隊、救護隊到前方參戰，等等。

1939年9月，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中國共產主義同盟中央臨時委員會於同月13日召開緊急擴大會議，通過了《世界大戰與我們在抗戰中的任務》決議，重申該組織對抗日戰爭的保衛主義立場，提出反對帝國主義戰爭，號召中國民眾對世界大戰中的帝國主義應該採取獨立的態度，利用它們之間的矛盾，首先給予直接壓迫的帝國主義以打擊，進而解除一切帝國主義的束縛。

該決議列出其抗戰政綱，包括：（一）必須立即宣佈沒收地主土地歸貧農及抗日兵士；（二）改善農民生活，全體農民武裝起來；（三）改善工人生活，實行八小時工作制，工人監督生產；（四）改善兵士待遇，組織兵士委員會，以全民武裝逐漸代替僱傭兵制。

同一決議定出該同盟的迫切工作，概括地說有：主要工作是反對日帝及其工具——漢奸汪派；集中力量從

事工人運動；盡量參加游擊隊及軍隊，以勇敢的抗日行動博取群眾的信仰；等等。

上述的對中國抗日戰爭的正式立場和主張，與托洛茨基及他所建立的第四國際的基本立場主張是一致的。

抗戰和二戰的相繼爆發，是非常重大的歷史事件，勢必在各個政治組織內產生巨大的反應和思想衝擊，引起不同意見的爭論；而每個政治組織也必須確定她的政治立場、戰略路線以至具體政策，才能立足現實，統一成員的行動。政治立場和路線，是政黨的生命線。而有正確的理論，才有正確的行動。但必須經過內部民主的討論、爭辯之後，作出多數甚至一致的決定，然後能對外一致行動，展開宣傳、鼓動，擴散政治影響。

當時，在原来的托派領導人之間，對抗戰的有關問題，產生了嚴重的歧見和爭論。在1937年11月代表大會通過的《目前抗戰中我們的任務與策略的決議》，遭到從南京遷赴武漢居住的陳獨秀所反對。陳獨秀主張「以自由及民主的寬廣政綱」去代替托派的抗戰政綱，倡言「我們應該相信政府確有抗戰到底的決心，是不會中途妥協了。」他以此與上海中央嚴厲批評國民黨的「應戰」和反動政策相對立。（此外，在二戰發生後，陳獨秀又認為，這只是民主主義對法西斯主義「侵略」的戰爭，因而完全站在英法美帝國主義方面；同時，把斯大林獨裁統治的蘇聯與德意日帝國主義並列在同一平面上，把前者的官僚獨裁與列寧的無產階級專政混同起來，宣稱前者是後者發展的必然產物，把前者與法西斯專政納歸同一範疇。這些意見完全背離了列寧和托洛茨基的傳統見解和主張。托派的多數派反對陳獨秀的上述右傾意見，堅持了列寧、托洛茨基對反帝戰爭和對蘇聯的見解、立場。）

對於抗戰的性質和基本立場，鄭超麟認為中國的抗日戰爭自始即沒有進步性，因而主張應該同對帝國主義戰爭的態度一樣，採取「革命的失敗主義」。在日美戰爭行將爆發時，托派中形成了少數派，認為日美戰爭如果發生，中國抗戰便變了質，屬於帝國主義大戰的一部份而失去其進步性。這與彭述之所代表的多數派和第四國際太平洋書記處決議的立場相反。中國共產主義同盟在1941年7月13日召開的第二次代表大會上，大多數代表排拒了少數派提出的上述意見，而通過了彭述之所起草的政治決議，堅守了原有的支持抗戰的立場。太平洋戰爭爆發後，少數派要求容許他們公開出版對外發言的機關報《國際主義者》，但被拒絕，托派組織於是宣告分裂。這是從內部發生的對托派運動的重大打擊。在這幾年間，為了內部這些爭論，又耗去領導人和幹部很大的精力和時間。不過，能夠明確了對抗戰的保衛主義立場，維護了列寧、托洛茨基對帝國主義及其戰爭、殖民地反帝戰爭的態度，和托洛茨基對蘇聯的傳統看法及主張，也是付出代價後的一種補益；而她所出版的4卷《保衛馬克思主義》討論文集及文件，對成員的教育和政治思想的提高，也起了有益的作用。

開展抗日工作中遇到的重大障礙

這段時期對托派的另一個重大打擊是來自中共，後者污蔑前者是「托匪漢奸」、日帝走狗。

1937年10月19日，毛澤東在延安陝北公學紀念魯迅逝世週年大會上說：「托派成為漢奸組織而直接拿日本特務機關的津貼，已是很明顯的事情了。」〈1〉

同年12月，王明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作報告說：「我們和什麼人都可以合作抗日，只有托派是例外」；「在中國，我們可以與蔣介石及其屬下的反共特務等人合作，但不能與陳獨秀合作」；並誣指陳獨秀是每月拿日本300元津貼的日本間諜。又說，「陳獨秀即使不是間諜，也應該說成是日本間諜。」〈2〉

1938年1月，康生在《解放》周刊第29、30期上連續發表文章重複王明的誣蔑，稱陳獨秀等在1931年「9·18」後，即成為每月領取300元津貼的日本偵探。

同年3月5日，《解放日報》發表《共產國際關於與法西斯主義的奸細——托洛茨基份子作鬥爭的決定》，指令中共在內的各國支部展開有系統的鬥爭，以「反對帝國主義走狗——托洛茨基主義」，「須使黨的組織清洗出……托洛茨基份子」，這個鬥爭「並不是一時的政治運動，而是黨的每個組織、每個共產黨員的日常的經常的任務」。（為了執行這個決定，中共一些領導人便喊出「剷除」和「徹底肅清」托派的號召。）

嗣後出版的第一版《毛澤東選集》第二卷中《論持久戰》一文的註所加的罪名更多：「現時的托洛茨基主義，並不是工人階級中的政治派別，而是一夥無原則的和無思想的暗害者，破壞者，偵探間諜，殺人兇手的匪幫，是受外國偵探機關僱用而活動的工人階級死敵的匪幫。」

上引的講話、決定、文章等從上到地傳播到全國各地、中共各個組織、黨員、同情者、外圍團體……都信以為真，雷厲風行地執行對托派份子的鬥爭、打擊，視之為頭號敵人，要加以消滅，當然更拒絕與之作任何的合作和聯合對抗日偽了。「漢奸」的稱號，在抗戰時期的一般民眾眼中是最可憎、可怕的。這便給予托派份子從事抗戰工作和活動以極嚴重的打擊、阻礙。

上海的托派活動

在一批領導人從國民黨監獄獲釋返回上海後，上海繼續成為托派中央領導機關的中心，她在抗戰爆發後幾年間的重要工作，除了繼續出版地下機關報《鬥爭》和理論機關報《火花》之外，就是公開出版宣傳刊物和書籍。當時所出版的刊物初名為《動向》，但因登記成問題，改用小冊子形式，取名《西流》、《破曉》；書籍則有托洛茨基著的《被背叛的革命》（當時改名為《蘇聯的現狀與前途》）、《俄國革命史》（三大卷）、伊羅生著的《中國革命的悲劇》，以及十幾本有關抗戰、戰爭和托派意見的小冊子。這些出版物需要大量的財力

和人力，在當時的困難條件下能夠做到，是很不容易的。由於公開發行全國各地，它們所產生的政治思想影響頗大。

另一方面，通過她的各種文件和地下出版物，把托派的立場、主張、決定、意見等傳達到各地方支部去，除了經由郵遞寄至華南及中西部等地外，其中一位中央擴大會議參加者梁貽在他用波臣筆名在1982年寫成的《回顧》中，曾敘述他當時把那份決議帶到山東各地去的艱險情形（例如遭遇日偽軍警的幾次檢查而僥倖過關）。各地方組織和成員便根據中央這些決定而進行工作。

托派份子當時在上海工作遇到的困難，從以下的實際事例中可以看到：

梁貽在他的《回顧》（第36頁）中記述：

「這時我的組織生活是和寒君、華鎮彬一個支部，有時蔣震東也來參加……我所參加的抗日團體，都是由報上的廣告和陶（行知）派介紹的。這類團體的主事人都是中共（人員），初時叫我參加宣傳小組，發傳單，街頭演講等，深入一點的談話，他們就探出立場的差別，……一有可疑，就停止派工作了。有一個難民收容所，陶派介紹我去當工作員，可以吃一頓午飯，收容所的主持人只問我兩句話，就說我到晚了，位置已給了別人。我和寒君研究過那兩句話，他也慨嘆中共的人們敏感過人。」中共人員對如此普通的團體也嚴加控制，排拒稍有可疑的異議者，對其他如中共的抗日軍隊等，當然更加嚴格審查、監視參加者；托派份子要想加入去活動，就更加困難得很了。

中共份子除了在群眾中對托派份子進行污蔑之外，甚至對他們的工作權利也要加以破壞：一位織綢廠女托派份子到一間廠去工作後，中共份子便向該廠廠方說她是「托匪漢奸」、破壞者，致使她多次遭到解僱，要連續地找工作。

對於參加抗戰的行動，托派的人員曾試圖找尋可能的機會去進行。例如：

一、王凡西在《雙山回憶錄》中，曾記述他在1937年從上海到武漢會晤陳獨秀，經過陳獨秀與一七九師師長何基澧談判，決定了派他和濮德志等人參加他的隊伍，以有限度的土地改革來發動群眾的政綱，參加抗戰的軍事工作。後來，因何基澧突然被免除師長職而不能實現。據他們當時推測，多半是何氏和陳獨秀的來往給國民黨特務偵知而遭撤職。雖然未底於成，但王凡西認為，此事可以表明：一、陳獨秀不僅在言論上支持抗戰，他還在實際上進行過如何參加抗戰的行動；二、中國托派確確實實曾企圖以獨立的政治主張去參加抗戰。

二、陳獨秀在武漢又曾試圖派出托派人員與各「民主黨派」商談合作，共同行動，進行抗日，但在中共的「托匪」污蔑而向「民主黨派」領導人大施壓力之下，上述試圖結果也失敗了（詳情見《雙山回憶錄》）。這顯示托派開展社會活動所遭遇到的巨大困難，和批評托派自建圍牆、自我孤立的說法是「想當然」的。

三、王凡西在一封信中寫道：抗戰爆發當年，「陳其昌老是說著一句話：『我們有目標，卻沒有道路。』」1938年秋天，陳其昌爲了『尋找真正參加抗戰的路』，離滬赴港，與陳仲禧住在一起，企圖憑陳仲禧的經驗和關係，搞點獨立的軍事鬥爭，他們的合作未曾繼續下去，只因當時托洛茨基來了信，需要其昌把信送到江津去，以此中斷了他和仲禧的合作。不然的話，我相信陳其昌不會喪生於上海的日本憲兵司令部，而多半會與陳仲禧死在中山的戰鬥中的。」

四、上海一間大百貨公司一位姓曹的男青年托派成員，經過組織討論決定後曾到崇明島附近去，試圖參加當地的中共游擊隊；數月後返回說，因被監視很嚴，很難活動，被迫要離開。

五、趙芳舉在他的《永恒的懷念》中提到：1937年從南京監獄釋放而「依舊回到上海托派組織」的扈文章，後來「去東北參加了抗日隊伍，一直沒有他的消息。」（該文第5頁）

此外，王凡西曾舉出在中共游擊隊中工作而「先後被發現爲托派同遭斯大林派殺害」的兩個例子：「一、盧育才同志（一個原屬西北軍的二級軍官，在莫斯科學習期間接受托洛茨基意見的）於1929年回國後，被中共中央派赴江西「紅軍」中工作，轉戰升任第四師師長，於1930年6月奉彭德懷之命率師攻打長沙<3>；二、原在香港做工的李肅同志，於1928年接受托派意見後，回原籍東江，參加當地的農民武裝隊，在農民中獲得相當高的聲望。」他倆當時都沒有同托派組織有連繫，卻仍然被發現而遭殺害，可見中共特務偵查能力的高強，幾乎每個加入的異己者的「底細」都會被查得一清二楚，難以立足和成功地活動。

日美戰爭爆發的立即結果，是日軍佔領上海的英法租界。在這時以前集中在租界活動的抗日組織和人士，便處於日軍和汪偽的直接統治下，遭到後者的搜捕等威脅；托派在上海的活動也備受影響，要轉入最艱難的地下工作。

1943年初夏，國際主義派（前少數派）常委之一的陳其昌被日軍逮捕，遇難了。

同年夏末，中國共產主義同盟的兩位女工成員（魏禾和羅真）因領導滬西一間織綢廠的經濟性罷工，被巡捕房（即警局）拘留。另一女同志去探望她們，也隨即被捕；由於她年輕無經驗，在毆打、恐嚇和哄騙之下，抵受不住而供出了另一些同志的住址，導致3位男同志（李永、劉康和高擎宇）被捕，其中劉康因與劉家良同住，雖然受日本憲兵指揮密探整夜施用灌水、電灼等嚴刑逼供，仍堅拒透露其他同志（如目標人物彭述之、劉家良）的資料，使事情沒有再惡化、不再牽連更多人。

在監禁3個多月之後，終因查不到證據和罪名而獲釋。這6人的被拘禁，給該組織帶來又一個打擊。由於有些地址已被供出，劉家良和彭述之雖然非常僥倖地逃過了搜捕，卻不得不遷居（前者要帶病

到浙東暫避），這個事故使工作大受影響。彭述之後來擔任大學教授，在思想上影響了一批青年，其中有些人加入了托派。<4>

廣東中山縣托派的抗日活動

中山縣是劉家良的家鄉，經過他及其北京大學的同學、同志兼同鄉的努力，抗戰前已在中山秘密發展了一批成員，成立了地方支部，在幾間中學內進行地下活動。抗戰爆發後，他們公開成立了「中山青年戰時服務團」（簡稱中青團），吸收了縣內幾間中學、師範學校的學生和各鄉青年加入。1938年冬，發展爲200多人的青年組織，在一些鄉村成立中青團支隊。

中青團進行各種抗日宣傳活動，成立克克劇社，到處演出抗戰話劇，演唱抗日歌曲，在街頭演講宣傳，救護被日機轟炸而受傷的群眾（其中一位成員也因而被嚴重炸傷）等等。他們的積極活動和發展成員，一直遭到當地中共組織及其成員的打擊、中傷，公開污蔑他們是「托匪漢奸」、「日偽走狗」，並且向石岐市的國民黨縣黨部告密（說中青團是托派組織，成員是托派份子等），意圖借國民黨之手鎮壓中青團。中共的外圍組織「中山青年抗日先鋒隊」（簡稱「抗先隊」），則在中學和社會上與中青團成員對抗、鬥爭，「托匪漢奸」的帽子和同類的污蔑性書刊到處散佈。1939年8月，中青團拒絕接受國民黨縣黨部的領導，被國民黨派出的武裝部隊包圍其駐地，結果被迫宣佈解散。

托派在中山四區三鄉，曾組織了一支農民武裝小隊，由參加過1925-27年土地革命鬥爭的托派中央委員陳仲禧所組織和領導，力圖以托派立場進行鬥爭，有成員十多人、一挺牛角機槍，幾支長槍和短槍，贏得了當地貧農的擁護。日軍佔領中山後，這支農民武裝與日軍漢奸作戰了多年，直到抗戰結束前不久，陳仲禧在戰鬥中壯烈犧牲<5>，這支部隊也就被打散了。

1939年秋，日軍攻打中山四區張家邊鄉，中青團派出七、八人組成「前線服務隊」，到張家邊去救護傷兵。後來，日軍突然改變進攻方向，從中山二區分六路進攻。「前線服務隊」隨軍轉移到中山二區。翌日，日軍攻佔中山縣城石岐。中青團轉移到中山二區沙圍地區，計劃與撤退到該地區的政府軍共同組織游擊隊，抗擊日軍。日軍在佔領中山三天後，即退出中山，組織游擊隊的計劃就沒有進行。

1938年冬，國民黨政府收編「大天二」袁帶的土匪爲軍隊，成爲「第四戰區第一游擊縱隊」，司令部設在中山三區小欖鎮。袁帶爲司令，屈仁則爲副司令兼政訓處主任。「第一游擊縱隊」的活動地區是番（禺）、中（山）、順（德）一帶。

中山三、九區在1925-27年革命時期，是土地革命運動活躍地區，不少農民參加過土地鬥爭。托派中山支部曾計劃在三、九區組織農民武裝隊伍，在抗戰時期進行抗戰，革命到來時作爲革命的武裝力量進行革命鬥爭。

於是派出托派人員高聳、劉秀及一個中青團團員三人打入袁帶的「游擊縱隊」，以到軍隊宣傳抗戰為名，掛名為「司令部政訓處政訓員」（無薪、無軍銜）；計劃：第一，把袁帶的土匪部隊改變為農民武裝部隊；如果不可能，則第二，通過「第一游擊縱隊」的關係與三、九區地方的農民接觸，組織農民武裝部隊。其他許多托派成員和同情者則參加「政治工作隊」，成為「政工隊員」，從事抗日宣傳、發動群眾的工作。

劉秀深入到第一游擊縱隊各個中隊的駐地調查，了解到袁帶的部隊完全是土匪作為，他們收「行水」，強行攤派「捐款」、開賭場、開鴉片煙館。各地方中隊的「士兵」不見蹤影，他們都在賭場、煙館及關卡（收「行水」），不見一個是真正的農民在部隊裏，把這樣的土匪部隊改變為農民武裝的部隊根本不可能。至於通過這樣的部隊去接近地方的農民也不可能。他們過去的土匪行為，今天，還是和昨天一樣，百姓對他們並無好感。如果要在中山三、九區組織農民武裝，只有另起爐灶，深入農村，在農村裏生活、工作，作長期的活動才有可能。

托派支部遂決定，以學校復課為由，回校上課，退出了「第一游擊縱隊」。

廣西省托派的軍事活動

國民黨黨員王公度，1926年為國民黨派往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回國後在廣西充當李宗仁集團的「智囊」。王公度辦了一個「幹訓團」，任用了幾個曾在莫斯科中山大學或東方共產主義勞動大學學習的國民黨人任教官。這些人都是反斯大林的。他們對學員講述了有關蘇共黨內鬥爭的事情以及托洛茨基的主張，也就無形中散播了托派思想。參加過「幹訓團」的人，不少就傾向於托派，所以，在廣西，不僅青年學生，而且黨、政、軍、教育的各級幹部，都有不少人傾向於托派。

李宗仁集團反蔣失敗，李宗仁與蔣介石妥協，就拿王公度作為犧牲品，以托派漢奸的罪名槍斃了王公度。於是傾向托派思想的人都被認為是王公度的同黨而受到迫害。1938年初，中國共產黨開始污蔑托派是漢奸。在廣西的中共地下組織大力進行「反托運動」，把那些與托派有過接觸的人士，以「托派漢奸」的罪名槍殺。因此，托派人員和思想傾向於托派的人——同情者，在國民黨和中共兩方面打擊之下，處境十分艱難。但是，托派人員不顧艱難險阻，仍然展開了抗日活動。

廣西國民黨曾三次組織過學生軍，第一次是在1936年廣西與廣東聯合反蔣時的「兩廣事變」。第二次是在1937年「七七」抗日戰爭爆發後，廣西軍隊要北調，因而組織學生軍隨軍北上開赴抗日前線做宣傳工作。第三次是在武漢淪陷後，廣西受到日軍的威脅，廣西當局又一次組織學生軍做抗日宣傳工作。這一次比前二次規模

大得多，影響也較大。三次學生軍都有托派份子和托派傾向的學生參加。

第一次學生軍，是以桂林師專學生為主，參加這次學生軍的有托派思想傾向的學生。桂林師專有毛鴻鑑、麥俊奇、方正、黃贊明等人。毛鴻鑑在學生軍集中在南寧訓練時，即與丁肇基去上海參加托派組織。南寧參加學生軍的有黎琦清（後改名為黎潔霜，她參加托派後於1942年在重慶被捕，1949年11月27日被殺害於中美合作所）、魏穎如等女學生。兩廣事變和平解決，學生軍就解散了。

第二次學生軍，以桂林師專的學生為主，也有少數中學的學生參加。這次學生軍隨廣西部隊開赴抗日前線的第五戰區做抗日宣傳工作。參加這次學生軍而有托派傾向的學生有黃贊明、麥俊奇、方正等。

第三次學生軍，是在1938年11月組織的，有三個團。毛鴻鑑參加上海托派組織後回到廣西，他發動南寧及各地有托派思想傾向的同學或同情者參加學生軍去進行抗日工作，參軍的人有毛鴻鑑、黎燧生、侯芝才、廖淦成、梁榮陞、梁庭詠、梁亮、李啓成、楊士足、鄭安榮、姜鳴渭、韋昆章、江國豪等人。這些人在學生軍中積極參加各種抗日宣傳活動。他們編排抗日戲劇參加第三團在馬嶺的演出活動。

正在這時，王明、康生一夥誣蔑陳獨秀、托派是漢奸，掀起了「反托」風暴。「反托」風暴吹到學生軍。在學生軍中，上至團政治部，下至中隊的領導、排長、班長都有中共的地下黨員，他們根據中共中央反托的指示，在學生軍中掀起「反托」鬥爭。他們以擾亂軍心為由向廣西當局報告托派份子的活動情況，並要對托派份子進行打擊。於是他們對認為是托派的人進行跟蹤、監視，甚至非法拘捕，刑訊逼供。這場「反托」風暴席捲整個學生軍團，從而迫走了毛鴻鑑。1939年春節過後不久逮捕了李啓成，及後又逮捕楊士足、江國豪、韋昆章等13人，關押於賓陽縣監獄，對他們進行非法審訊和施用電刑，強迫他們招出指揮者，在施刑後仍然得不到他們所需要的口供。沒有任何罪行，這13位抗日同學平白無辜的被關押了半年之久。

在製造「反托」狂潮之下，不要說真正的托派份子，有托派思想傾向的人和同情者都不可能在學生軍中工作下去了，被迫紛紛退出學生軍。就是那些不是隨風倒的人，也惶惶不可終日，不知道那一天會遭到打擊。

1939年冬，日軍進攻廣西，南寧淪陷。邕寧縣政府遷移於西郊壇洛區付四鄉。壇洛區各鄉民眾先後成立了游擊縱隊。托派李伊人和那龍鄉民建立那龍民眾抗日游擊隊。李伊人、盧漢宗（托派同情者）擔任政治指導員。他們與金陵、東南、下楞的游擊隊配合，三次進行阻擊日軍偷渡三江口屏風——宋屋的戰鬥。

1940年春，與各鄉民眾抗日游擊隊組成的時候，組成了「邕寧縣縣工隊」，黃仁鶴為正隊長，托派份子方正為副隊長。在四個分隊中，有兩個分隊的隊長是托派

人員梁正榮、麥俊奇。戰工隊和各鄉游擊縱隊政工組一起深入敵後宣傳，發動群眾鋤奸，在敵人經過的路段、前線敵後主要路口、村邊、墟場等處，用中文或日文書寫，或用刮刀刻畫抗日的標語口號，致使敵人膽戰心驚，卻步不前，龜縮回營或改道他去。

1944年冬，南寧二次淪陷，難民雲集南寧西郊襄定、那龍、壇洛、富庶、武康等鄉。當時西郊壇洛區處於無政府狀態，治安混亂，土匪搶劫難民，漢奸、壞份子乘機破壞。托派李伊人和同情者盧漢宗以及愛國人士盧裕綽三人，發動群眾，組織「民眾抗日自衛隊」，受到廣大群眾特別是難民所擁護。當時先後組織的「民眾抗日自衛隊」有三：一、那龍民眾抗日自衛隊，1944年冬建立，李伊人為隊長，盧漢宗、盧裕卓為政治指導員。全隊有80人，槍枝70支。二、金陵民眾抗日自衛隊，1945年春建立，托派寧廣居和愛國人士羅日茂發起組織成立的，寧滿道為隊長，寧廣居、寧耀東為政治指導員，有隊員40人，槍枝50支。三、南寧淪陷，壇洛區政府解體，各鄉抗日自衛隊各自為政。為了團結力量對敵鬥爭，由托派李伊人、寧廣居、同情者盧漢宗和教師盧顯龍等十餘人聯名倡議召開全區各鄉人士、各鄉抗日自衛隊聯合會議，商討組織「壇洛區民眾抗日自衛聯隊」，得到各方熱烈支持，遂於1945年2月成立，推選李伊人、潘馨比、寧滿道、梁承禮為聯隊正副隊長，寧廣居、盧漢宗、盧裕卓為政治指導員。抗日自衛聯隊成立後，立即展開抗日活動，並配合政府軍六十四軍投入各種戰鬥，曾經進行過四次抗擊日軍的戰鬥。〈6〉

山東和江蘇的軍事鬥爭

劉家良在1947年3月2日在中國共產主義同盟的香港黨團全體同志大會上報告：

「在山東和江蘇，我們的同志組織了游擊隊。他們四面受敵。一方面受敵偽的圍攻，另一方面受國民黨軍隊及斯大林黨新四軍的妒忌。但我們的同志仍在艱苦而堅決的鬥爭，因而獲得了該地農民的熱烈擁護。我們的同志被看作英雄。」

上述報告是概括性的。對於山東省的托派從事游擊戰抗日的較具體情況，梁貽的《回顧》曾留下很珍貴的資料（雖然也是簡略、不完全的）。以下是《回顧》中的有關敘述：

梁貽在參加了1939年9月的中央緊急擴大會議後，帶著會議通過的對抗戰的決議案到青島去，在青島膠濟鐵路找到了陶紹武，再到泰安第三中學見了閻子桂，分別給他們一份決議案，並由後者通傳諸城、青州等地支部，7天後在泰安開山東省代表會議。他然後到兗州、東平、趙莊，約齊同志開會。會議終因濟南撤守而開不成，但從這一敘述中，可見山東省多處都有托派份子，而且大概都得到了那份決議案。後來，在梁貽們幾個人討論了

政治決議案和托派在抗戰中的口號和任務之後，其中一位代表馬華決定回青州打游擊，於是帶著小王去了。

馬華後來的情況，梁貽打聽不到。《回顧》卻報道了另外幾個托派份子也分別組織了游擊隊在戰鬥：

（1）「1937年底韓復榘撤出濟南後，國特、中共的游擊人員都冒了出來。喬同恩早就有了準備，這時也組織了抗日的隊伍。傳說他有三支盒子槍，……據說中共的刊物上登載他被捕後，押到泰安，他要求在鬥爭會上發言，為托派的抗日主張辯護，因而被處決。」

（2）「臧叔鶴，趙莊人以聖人懷念他。所以相距雖然六七百里，也打聽了他的消息，說他的游擊隊被消滅後，他本人被活埋了。」

（3）張衍恕在八一三後，自陸軍監獄開釋，就回了家鄉——泗水。「他知道托派的『黨章』，並沒有向托派組織報到，而是和托派『聯合陣線』。他組織游擊隊，有了一支步槍，到哪兒都背著它。他到諸城去看過老臧，回來的路上，經過一個市集，因他背著槍，被當地的武裝勢力逮捕、盤問，最後是要槍斃他，他沒法救自己，便安定地寫了遺書給他老婆。」

「張衍恕的年齡比我大，他死時大約三十三歲。他常用的名字有「心如」、「子芹」、「子勤」等。北平組織叫他山東張。」

（4）《回顧》較多些敘述的，是由張立民（丙雨）領導的游擊隊。張立民參加了托派，在抗戰前後有一段時期在上海生活，閱讀托派的《鬥爭》和《校內生活》等文件，與梁貽和當時的領導人陳其昌討論問題。後來，在「日本人佔領南京之前，立民他們就在京滬線上打起了游擊，打得很出色。烏江是他們的根據地」。「汪精衛到南京成立偽政府後，周佛海便聽到張立民的大名，把他捉了去，要他投順，立民不肯。」後來終於給立民設法逃走了，回到根據地。從此南京城門口懸賞捉拿他。「太平洋戰爭爆發後，敵偽聯合大掃蕩，情勢險惡，立民他們向杭州灣撤退，預備了一條木船，由立民夫婦率領婦孺先行。哪知他們一上船，艙裏冒出了新四軍，不由分說，用大刀把他們砍了，立民夫婦、婁宣的太太和嬰兒都遇難。寶之的太太和兒子尚在等船，沒遭難。他和婁宣指揮反掃蕩。」

「婁宣繼承了立民的職位。掃蕩過了，他把襲擊立民的新四軍捉了來，擺在海灘上，問他們為什麼要殺害抗日的弟兄？為什麼小孩也要挨刀？被俘的啞口無言。他開動機槍全掃了他們——婁宣親口對我這樣說。寶之看了我聽話的神情，解釋道：這是游擊風……。」

「抗戰一開始，中共就明令不容許托派有生長生存的機會。消滅托派第一，抗日、反國民黨是其次。」〈7〉

此外，王凡西也曾簡略地指出過：「在山東有王長耀等同志領導的一支游擊隊，結果被中共軍從背後消滅。」

趙芳學在《我們在抗日前線——懷念抗日戰爭中犧牲在前線的托派同志》一文中敘述了山東濟南托派學生的抗日活動：

山東有鄉村建設專科學校，學生大都來自山東各地貧苦的農村。學校托派組織的建立，始於1933年崔寶之（崔希賢）來校讀書之後。至1937年抗戰開始托派正式成員有十餘人，再加上傾向於托派的學生，共約十七、八人。

1937年9月底10月初，日軍驅兵南下，逼近山東黃河以北。學校托派成員15人在濟南布政司街五福樓飯店相聚，商討如何參加抗日問題，崔寶之說及學校決定遷校魯西南的巨野縣；也說及濟南城內第一師範學校內的華北學生流亡團。繼後家住在聊城縣的周文茂同志介紹了聊城縣縣長范築先的情況，范築先曾在馮玉祥手下任過高級參謀，現為地區督察專員兼聊城縣長，思想進步，抗日愛國心強，目前正大力組織抗日力量，凡參加者人手一槍，若要參加，周文茂願回去聊城找人引薦。大家討論決定，王冠平、趙芳學、小王、小楊四人，在校開展工作；徐睿夫、周文茂和家住荷澤的兩位同志共四人，一同去聊城范築先部隊參加抗日；房子杰和另兩個思想傾向托派的同學，在濟南參加華北學生留亡團。

趙芳學、王冠平、小王及小楊、隨校往魯西巨野，由於學校緊急遷走，學校教學設備未能帶走，學生課本亦不全，未能正式上課，於是趙芳學等人組織話劇團演出，展開抗日宣傳活動，演出《衝鋒號響了》，收到良好效果。

10月中旬，趙芳學收到房子杰自濟南流亡團來信，說第二十九軍宋哲元，即將在流亡團招收五十名大專學生，補充政工大隊。部隊現在冀南豫北一帶前線。接信後大家商量決定先由趙芳學一人前往濟南參加政工大隊，王冠平等三人暫時留校。不久他們也在十月底去了聊城范築先部隊。至此，先後入范築先部隊的托派的人就有七人了。

趙芳學到濟南入了政工大隊，托派的人就有四人參加了政工大隊。下午，「七君子」之一的李公樸給政工隊隊員作了報告。第二天宋哲元和原三十八師師長張自忠對隊員講了話。第三天，新招的政工大隊五十多人到達內黃西南二十五里的東莊，是整編後的三十八師師部所在地，與原招募的150名政工隊員合在一起。政治大隊長是張克威（陝北派來搞統戰工作的），軍事大隊長是宋某。文學作家陳荒煤和于黑丁也在原招募的政工大隊裡。

二十九軍在河北大明、漳河一線給予日軍重創取得勝利之後，官兵帶著血淚奉命撤退至河南南樂、楚旺和安陽一線，說這是中央的命令，但官兵仍無法理解。

政工大隊除一小部分留駐師部外，大部分下了部隊，趙芳學等托派四人被分配到一團一營三連，還有一位姓邵的隊員，後來也成了托派。

政工大隊的工作是向士兵講解抗日保國衛家的道理，講的抗戰形勢，教士兵唱抗戰歌曲，教士兵識字，學文化。士兵們一談到打鬼子，就說「有利的時候，中央不准我們打，不利的時候卻拿我們去犧牲」，「我們是小媽生的，不能和中央軍相比」，「老百姓說我們不打仗，只會後退，不能保護他們，所以我們部隊所到之處，老百姓早就跑光了。沒有老百姓的支持，我們軍隊能打仗嗎？」趙芳學回應說：「這些話很有道理。所以我們向士兵講述抗日道理時，也強調必須充分發動群眾，把抗日和保障勞動人民生活聯繫起來。我們對士兵說：「日本鬼子，我們堅決要打，但那些不讓我們打日本鬼子的人，必須把他們趕走。」其實，這早已是士兵們自己的看法了。

「一日凌晨三點，北面防線突然響起密集的槍聲。我們的第三連是預備連，急速進入防線，我們托派五人扛起兩副擔架和兩箱子彈，緊跟士兵進入掩體。槍聲又響了，我軍還擊。約半小時後就平靜下來了。天亮時我們退下來，我軍無傷亡。這樣的軍事行動，已先後發生過多次。

「我們在部隊住了一個多月，政工大隊通知我們，改向農村村鎮宣傳（抗日），宣傳形式有：演講、唱歌、演話劇及採訪等等。

「1938年1月底2月初，由政工大隊選送大專學歷的一百人去武漢中央軍官學校短期訓練，將用作二十九軍的基層軍官。房子杰肺病初癒身體不好，其他托派成員不想去，大家決定，趙芳學報名參加。趙芳學體檢合格，與被選送的一百人去武漢。將近新鄉東北一個村莊時，日本飛機向他們低空掃射，飛機投下三枚炸彈，重傷數人。一個重磅炸彈在趙芳學身邊四五呎處爆炸，趙芳學受傷並且腦部受震盪而昏迷過去，被送去軍醫院。」

趙芳學傷癒後幾次寫信房子杰、毫無回音，一天，他找到武漢八路軍辦事處，正好遇見政工大隊長張克威，他說，你們去武漢不久，大隊在轉移中被日偽軍包圍掃射，犧牲過半，生還者不到三分之一，經過收容，亦只寥寥幾人。這樣說來，房子杰等四個人是犧牲了。他們是死在抗日的戰場上。

趙芳學又說：「1959年秋，『肅托專案組』找我問話。問起參加范築先部隊的王冠平時，專案組工作人員對我說，除王冠平一人之外，在范築先部隊的托派份子全部被日軍消滅了。

「這樣，參加到抗日前線抗日鬥爭的托派人員11人，除了我及王冠平二人之外，其餘九人，先後犧牲在抗日前線上。」

前面所述被中共因托派身份而加以殺滅的武裝抗日戰士，是確實的托派份子或同情者；至於尚未證實其是否托派而被中共以「托匪」罪名處決的，就更多了。其中包括：

（1）據國民黨中央調查局檔案（特種情報二七〇一〇四九一號）所載：「托派於一九三九年在蘇魯邊境被

殺。被殺者為該黨青年百餘名，近（連？）該黨魚台縣縣長李貞乾及蘇、魯、豫邊區動員委員會陳籌等四十餘人。」（這項資料是由王凡西的一位台灣朋友從該局檔案庫中偷抄出來的。）

（2）、蘇魯豫邊區的「湖西肅托事件」。中共事後承認處決了三百多人，是「肅托擴大化」，但仍說其中的魏定遠等人是真托派。直到1983年5月，中共中央組織部才批示：湖西事件是一起重大的冤假錯案，不是肅反擴大化錯誤，應予徹底平反。（見唐寶林著：《中國托派史》277至282頁。該書附錄還記載了其他5起《「托派漢奸」假案》）。<8>

此外，從廣西到上海學習的托派青年丁毅，連同他的伴侶鄒秀雲，在1941年至43年間，參加了國軍組織的游擊隊，在江蘇湖州一帶活動。秀雲算是隨軍家屬，但也學會了開槍，被譽為「雙槍女將」，可她遺憾未曾親手槍殺過日寇偽軍。他們的兩個兒子是在游擊隊裏出生的。他們曾有一些驚險的遭遇，比如穿過敵人的封鎖線時，要把小孩子的嘴巴用布封住，絕不能哭出聲來，否則敵人會開槍掃射。帶著孩子爬山涉水，十分危險。一到安全地區，發現背著的孩子被倒掛著，立即把封布解開，聽到孩子哇的一聲，大家才鬆了一口氣。他們在游擊隊生活有3年之久。

浙江溫州托派的抗日活動

1937年7月蘆溝橋事變引發了全面抗日戰爭。浙江省溫州的老托派份子曾猛認為，托洛茨基主義者應當積極抗日。當時，陳獨秀在武漢，托洛茨基在國際上都主張抗日。彭述之從南京出獄後到上海，寫了《抗戰勝利的必須條件》小冊子，由上海亞東圖書館出版，傳送到了溫州。

1937年秋，溫州托派組織建立，領導機關「幹事會」開會討論抗日問題，曾猛提出並經幹事會通過：為了抗日必須同中國共產黨聯合行動。幹事會決定派李蔡志代表溫州托派和中共浙南縱隊駐城內辦事處主任吳育南商談，李和吳是甌海公學同學，又是同鄉，原有私人感情。李向吳提出聯合抗日的建議時，吳斷然拒絕。李問吳：中共和國民黨合作，為什麼卻不能和托派聯合抗日？吳回答說：「托洛茨基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敵人，是帝國主義奸細，陳獨秀是漢奸」。

中共領導的永嘉戰時青年服務團在抗戰開始時成立，同時永嘉國民黨縣黨部成立救國禦侮團。溫州托派幹事會認為，儘管吳育南拒絕托派「聯合抗日」的建議，但托派應參加中共領導的戰時青年服務團，因為它是真正抗日的群眾組織，決不能加入國民黨的禦侮團。曾猛在幹事會的提議，獲得通過。溫州托派成員（除二三人外）及受托派影響的外圍份子全部加入永嘉戰時青年服務團，托派份子在團內積極參加各種抗日活動。

1937年冬，從武漢開始的大規模反托運動發展到溫州。溫州城內出現反托海報，生活書店擺滿反托書刊，說什麼托洛茨基是法西斯間諜、日本的走狗，陳獨秀、彭述之領取日本的每月300元津貼，等等。溫州托派沒有刊物，只能用油印方法編印托派中央臨委機關報《鬥爭報》上的抗日文章、決議，秘密散發。同時通過在中華書局的職員托派王濟，聯絡店裏的師兄弟，把亞東圖書館出版的陳獨秀抗日的著作，以及彭述之、高語罕、李季等的著作擺在書店的顯著位置上，其中還有紀德的《從蘇聯歸來》、及《從蘇聯歸來答客難》，托洛茨基的《兒子、朋友、戰士》、《杜威委員會對莫斯科審判案的調查報告》、《蘇聯黨獄真相》、《蘇聯黨爭文獻》，等等。

陳又青在戰青團刊物上發表《敵乎？友乎？》一文，受到戰青團中的中共黨員圍攻。

永嘉戰時青年服務團江北五區寶台支部，是托派朱鈴、潘泰運及吳昭松領導，遭戰青團總團下令解散整頓。與此同時，國民黨步步加緊要解散戰青團。戰青團寶台支部解散後還沒有整頓好，總團終於被國民黨反動派勒令取締了。

1939年春，溫州托派第二屆幹事會通過決議，籌備組織溫州救亡大同盟，以原來參加戰青團的托派外圍份子作為基礎，分別成立工人、學生、店員、小學教師、農民等「同盟」的支部，待「同盟」發展到可以召開代表大會時，就產生救亡大同盟的領導機關。

幹事會並決定出版大眾性的刊物《工農兵》，宣傳抗日，這個油印刊物出版了六、七個月。

學生、店員和小學教師各個支部都是以抗日宣傳為主，他們辦工人夜校、讀書會、辦壁報等，宣傳托派的抗日主張。工人支部以從事工運為主；農民支部以從事農運為主。

1939年7月間，托派領導的針織工會的罷工鬥爭，托派領導人多人被捕，召開溫州救亡大同盟代表大會的計劃未能實現，溫州托派組織處於半癱瘓之中，1941年9月溫州淪陷，托派組織被徹底破壞。

在香港的工作

在香港，托派成員素來朝向工人，很多都在工廠、特別是在太古船塢中工作。1938年，太古船塢工人，在托派號召之下，進行了一次勝利的抗日罷工，迫使英國資本家撕毀了它與日本帝國主義者所訂立的40萬港元合同，導致日輪「淺間丸」不能在香港修理，而要拖到台灣修理。

由於香港是英國殖民地，中國各黨各派就利用它所具有的有利條件，在香港進行活動。在廣州淪陷前後，廣州的托派原有十多名成員，後來，一部份成員繼續留在工廠中工作，另一部份則轉移到內地，特別是香港，

與香港及來自中山的成員一起工作，出版半公開及地下的刊物，成立西流劇社，宣傳抗日。

1939年美國社會主義工人黨因一些重大問題上產生歧見、爭論，結果一大批成員（主要是知識份子）退出。托洛茨基和多數派領袖加農總結了這次分裂的主要教訓，認為工人政黨必須加強它的無產階級成份和意識，小資產階級出身的知識份子同志應該到工人環境中工作、學習。

中國托派贊同這個總結，香港和廣州的組織一樣，也跟著動員其餘非工人成員到工人中去，團結工人，共同為爭取工人權益而鬥爭，他們參與了一些工人罷工。

太平洋戰爭爆發，香港被日軍佔領，開始了殘酷高壓的統治，日軍橫行無道，搜捕抗日份子，動輒殺害平民。托派成員劉秀及其親妹（她是先後兩個抗戰劇社的主要女演員）同十餘人在山上躲避，多人被日軍當場殺害，劉秀頸部被砍了一刀，日軍以為他死了而離開後，他負傷掙扎下山醫治，才倖免一死，而托派組織也被迫轉入異常艱苦的地下工作。

一般香港居民在日佔期間，由於米糧等必需品異常缺乏，工商業不景，生活十分艱苦，托派份子也沒有較好些，他們長期處於艱難困苦中，缺乏營養，影響健康，尤其是那位寒君，時常沒有飯食，健康很壞，且患肺病，但仍須在太古船塢作體力重活，結果病情惡化，不支去世，由此可見艱苦的一斑。《雙山回憶錄》對此有較詳細的記述。

在此期間，有不少成員離開香港，回到內地，有的參加了軍隊工作，從事抗日戰爭；陳仲禧則在較早時回到家鄉，組織了一支小游擊隊抗日（這在前面的中山工作中已有談過）。

距離香港不遠的廣州托派組織，也同樣備受著政治壓迫，處境十分困難，他們大都響應組織號召，到工人中去。例如負責人之一的彭榮，在廣州一間大電力廠做工，並參加了工會工作，得到工人擁護，被選為罷工委員會成員之一，領導了該廠的罷工，爭取到改善工作待遇的勝利。

重慶托派的活動

重慶市是國民黨撤出大半個中國富庶領土統治後的政治中心，它原有的特務人馬大都撤退而集中在這個中心，務必嚴密地管制這個「戰時陪都」，絕不容許有任何反對它的政治活動，因而對人民的監視非常嚴厲，在某種程度上把以前實行的白色恐怖主義政策推行於重慶。托派份子在這樣的政治環境中從事地下活動，自然也十分困難，以致他們的組織遭到過國民黨軍警特務幾次的破壞，許多成員被捕，不少被監禁。

據趙芳舉憶述：重慶組織同上海、香港組織的聯繫是保持有的，中央的工作指示和《鬥爭》、《火花》及文件資料，也能經郵寄收到。在1940年前後，他們共有

30多人，大都是在工廠（電力公司發電廠、兵工廠、機器廠、造船廠等）工作，以「第四國際中國支部——中國共產主義同盟重慶小組」名義，油印出版《工人呼聲》，宣傳托派主張，特別是對抗戰的態度、政策及有關問題，對工人進行教育工作；除了散發到多間工廠和幾間大學外，還經由化名郵寄到成都、昆明、綿陽等地（那裏都有托派組織）。<9>

在電力公司，托派份子有4人，其中的劉有綬做事極有魄力，能力很強，得到全公司（包括3間發電廠）工人的擁戴，由先進被選為電業工會主席，後來曾代表西南電業工人出席了北京全國先進工作者代表大會。

在抗日戰爭結束前半年多的1945年春節之後不久，國民黨大特務田凱槍殺了前往他的偷電餐廳執行剪線任務的電力廠工人胡世和，激發了整個電力公司以至全市工人、市民的公憤，發電廠的托派成員和他們的一批同情者，向國民黨特務發動了堅決的鬥爭，重慶廣大工人為此醞釀罷工，要求槍斃殺人兇手田凱。結果，蔣介石迫於民憤和工人罷工的強大壓力，不得不說出「影響極壞，處決田凱」八個字，忍痛處決自己手下特務來平息民憤。這場鬥爭及其結果所帶來的轟動西南社會的效應，對蔣家王朝的崩潰也起了某種催化作用，為工人階級反抗國民黨反動統治寫下了珍貴的歷史一頁。解放之後半年，電力公司軍代室經過調查，其結論據說是：「『胡世和事件』是托派份子一手搞的」。官方沒有追封胡世和為烈士，但他這個烈士身份已寫進歷史，無法抹煞了。<10>

1942年春，國民黨蔣介石又一次對重慶托派進行大搜捕，領導人和成員10餘人被拘禁，其中楊壽之、任玉璽等7人在抗戰結束後獲釋放；趙金聲、王坤芳被拘禁在「中美合作所」渣滓洞監獄，1949年「11.27」被處決，王坤芳在解放後被評定為烈士；趙金聲的名字在解放後曾在男監樓上第一間牢房門邊的烈士姓名欄內出現過，但一段時間之後不見了，至今仍未被評為烈士。領導人之一的王振華及其愛人黎潔霜，以托派身份被捕，被監禁了8年，在白公館監獄受盡折磨，健康極壞，最終於1949年11月被殺害。在解往刑場時，他倆帶著兩個幼孩一起，昂首挺胸，從容就義，表現出革命家至死不屈的氣概！在重慶解放後，在清理「中美合作所集中營死難人員身份和評烈工作中，他倆夫婦「終因『托派』而不列名，長眠於歌樂山下不為人們所知」（引自《重慶日報》1983年8月31日的報道：《火中的鳳凰》）。經過許多人的奔走努力，終於在中共11屆3中全會之後，他倆夫婦才被評為烈士。<11>

結束語

以上是我們現時所知道和搜集到資料的各地托派組織和份子在抗戰期間的工作、活動情況；這些當然是很不完全的，有待將來搜集到的資料補充。

從上述的情況中可以看到：

第一、托派在抗日戰爭中，曾遭遇到非常巨大的困難和打擊，尤其是中共追隨當時斯大林指示而作出的污蔑和打壓封殺，使他們的活動（甚至存在）無比地艱難。（如果加上抗戰前所受國民黨鎮壓和抗戰結束至新中國成立後所受到的可怕打擊，寫下她長達大半個世紀被各個時期統治者殘酷壓迫的歷史，其打擊之大和歷時之長，在古今中外是非常罕見的。）

第二，儘管遭遇到那樣多而且巨大的艱難險阻，他們依然爲了追求科學社會主義的信仰和理念而堅持鬥爭，在主張和行動上反對當時最直接的壓迫者日帝，同時在思想、路線上批評及反對他們的政敵——國民黨和中共；這種批評和反對，是任何不同政見的政黨都應享有的權利，以便爭取群眾支持，最後實現自己的政綱，不應因此便給她扣上各種政治帽子的。

第三，他們人數實在太少，與其統治者和政敵的龐大力量相比，的確微乎其微；以這樣薄弱的力量，在各方打殺之下實在難以蓬勃地發展起來，難以在工作上取得極大成就，反而在軍事鬥爭中最後——被敵人打殺，以至消滅。如果對他們也用「成敗論英雄」、「成者王敗者寇」的勢利眼光，去否定他們曾經爲一種理想而作過的努力以至犧牲，指責他們「一絲一毫也沒有做過」等等，那是極不公平、公正的。即使對托派的理論政綱有不同意見甚至反對，但對歷史事實卻不應抹煞。

第四，從最早的陳獨秀向中共提出聯合抗日開始，到抗戰時托派一些地方組織要求與中共聯合行動反對日帝，中共中央和地方的人員都秉承王明所說的：「我們和什麼人都可以合作抗日，只有托派是例外」，從而堅決加以拒絕。而且，托派份子更到處遭到中共人員的誣蔑、游擊隊員被消滅。托派面對著這樣極端敵對（要「剷除」和「徹底肅清」托派）而又特別強大（抗戰時擁有幾十萬軍隊，還有來自蘇聯的龐大人力、物力、財力幫助）的中共，有如被巨石壓下的小卵，這種極爲不利的處境，是一般國家各政黨之間的對立鬥爭所少見，也是非常不同的。如果托派當時把她全部力量都動員去參加游擊戰爭，可能發展成爲很大的力量，但即使如此也極難改變她與國共之間非常懸殊的力量對比關係，而取得可與中共及國民黨「分庭抗禮」的勝利；但如果處於「四面受敵」的困境中，也不能完全排除有「全軍覆沒」、或者被敵人分頭逐一消滅的可能，有如前面所述的許多托派武裝成員被消滅那樣——儘管他們的力量可能已經比初時的強大很多。

第五，在各大城市的托派成員，繼續奉行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傳統理論主張和鬥爭道路，絕大多數都在工廠產業部門中工作，一方面與工人群眾一起，團結和影響他們，爲爭取工人階級的權益而共同鬥爭，在條件具備時進行罷工，同時幫助優秀的工人參加到革命隊伍中；另一方面使非工人出身的黨員在工人環境裡學習、鍛煉，即使在最困難的情況中也起碼能保持著工人政黨的

革命核心，爲將來的興起作準備，這種努力是應予正面肯定的。〈12〉

1999年8月10日完稿

註釋：

<1>毛澤東這個講話最初發表於《七月》月刊1938年第3期，但在1981年9月20日《人民日報》重刊這個講話時，已把上引這句話刪去。

<2>見唐寶林、林茂生《陳獨秀年譜》第491頁轉引張國燾《我的回憶》第三冊第418-423頁，和王明《中共五十年》第191頁。

<3>關於盧育才的事蹟，1967年11月清華大學紅衛兵清算彭德懷的文章曾簡略地提到（但用盧義才名字）：1930年6月——9月紅軍攻打長沙，損失很大，彭德懷「反嫁禍於四師師長盧義才未完成任務，罵他是『托派』，後槍斃了他。」（見明報月刊社出版的《中共文革資料彙編》第三集《彭德懷問題專輯》382頁）

<4>關於當時的困難、危險情形，陳碧蘭的《我的回憶》第27章《日美戰爭和我們的地下工作》，有詳細的敘述。

<5>也有傳說，陳仲禧是被鄉中的土豪劣紳或中共份子所殺。

<6>參見寧廣居、寧耀東、盧漢宗、盧裕綽：《邕寧墟洛區民眾抗日戰鬥實錄》，載於《南寧文史資料選輯（一）》。

<7>見梁貽的《回顧》第104至108頁。

<8>關於「湖西肅托事件」，有不少刊物都先後有具體論述，例如：台灣的《共黨問題研究》第11卷第4期虔君的長文，大陸的《齊魯學刊》1983年第6期張士寶的文章。

<9>見當年的參與者趙芳舉寫的《永恒的懷念——王振華烈士生平憶略》。

<10>詳見趙芳舉寫的《重慶地區托派發動的一次轟動大西南的反特鬥爭——胡世和烈士殉職五十二週年祭》。

<11>同註（9）。另據梁貽的《回顧》第39頁的註指出：1983年8月13日北京《光明日報》和16日的上海《文匯報》，均記有王振華、黎潔霜及兩幼子被國民黨慘殺事，並尊稱爲「托派烈士」。

<12>唐寶林評述中國共產黨和中國托派三十年代「在實踐上，一方在農村鬥爭，一方在城市鬥爭，打擊的是共同的敵人，卻是互相配合的。這個觀點，由日本大阪教育大學的菊池一隆教授首先提出，很有見地。」（見《陳獨秀研究文集》第10頁）

曼德爾的向社會主義過渡的觀點

沙瑪利著

兆立譯

這篇文章將討論三個有機地聯繫的爭論：(1) 關於社會主義社會本身的爭論；(2) 關於‘向社會主義過渡’的觀念的爭論；(3) 關於(前)‘實際存在的社會主義’國家的性質、它們現在所經的轉變的性質的爭論。

首先，我要歸納一下埃內斯特·曼德爾(Ernest Mandel)多年來對於這些問題的一致的態度。然後，我要看看一些主要爭論以評估曼德爾的貢獻的長處和弱點。由於資本主義復辟的過程正在不斷的進行，他的關於所謂社會主義國家的許多看法今天可以重新加以思考，或者是定出更好型式。最後，我要站在為社會主義社會奮鬥這個更廣大的、現在是中心問題的立場，回顧這個爭論。

導言：曼德爾的一致性

曼德爾(特別是在教書的時候——我就是從他那裡學到這樣做的)時常著重馬克思主義關於建立社會主義社會的思想的、那就是關於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間的過渡社會思想的局限性。雖然馬克思可以根據他那個時代最先進的資本主義社會的知識，在《資本論》中闡述他的觀念，他拒絕憑空想出任何社會主義的‘模式’。二十世紀的馬克思主義者們不得不要在‘實際進展的過程中’對從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過渡的社會作出理論的說明，而且總是在貧窮國家，不是在發達國家這樣做的。斯大林主義，除了在內部壓制異見的馬克思主義分析以外，還增添了額外的理論困難。因此，曼德爾說，馬克思主義者，在試圖了解東歐國家的時候，面對著‘一個基本問題：需要用來分析從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移動的社會的理論骨架還沒有存在……〔因此〕要決定那一種發展是由於官僚的墮落、那一種是由於歷史的必然，是極端困難的’。他又說：‘我們知道馬克思對社會主義的看法，而且，雖然對什麼是社會主義嚴密地下個定義，是困難的，但是我們十分清楚地知道，什麼不是社會主義。’^{<1>}

曼德爾對什麼不是社會主義的觀點，幾乎終其一

生，完全是由他的這樣的信念所決定的：社會主義的意思，是直接的自我組織，根本不需要貨幣。後來關於社會主義的爭論，則證明這個‘反面定義’不是他所想像的那麼清楚。

1) 曼德爾一貫地支持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中關於社會主義的古典解釋，認為它是一個以‘生產者們的直接結合’為基礎的社會，而這些生產者會運用他們自己的直接的判斷來分派資源、組織生產和分配。廢除被資本主義市場中的商品關係所掩蓋的社會關係，明顯地是解放的社會主義方案的一個目標。這個目標時常被曼德爾定義為商品範疇的枯萎，與漸增的豐裕、漸增的自我組織有關。曼德爾在與諾夫(Alec Nove)的爭論中，將他的論點集中在他所聲稱的‘馬克思主義政治的目標——沒有商品生產的社會主義’的可行性上。^{<2>}他把實現這樣一個目標的可能性與生產力的發展聯繫在一起。

因此，依據馬克思主義的傳統，曼德爾把社會主義瞭解為：全世界工人們反抗最發達的、被明確有力地表達為一個世界制度的資本主義的產物。社會主義革命曾經在資本主義的邊緣得到勝利、但是沒有得到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革命的援助這個事實，意味著後資本主義社會不可能是‘社會主義’，這並不是斯大林主義墮落的結果，而是發展不足與孤立的結果(後兩種情況的本身是斯大林主義得以滋長的主要條件)。

2) 曼德爾的‘向社會主義過渡的社會’的觀念，是布爾什維克在1920年代的看法的延續。這個觀念是十月革命以後才開始有的。因此，它與馬克思的社會主義作為‘朝向共產主義的一個過渡’的觀念有點不同。它與在俄國奪取政權只是全球抵抗國際資本主義統治過程的第一步這個觀念有有機的聯繫。對布爾什維克而言，這個革命、這個新社會，在它們的目的上，是‘社會主義的’——在它們的社會現實上却不是。沒有發達國家的社會主義的勝利幫助，階級、不同的所有制形式、市場等的廢除，以及發展不足情況的完全改變，是不可能短時間內做到的。‘在一個國家’，在發展不足的條件下，社會主義是不可能建立起來的。但是，打破‘帝國主義鎖鏈’的最弱一環，

可以鼓勵更多的反抗，使在蘇聯開始社會主義轉變成為可能。

蘇聯就是在這樣一個準則下被認為是一個混合社會，它的動力是朝向在一個工人國家內的社會主義轉變。布爾什維克最初使用的公式有一種描述性的趨向；呈現出與（‘社會主義的’、資本主義的、小私有財產）生產關係、與所有制有關的‘種種部門’並列的景象，而所有這些部門都受到國家的管制。這個計劃本身則被冠以‘社會主義的’這個形容詞。普列奧勃拉仁斯基對過渡社會在生產力非常高的資本主義環境中的各種互相矛盾的邏輯，發展出一個全面的看法。他把它公式化為價值規律與‘社會主義積累規律’之間的矛盾。向社會主義過渡的社會不得不要實行的主要歷史任務，就是生產力的發展和社會關係的轉變。不斷革命的綱領，在民族及國際的平面上，表達了這些要實現的任務，從革命的最初條件開始，然後為未來的社會主義社會，樹立物質、經濟和文化的基礎。

曼德爾在面對著蘇維埃社會的官僚化和斯大林之宣佈社會主義能夠（且事實上已經在1936年之前）在一國之內建成時，根據以上這個理論得出他自己的分析。

曼德爾在說明（現有）過渡社會的非社會主義的特性的時候所著重指出的主要特徵，除了工人們完全沒有決定權力之外，就是貨幣、商品範疇的持續存在。與之對比，他把蘇維埃計劃對價值規律的限制和它的非商品性內容，與這些社會的非資本主義特性聯繫起來。

與其只把不同的生產關係並列起來，曼德爾越來越堅決主張分析過渡社會本身的‘特定生產關係’的必要^{<3>}：把它看為‘既非資本主義的、又非社會主義的’關係。

曼德爾不認為商品範疇、某些市場關係會在其中繼續存在的那個過渡階段是短期的，或者只局限於發展不足的國家之內。它在基本上與生產力的發展不足有關，如果與仍要在世界規模上加以滿足的需要比較的話。

沿著與普列奧勃拉仁斯基一樣的思路，曼德爾因此堅決主張：只要世界還沒有達到豐裕的地步，你就得忍受各種互相矛盾的邏輯。他更時常用計劃的邏輯和仍然存在的市場（世界市場、消費品市場等等）的邏輯之間的衝突這個公式來表達它；或者用‘資產階級分配標準’（按勞分配）與計劃邏輯之間的衝突來表達它。

因為社會主義轉變的問題不是（並且將不會）只

在短期（在革命時期）之中提出，曼德爾堅決主張物質獎勵的必要性，而且在這同時著重指出貨幣獎勵可能會產生的矛盾。^{<4>}因此，他著重那些能夠激勵集體行為、改進工作條件、教育及責任感的獎勵。

3)十月革命的墮落導致曼德爾試圖了解另一個與工人國家的官僚化有關的剝削和異化的根源：計劃本身能夠隱藏剝削和異化的社會關係。這些關係，事實上是在曼德爾分析為容易直接去計劃的（即貨幣不扮演積極角色的）那些生產部門存在的。曼德爾對官僚層的分析，著重於權力委託和分工在被政治條件所加劇的發展不足國家中所產生的影響。這個對工人國家官僚化的分析，加強了他的理論觀點和政治結論。他著重指出，只有工人們的自我活動和自我組織，才有可能使國家的枯萎、市場的枯萎成為到達社會主義未來的先決條件。

根據曼德爾的強烈的唯物論的信念，克服商品關係和克服官僚統治之所以受到限制，根源於生產力的發展不足。但是，曼德爾的政治立場，使他抵制了‘歷史唯物論’的單向推行動的、宿命論的版本。生產力的發展不足，既不意味著抗拒官僚墮落是不可能的，也不意味抗拒市場關係必定會佔優勢。他反對貝特蘭（Charles Bettelheim），就是站在這些基地上，就是建基於對這些特定的社會的生產關係進行一個具體的、理論的分析：那就是，不但對在每個工廠的平面上的、而且對工廠與工廠之間的社會生產關係，進行具體的理論分析。^{<5>}

曼德爾與普列奧勃拉仁斯基一樣（以後與布魯斯一樣），認為‘市場範疇’（價格、工資等等）的存在與價值規律的主宰之間有一個基本的分別，前者並不是後者的‘證明’。因此，他對貨幣（及價格）在不同經濟部門中的角色，作出分析，並且提出理由證明，儘管在計劃制度中有各種官僚特徵和浪費，勞動在其中仍然有起直接作用的社會特性。他所依據的理由，主要是：你不能用市場的‘制裁’（破產、失業）來對付壞的計劃。官僚計劃的主要特徵是質量差或者使用價值的生產不足。

托洛茨基的預測

馬克思主義者對蘇聯及類似社會的性質的爭論，是沿著這些思路發展的。他們也不得不評估托洛茨基的預測：特定的官僚生產模式在歷史上是不會有位置的。雖然托洛茨基留給後人去回答官僚層之轉變為一個階級的假設（如果它能夠摧毀工人的反抗能力的話），他卻提出了，不是社會主義的、反官僚的革命，

就是資本主義的復辟這個基本抉擇：不是這個、就是那個會快速發生。

官僚統治在地域上的擴張和相對的長期間，使得要麼主張官僚層是世界資產階級統治的直接工具、要麼主張它能夠（或者已經）結晶為一個新階級的分析有了可信度。

曼德爾一貫反對這種論點，他的論據是：官僚墮落——以及甚至反革命——並沒有廢止（反而甚至加強）這些社會的非資本主義面貌，也不能夠摧毀工人對官僚獨裁的反抗。它意味著托洛茨基的基本抉擇仍然被提出來，雖然這個決定被多擱置了幾十年。曼德爾試圖分析為什麼它能夠懸而未決了這麼多年。但是，他時常再三地解釋，在歷史的時間（階級本身能夠鞏固起來所需要的時間）中，幾十年並不算長；而且他提出理由證明，資本主義的反革命一定要摧毀這個國家、損害工人，這兩件事都沒有在1980年代以前發生。

在國際平面上，曼德爾強調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特殊性：一方面，這個戰爭是在工人階級的局部失敗中終結的；但是，另一方面，它是處在法西斯主義的失敗、革命（向南斯拉夫、中國）的擴張、日益增高的工人階級活動的一般骨架中。工人們的抵抗能力並沒有被破壞，即使他們缺乏主觀能力使階級鬥爭有堅持不懈的社會主義動力。‘民主資產階級’和斯大林主義的反法西斯主義同盟，在一段時期之內鞏固了雙方的政權，但是受到強大的工人階級壓力。後一點不得不要被戰後的資本主義制度和工人國家的官僚層考慮在內。這一點在曼德爾對晚期資本主義、官僚改革的了解中，扮演主要的角色。這些特點，在曼德爾的分析中，增強了工人階級在兩條陣線上抵抗的主題：既反對資本主義、又反對官僚層的‘三角鬥爭’的論點。但是在這裡是沒有對稱的：蘇聯式的社會的擴張仍在過渡社會的概念骨架中被分析，即使向社會主義的過渡被認為是被阻礙了。在曼德爾的過渡社會的定義中，其主要的特色並不是這些社會的動力（朝向什麼的過渡？），而是這些社會的‘既非/又非’的性質：它們在階級統治方面的未決定性。曼德爾認為它們仍然既不是社會主義的、也不是資本主義的、也不是穩定的。那就是說，不管這些社會的混雜性質，在各種堅持不懈的生產邏輯之間、在世界資產階級與工人們之間的基本階級對抗，仍然是主要關鍵：要麼會有資本主義的復辟，要麼會有‘政治革命’。

那個‘政治革命’可能會是什麼樣的呢？曼德爾說，這個觀念的‘不明確’……不是在於‘政治革命’這個詞語上，而是在於工人國家的政治革命的奇特性上，在這裡，根據定義，工人國家，即使是官僚化了

的，也是一個有獨特的經濟重量的國家。因此，甚至一個“純粹是政治性”的革命（不管這個觀念有多荒謬），明顯地會有比資產階級政治革命的社會經濟影響無限大的社會經濟影響。資產階級政治革命頂多把資產階級中的另一派系來代替當政的一派……〔而在官僚化工人國家的〕政治革命可能只是：生產者、勞動者的群眾，以民主選出的工人會議的權力形式。即蘇維埃，來接收國家、經濟和社會活動各部門的管理。<6>

因此，‘政治革命’這個公式，是與統治官僚層和國家的特性描寫有關聯的。

‘墮落的工人國家’這個公式，是托洛茨基在分析‘被背叛的革命’時發展出來的。它表達了一個矛盾的、結合以下幾個特色的現實：

1) 斯大林主義是一個‘政治反革命’。這個政治反革命不僅僅、或者主要地鞏固了斯大林的統治，而且使一個通過黨/國家來保衛它自己的特殊物質利益的官僚層結晶化了；這個國家‘官僚地墮落了’。社會的社會主義轉變被阻礙了，除非有一個新的工人暴動、一個反官僚的‘政治革命’發生。

2) 但是，這個國家仍然被定性為工人階級的國家，第一，因為還沒有發生一次社會反革命、一次資本主義復辟；第二，因為官僚層份還沒有穩定到在一個特定的生產模式中有一個獨立的地位。它代表工人——而且在他們受損害的情況下——而統治。

曼德爾對蘇維埃國家的社會性質的分析，是在這個骨架中培育起來的。它是與他對那個國家的官僚層的分析——以及他對工人階級的情況的評估——有關聯的。根據曼德爾的了解，官僚層把‘蘇聯社會中所有以這種或那種方法享受特權的層份’包括在內。

‘因為官僚層並不擁有生產資料，所以它全無例外地根據按勞計酬制(exclusively as a function of remuneration for its labour-power)而參加國民收入的分配’。官僚們‘並不僅僅是工人們的子女，而甚至是前工人們自己’。他們是‘工人階級的小部份’。<7>

工人們不但沒有在官僚獨裁之下受到削弱，反而在數量上、質素上（技術水平的日益增加）有了發展。因此，曼德爾著重指出：

……這個情況的一個基本的似非而是的地方是：工人階級在所有官方宣傳上被宣佈為統治階級，在實際上卻毫無任何政治權利。在這同時，雖然工人階級沒有參加經濟、國家的管理，然而它的確掌握實際上的權力和權利。<8>

控制工作節律的權力和文化的、社會的權利，都是工人們的收穫，才可能使官僚統治被假馬克思主義者合法化為‘社會主義’。

最後，根據曼德爾說：

“……‘官僚化工人國家’這個公式是指馬克思主義國家理論的準則。就馬克思主義而論，沒有一個超越階級之上的國家這種東西。國家是為某一階級的歷史利益而服務的。……到目前為止，這個國家已經阻止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權力的恢復。”

“……只有在這個意義上，我們才用‘工人的’這個形容詞。……在保持某種在歷史上與某一社會階級的利益有關聯的社會經濟結構，與在一個社會階級本身所認為和要處於的社會地位的意義上保護它的眼前及日常的利益之間，有一個非常大的分別。”<9>

但是，官僚的統治不是穩定的。曼德爾在分析這些社會的‘發展規律’的時候，着重指出以下這兩方面的基本矛盾：在一方面，因資本主義統治的廢除、計劃的建立而來的發展潛力；在另一方面，官僚的保守主義。後者被看成為對生產力發展的日益增大的障礙。不管官僚層怎樣試圖改革和穩定它的統治，它永遠不能克服‘外延積累’（extensive accumulation）〔只靠增加勞動者的數量、不以提高他們的勞動生產力而得到的積累。與之對立的內涵積累（intensive accumulation）則指只靠提高勞動者的勞動生產力、不以增加其數量而得到的積累。——譯者註〕這個特徵。那是因為兩個被曼德爾所著重指出的主要矛盾：

第一，……在官僚層自己的物質利益與經濟增長的完善化之間鍛造一個合理的聯繫，是不可能的。第二，要直接生產者自己克服對生產的相對的漠不關心，也是沒有辦法的。<10>

第一個‘障礙物’，只能用資本主義私有化來克服；第二個，只能用工人的政治革命。

曼德爾，跟托洛茨基一樣，著重這個事實：一部份官僚層，‘特別是它的“經理”一層’，企圖通過資本主義復辟來穩固它的特權。

但是，在所有這些傾向能夠導向真正的資本主義復辟之前，他們會不得不要壓服主要部份的國家機構中反對這個趨勢的人們的反抗。這個，附帶說一句，是我們不顧所有反工人階級措施、完全缺乏直接的工人階級權力、或者甚至政治權利、仍然使用‘墮落的工人國家’這個科學公式來描述蘇聯的客觀辯解。甚至更重要的是，他們會不得不要壓服無產階級本身的反抗，因為，在這樣一個資本主義復辟過程中，這個階級會損失很多東西，特別是從工人階級的觀點看來，毫無疑問會失去十月革命仍然遺留的主要戰利品：一種工作保障，它的質素比在資本主義所存在的質素更高。<11>

在曼德爾的以上分析中，明顯地有一個預測的錯誤。但是，這個錯誤在什麼地方？它與他對斯大林主

義的全盤了解有什麼關係？換句話說，自從斯大林以來的官僚層畢竟是一個國家資產階級或者一個新階級嗎？或者，在1980年代的時候，階級鬥爭的動力有一個歷史性的轉變嗎？在那個特定的國際環境中，這個制度的危機以及所有革命經驗的危機，將工人們、官僚們之試圖保衛他們的利益的方法，到底改變到什麼程度？如果那是低估（或者估計得不好）（因為我認為它是這樣子的），那末在這個觀念被提出的方式中，也有什麼東西不清楚或者錯了。這些都是下面將要討論的東西。

大多數曼德爾所參加的、關於蘇聯社會的動力的爭論，可以根據正在發生的轉變，直接加以評估。其他的則超出了這個試驗的範圍，雖然它們明顯地深受它的影響。它們關係到社會主義方案本身。對這些主要的爭論製訂一個平衡表、估計曼德爾的長處和短處，是可能的。

1. 關於‘過渡社會’的爭論： 資本主義復辟的檢驗標準

所謂社會主義國家的崩潰和被稱為‘向市場過渡’的過程，有許多東西可以告訴我們。它應該有助於克服一些先前的爭論的僵化，而且也許可以幫助我們作出更有系統的闡述。不管（或者因為）新自由主義政策的災難社會效果及斯大林主義所留下的可怕的遺產，我們在柏林牆倒塌了六年多的今天，必須利用我們在‘向資本主義的過渡’中到目前為止已經走過的短短路程。

對正在進行的資本主義復辟過程寫出一篇有系統的分析報告，就會超過這篇文章的範圍。<12>那樣做就需要引用關於目前局勢的許多數字、對所有有關的國家採取比較的態度，而曼德爾所參與的主要爭論以及大多數關於所謂社會主義國家的性質的討論，都集中在前蘇聯上。這裡，現在的東西只用來澄清過去的東西，而整個討論將主要地集中在蘇聯上。

不過，為了總結關鍵性的東西，這裡必須著重某些共同特徵、共同困難。

在1980年代的末期，人們可能有這個印象，認為一黨制度的崩潰、資本主義的復辟是一個難以相信地容易的過程。這些國家的人民沒有什麼東西可以損失的觀念被加強了。工人們不願意保衛的‘官僚化工人國家’——官僚們也不願意。與曼德爾的期望剛好相反，前特權層中的主要層份甚至在朝向私有化的轉變中，扮演一個決定性角色。但是主要的教訓倒是資本主義復辟是一個困難的過程。對於人民在這個過程中

會損失很多東西這個事實，現在不再有任何懷疑了。在那些過渡過程最‘前進’、最‘成功’的地方——立陶宛、波蘭、匈牙利、保加利亞——人民已經以選出與過去有某些連續性的政黨來自由地表達他們的幻滅。可是倒回過去是不會了。波蘭或匈牙利的‘前共產黨的’新社會民主黨人，都不準備阻止他們的國家與世界資本主義制度融合。甚至俄國的爭權鬥爭，選擇什麼形式的資本主義——為誰的利益——的成份，多過選擇真正對立的方案的成份。但是，如果我們回顧整個過程，反對一黨制度的各種不同的人民民主形式的確存在，但是從下而上的、支持明確的復辟主義綱領的革命是沒有的。唯一局部的例外是德國統一。但是能夠使整個東歐融入資本主義秩序、又能替其付賬的西德是沒有的。

不管在捷克共和國也好、俄國也好，都宣佈‘私有化’或多或少地完成了。可是，在這些宣佈的背後，這個復辟過程卻缺乏資本、缺乏社會基礎。它不是一個以已經存在的資產階級為基礎的有機過程。

這就意味著，我們正面對一個絕對新的歷史經驗。這在實際上與這些社會在復辟之前的特性有關。有些分析家不願意稱它們為‘後資本主義’社會，因為‘前資本主義’和半封建的市場生產形式的因子都還存在。但是，第一，不像反封建的資產階級革命時期，今天有一個世界資本主義制度，在地球的每個角落，都有它的機構。那是今天的復辟主義過程中的一個主要因素。第二，在蘇聯，工業代表國民生產的最大部份。它僱用了大群的享有工作保障的工人。所有這些特徵，接近‘後資本主義’現實的成份，遠遠多過接近封建的成份。

我講了以上這些話的目的，是要避免過份抽象的爭論。

不管用什麼概念來描述前蘇聯，為要了解真正的社會關係，我們需要——現在仍然需要——看看這個概念的背後、經濟範疇的背後、計劃的背後，正像在西方，我們需要看看市場的背後一樣，以了解真正的社會關係。這就是我在這裡所關心的地方。只有在這樣一個基礎上，我們才能夠搞清楚各種不同的概念的效用。

我將討論以下的關於正在進行的‘向市場過渡’的問題和關於這些社會的性質的爭論：（1）在資本主義復辟的經驗光照下的國家資本主義理論；（2）‘新階級’理論；（3）需要1989-1991年的歷史性轉折點的理由；（4）‘軟性’反革命；（5）在過渡社會中的國家的性質。討論了這些問題之後，我將轉到重新思考、重新用公式表示關於社會主義的爭論的問題。

1.1 關於國家資本主義理論和蘇維埃式社會的經濟範疇的爭論<13>

儘管‘國家資本主義’理論不難解釋為什麼舊的官僚統治層在進行着復辟的過程中扮演一個主要角色（‘它已經是一個資產階級’）這個事實，並沒有幫助我們了解這個前制度的特定的非資本主義特徵。因此，它並沒有幫助我們了解什麼是起關鍵作用的東西；它並沒有澄清我們正在面對的歷史性轉折點。似非而是的是，附帶說一句，它並沒有幫助我們了解，為什麼最有可能成為事實的資本主義復辟形式是國家資本主義。這樣一個概念，必定要與資本主義制度的主要特徵、社會關係和剝削機制，有點關係。那在今天，是以必須（從資產階級的觀點來看）破壞以前制度這種方式而被提出的。那是世界資產階級（通過它的‘專家’和機構：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歐洲聯盟）正在自覺進行的工作。世界資產階級正在發現的，卻是這個實行方案的困難和高成本。

今日資本主義復辟的現實

資本主義國家（例如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的法國）的國有化幫助私有部門增加利潤；這個做法從來不意味著限制私有財產的權利。那並不是蘇聯的動力。還有，在‘實際存在的資本主義社會’中，國有化工業部門之在某一時間、某一地點被私有化，是因為在那個時候、那個地方的市場競爭的條件下，私有資本會有較高的效率。無論如何，不管是在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或在它們的邊緣地帶，例如拉丁美洲，私有化是在有資本市場、資本主義金融機構等等的市場經濟中發生的。這決不是前蘇聯的情況。在東歐、特別是在前蘇聯成問題的是，整個工業的主要部份在市場的條件下是無利可賺的，它的私有化、資本市場的創立和工人們之被轉變為‘自由’勞動者。換句話說，成問題的是，如何（重新）建立所有能夠使貨幣變成資本、資本主義市場標準和規章運轉的社會關係和機構。國家資本主義理論就不可能解釋這點。

托尼·克利夫（Tony Cliff）在過去的主要論點是，世界資本主義市場強制規定蘇聯投資的邏輯。其實，倒轉過來說才是真的。蘇聯可以保護它自己不受世界市場的干涉達幾十年之久，而它主要地是由於阻止它購買戰略性技術的種種抵制，才被迫這樣做的。輸入政策，是由經濟互助委員會的分工和東歐國家——但不是蘇聯——在1970年代的開放給外國信貸和輸入所形成的。這些國家在1980年代的債務危機（因蘇聯的支持和經互會的價格制度而緩和了一段時間）、軍備

競賽對蘇聯的直接衝擊，在它們本身制度的內在矛盾正在增加的時刻，在性質上增加了世界資本主義對這些社會的影響。俄國將其經濟開放給直接的世界市場壓力，主要地是作為它的復辟主義政府的‘電震治療’的一部份。這個外債在1990年代有了戲劇性的增加。

換句話說，我們今天可以聯繫復辟主義的背景來說明世界市場在俄國經濟中的直接角色。這在從斯大林鞏固權力到1980年代的這段時期，並不是如此的。開放俄國給世界市場的結果（開放其他東歐國家的結果也一樣），已經是一個大災禍。與‘國家資本主義’的說法完全相反，這讓我們評價一下在過去那個壓力不起作用的時候，情況會是怎麼樣。

但是，這並不是這個故事的結束。單單根據世界資本主義的壓力，就來定義一個社會為資本主義，明顯地是不充足的。我必須對現有的內部機制、社會關係和市場機構作出具體的分析，因為通過這些機制、關係和機構，這個壓力才被施加、資本主義關係才能得到分析。資本主義的剝削並不是唯一的、歷史的剝削形式，那就是說，並不是被特定社會層份或階級侵吞剩餘物的唯一的、歷史的形式。在資本主義制度中，侵吞剩餘物必須採取剩餘價值的形式、利潤的形式；貨幣必須能夠通過特定的生產關係、所有制關係，產生出更多的貨幣。

這是蘇聯的情況嗎？如果官僚層在前蘇聯已經是一個資產階級，為什麼在那裡建立市場規則、建立一個資本市場是如此困難呢？為什麼外在的、從世界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機構）而來的壓力不足以重新建立價值規律的統治？就目前而論，它在俄國還沒有適當地運轉。

我們可以從‘向市場經濟過渡’這個明確的綱領中清楚地看到過去在蘇聯防止資本主義規則指導投資方向的是一些什麼東西：<14>

- 在計劃部門，貨幣是一個（壞的、而且有點被動的）工具，只被用來作為一個結算單位（即使它被稱為‘盧布’，你除了當它被分配為工資的時候以外，不能用它來買任何東西）。

- 在1980年代以前，工廠沒有真正的賬，因為沒有真正的‘成本’測量。<15>

- 經理（或者其他私人）不能買、賣生產資料、原料或工廠。

- 工廠不能破產。

- 沒有資本市場，沒有在私人資本和利潤的基礎上運轉的銀行制度。

- 工人們在巨大的工廠中廣泛地‘社會主義化’了。這些工廠不但給他們工作與工資，而且給他們各

種各樣的貨物與服務、公寓房間、兒童保育，甚至於醫院、學校和度假中心。這些社會環節曾經（而且仍然）是阻止勞動力自由流動的主要力量。它們之被引進，是因為經理們要不惜任何代價保持他們所需要的勞動力。常常是整個鎮，如果不是整個區域，是圍繞著那些巨大的聯合企業而建築起來的。

- 價格是根據計劃機構的社會或經濟目標而定出的，並不反映成本或供求的壓力。

- 沒有‘真正的所有人’。官僚們的行為是與他們既不是生產資料的集體‘所有人’、又不是生產資料的私人‘所有人’這個事實一致的。他們為了保持他們的特權，所以不計成本地去生產。工人們也不是具有控制和決定權的‘真正所有人’。不負責任，就是因這種異化所付的代價。

正如‘電震治療’的著名提倡人、哈佛大學教授薩克斯（Jettroy Sachs）清楚地說過，私有化的用意，一是打破非資本主義的制度，二是強加適合於市場行為準則的新社會關係。

曼德爾的分析的最大強點就在這裡：前蘇聯的生產資料的非商品性質，計劃在於以使用價值為基礎的主要特點那樣，‘貨幣’在計劃部門過程的‘被動角色’。這在價格變化所產生的非常有限的重整中，仍然全都可以看得見。大工廠與大工廠之間的以貨易貨的關係，巨大的工廠內部的債務，在生產戲劇性地下降的背景下的有限度失業：這些全是意義重大的方法來逃避信貸制度的壓力；逃避與價值規律有關的社會關係。私有化過程中的主要困難，是缺乏資本——這也意味著缺乏‘真正資產階級’將資本帶來。那就是為什麼私有化常常是就法律的意義而言的（在俄國，最常見的策略曾經是將所有權轉移給包括經理在內的工廠‘集體’）、沒有重整的而且在經理們與工人們之間的行為和關係上沒有真正的變化。

這被像薩皮爾（Jasques Sapir）（貝特蘭的一位前支持者）那樣的人們對俄國社會中（在1995年）仍然佔主導地位的‘非市場’現實所作的具體分析所證實：

“在俄國，經濟彈性的缺乏包括勞動力在內，因為公司是經濟整合的地方。勞動者的社會收益必須由公司提供資金，而且成為固定資本的一部份。……從1988年開始對工資基金的中央控制的解體促進了勞動者在公司內的權力的肯定。到了1991年底，真正平均工資比1987年水平高了一倍。” <16>

後來，他又說：

“市場基礎結構的不發達，不管是物質上的或是機制上的，不是阻止調解機制的運轉，就是使它發生相反的效果。……支付危機的浮現反映了技術上和體

制上都有較大的僵化情況的存在：生產制度不能適應遊戲規律的瞬時轉變。”<17>

最後，在‘任何市場行為準則的因素的缺乏’的標題之下，薩皮爾繼續說：

“考慮到市場行為準則的條件的缺乏，另一個極重要因素在於公司在舊蘇維埃制度中所扮演的社會角色。公司不只是人們工作、拿工資的地方；它們在社會規劃中扮演重大的角色，對地方的基礎結構作出決定性的貢獻（房屋、托兒中心、醫療室）。這一點不只對它們的財務是一件拖後腿的事，也使個別或集體的解僱非常難以實行。……這個制度的自動分解替鞏固公司管理部門與地方精英之間的關係製造了條件。……因此，使任何種類的破產法生效，至少在短期之內，是不可能的。”<18>

由於地區與地區之間、工業與工業之間（以及不同東歐國家之間）的差異，市場規則的真正復辟的程度也有差異。但是，著重指出捷克共和國這個在向資本主義過渡的過程中‘最先進的’國家的，是所謂‘大規模私有化’背後的銀行制度的、非常相似的重整問題和深刻弱點，會引起興趣的。Parrbas銀行發表的一份分析報告說：

“……田園詩般成功過渡的圖畫仍然隱藏了好幾個重大的、與重整中公司的延遲和銀行制度的弱點有關的結構問題。……1991年發動的私有化過程，從幾乎不存在的私有部門開始，已把私有部門在國內生產總值中所佔的成份，從1990年的4%增加到今天的幾乎70%。……但是陪伴著它的，常常只是這個過程的形式部份〔即在兩次不同的浪潮中允許捷克公民變成股東的那個‘大私有化’過程〕。即在兩次不同的浪潮中允許捷克公民變成股東的那個。一旦這些股份被各個投資基金所分，這些基金卻常常不能夠對公司實施真正的控制。在這同時，大的國有銀行，由於其中的大部份管理投資基金（通過這些基金，它們控制幾乎70%的新發行股票），卻一方面成為股東，另一方面成為私有化公司的債權人，這就解釋了少量的破產。此外，經濟改革常常還沒有開始，很多公司也沒有真正開始重整過程。在這同時，私有化合同常常包括‘反解僱’的條款。……附帶說一句，銀行部門仍然是最常見到經濟計劃的痕跡的地方：極多公司的資產負債表上有可疑的負債項目。”<19>

市場行為準則的不平衡發展，是從經濟的以前結構上、小商品生產的角色上、工廠的大小上、不同工業在市場競爭中的位置上等等的變化而來的。曼德爾使用了方法上的各種特點來著重指出：像工資、價格那樣的‘商品範疇’的存在，並不證明市場規則正在起作用。曼德爾的這些方法論上的特點，對於分析資

本主義復辟程度的不平衡性，仍然有用。

‘官僚化工人國家’的公式，對復辟主義過程的支持者對舊制度的‘批評’，作出回應：

1) ‘太多保護’、‘工人的特權’、‘平等主義’、‘懶惰的工人’。這與市場行為準則的廢止、官僚剝削形式的限制、官僚統治的代表工人、犧牲工人的特徵、對礦工比對醫生有利的工資結構、工人對工作節奏的控制——但是也與不負責任、異化等等有一些關係。

2) ‘沒有真正的所有主’。

a) 普通人民，特別是工人，一向強烈地反對‘官僚統治層的私有化’。他們認為這種私有化是搶劫，是一種非法的私佔。他們從來沒有認為官僚是所有主；甚至國家也未被認為是所有主。財產被期望是（而且被認為是）‘屬於社會的’。‘大規模私有化’的目的之一，是為了回應大眾要求社會所有制的私有化應該公正。你怎樣能夠解釋、了解那點，如果官僚們是真正的‘集體所有主’？過去是沒有股份、沒有財產給官僚們轉移給他們的子女。所以他們現在要私有化。

b) 各種自由主義的‘財產權’理論都證實曼德爾所說的、官僚們的行為在缺乏真正所有權（財產的控制、傳代等等）的情況中的合理性。新自由主義者的結論是，需要私有化；我們的結論是，需要真正的社會化，那就是由社會來控制。但是雙方的診斷是一樣的，因為官僚們不是真正的所有主（他們沒有私人積累權，沒有僱用、解僱工人的自由，沒有購買或關閉工廠的權利），他們對有效率的生產不感興趣。他們唯一的興趣是得到更好、更多的缺乏貨品和服務——那是消費者的思想邏輯。

但是，曼德爾的論點中也有一些弱點——以及一個預測的錯誤。那就需要解釋。

1) 因為他要避免讓官僚層是一個階級的這種分析有可信性，他常常拒絕承認官僚們的確享有與他們在生產關係中的地位有關的特權（對一部份剩餘品有特定形式的私人佔有）。事實上，在他們在生產圈子中的功能與他們的特權之間，有一個特定的聯繫。它是在計劃的實施由非生產的方法來支配的環境中真正所有制（和控制）的一個局部、不完全、不確定的形式。

官僚們不能拿利潤來投資。所以，他們的收入採取工資和容易得到特殊貨品、商店、汽車、公寓、旅行機會等等的形式。可是，這些物質特權當然與他們在生產過程中的功能有關。那個功能並不是資本主義的功能，但是它確實存在。他們可以保護、改進他們的地位和特權，如果他們實現計劃的目標（或者超過它們）——沒有引起工人的不安寧；他們的職位任命

是靠政治的標準。因為官僚們沒有合法的所有權，而且是代表工人而統治的，他們比資產階級之懼怕真正工會更懼怕工人的不安寧（不管缺乏任何自我組織的權利）。如果他們被認為要對不安寧負責任，他們就可以簡單地被解僱，而且在一夜之間失去一切。那就是為什麼工人的不安寧和罷工威脅，甚至於在沒有任何罷工權利的情況下，是如此有效。〈20〉這導致官僚們著迷於計劃在形式上的實現——以及著迷於在得到儘可能多的資源上（特別是為了保持原有的工人數量）、在儘可能減少官方目標上、在隱瞞那些他們在生產過程中也許需要的（而且買不到的）資源上的討價還價。

貝特蘭（像‘國家資本主義’論的其他支持者一樣）著重指出地方的（部門的、地區的）經理們在計劃過程中所獲取的愈來愈大的‘討價還價權力’。他是對的。這並不意味著那裡有被市場、那就是說被市場規律和約束所連結起來的‘獨立’生產單位（在這一點上，曼德爾是對的）。但是它的確意味著，在被計劃的東西與被生產的東西之間，有愈來愈大的差距，並且意味著愈來愈大的成本和浪費。

在這個情形下，說被計劃的每樣事情，像曼德爾所說的，都‘被直接承認為社會勞動’，是正確的，但是不充分。正確的，是因為沒有破產、沒有價格上自動與浪費掛鉤的變化，在事後對被認為是‘社會必要的’‘私人勞動’量作出決定。但是，一個計劃制度在事實上需要一個‘社會必要勞動’範疇的等價物。〈21〉它在蘇聯並不存在。

2) 尤其是，曼德爾對於官僚層的主要部份之拒絕資本主義復辟的觀點，足以描述在過去幾十年中所發生的事情。首先斯大林主義的鞏固，接著官僚層統治方式的改變和改革，都是在非資本主義制度的基礎上作出的。市場的局部使用和局部私有化，一向是附屬於非資本主義財產關係的。早先（從斯大林的強迫集體化到戈爾巴喬夫的改革、至少在戈爾巴喬夫統治開始時）的官僚改革邏輯，是試圖改進這個制度的效率，並不是改變它——與今天不同。這些是官僚改革：他們使用局部的市場機制，並不使用民主。這些前後矛盾的特徵總是在官僚層內部產生分化。這些都已經被曼德爾所分析。

但是，這是不夠預測轉折點的。在持續的復辟過程中，官僚統治層的主要部份一向是直接為自己的利益而支持私有化的，而真正反對復辟過程的，是前機構的不重要部份。分化能夠發生在本土資產階級與‘買辦’資產階級之間、主張國家資本主義戰略的人們與主張立刻（不可能的）系統化的私有化的人們之間、極反對與不太反對外國統治人們之間等等。這些

困難是真實的；我在後面將會討論它們。如果三角鬥爭的形勢還存在的話，它的基底已經改變了。資產階級的一邊已被鞏固、擴大；官僚層的一邊已經衰落，失去了它的內聚性。三角形的工人一邊，在整個過程中，已經是最弱的。（我將在第3節中討論這個事情的原因。）

1.2 關於‘新階級’的爭論

曼德爾之用‘官僚化工人國家’來解釋問題，便能夠著重指出沒有一個改革曾經穩定官僚層的統治。官僚以工人的名義（但是以工人為代價）的特定統治方式，並沒有給它在生產關係中通過真正所有制而得到的獨立位置。這個官僚層，不能夠站在它的混種的非資本主義生產關係基礎上，發動階級攻勢。如果是一個‘新階級’，則它在歷史的意義上就會是非常年輕（假如它在革命之後誕生的話），而且非常脆弱。這個‘新階級’的理論必須解釋為什麼官僚層的主要部份轉向變成真正的資產階級，而‘國家資本主義’的論點卻根本不能使人了解為什麼有這樣一個轉向。從這個觀點來看，‘官僚化工人國家’的公式是比這兩個供選擇的論點更為恰當的。

曼德爾對‘官僚化工人國家’的公式的了解，有兩個成為它的組成部份的、互相關聯的偏向。在一方面，他把所有已取得的進展表現為‘十月革命的長期結果’（儘管有些進展是斯大林、赫魯曉夫等人所引進的）。在另一方面，他低估了那些恰恰是由於官僚們的引進而造成的進展的限制：充分但是壞的就業；免費但是質量愈來愈差的服務；教育與技能的增加、但是沒有思想自由等等。

結晶化官僚層對‘過渡社會’的後果是，它真正阻塞了任何向社會主義的發展。因此，如果在當初曼德爾認真地把他自己的標準當作馬克思主義的理論（保衛一個階級的歷史利益）的話，他就應該著重指出，在減弱工人們的抵抗資本主義復辟的能力上、在有利於官僚們之向資本主義的轉變上，蘇維埃國家的反工人的內容，都是佔主要位置的。那個現實解釋為什麼，當曼德爾必須澄清‘政治革命’應有的內容時，他不但描述政治革命的‘社會規模’，而且在事實上（正像我在導言中引用他的話那樣）描述真正社會主義革命的一個新階段。這與他對十月革命作為不斷革命的全球任務中的一個階段的歷史意義與極限的全面分析，是一貫的。真實的是，資本主義的統治尚未重建起來。但是，阻止資本主義的回潮，只是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的許多任務中的一個。其他的任務

已被官僚層的結晶化所阻礙。社會革命仍然是需要的。〈22〉

最後一點，我應該著重指出，那裡（至少在蘇聯）是有一個真正社會學的、朝向自我再產生官僚層的趨向的。在勃列日涅夫的強烈保守的統治下，工人向上移動進黨政機構的趨勢停頓了。官僚們的子女漸增地比其他人有更好的機會進入大學、變成官僚。那就是說，官僚層試圖穩定它自己為一個階級的動力是存在的，即使它並沒有成功。

1.3 需要一個歷史轉折點的理由 ‘三角鬥爭’形勢的變化

曼德爾對他以下的分析，並沒有作出結論：官僚層之既不能夠將它自己的物質利益與計劃的任何效率取得協調、又不能夠打破工人日益增加的被動性。官僚層的行爲和選擇（非資本主義的統治形式或者資本主義的私有化）當然與意識形態沒有關係，而完全與實用主義有關係。官僚化工人國家及其官僚統治者的危機，必須從歷史的觀點來了解。這種了解，不是以官僚層‘性質’的永久特色為基礎，而是以它在其中試圖保持其特權的那個變化中的具體歷史條件為基礎的。官僚層的特權可以有一個特定的非資本主義的泉源，一直到某一時刻。到了那個時刻，官僚層就覺得，為了它自己的利益，它必須在新環境中，轉向一個不同的邏輯。

直至1970年代中期，過渡社會與發達的資本主義社會之間的差距減少了。從那時以後，差距增大了。從70年代中期開始，這個制度之不能夠從外延的生產形式、轉移到密集的生產形式，不止是生產力進一步發展的障礙。它通過在70年代（在蘇聯的支持下）向東歐日益增加輸入的形式表現出來，在80年代引起了債務危機。

當資本主義制度本身通過新自由主義政策和激進的技術革命向工人發動強大攻擊的時候，官僚保守主義既不能夠向工人強加‘紀律’，又不能夠保持已經取得的進展，更不能進行任何技術革命。與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差距又擴大了。由於軍備競賽、較高利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直接、可見的手等等，來自世界資本主義制度的壓力更加增大了。反對任何形式福利國家的意識形態攻勢，對蘇聯及東歐的知識份子，有決定性的打擊，原因是1) 接連的改革失敗；〔2〕獨立的社會主義運動與行動之被鎮壓；〕3) 對資本主義社會中等階級層份比對蘇聯式社會的中等階級層份更有利的獎勵制度。

過渡社會的官僚們，只有在經濟增長的條件下，才能非資本主義制度的基礎上，穩定他們自己的特權。

工人反官僚革命的缺乏

雖然，曼德爾對工人力量的某些方面的敘述是對的，他對工人在同時反對官僚層和復辟過程的時候扮演獨立角色的能力，抱有太‘客觀主義’的觀點。甚至就‘客觀’的平面而言，對所分析的特定生產關係的影響，也不夠留心。

這個失敗是過去的工人鬥爭的動力所促使的：1956年的匈牙利和波蘭，總是被認為是工人鬥爭的自發邏輯是建立工人會議的明証，不管當時完全缺乏權利或組織。工人們的自我組織、自信和要求成為工廠的真正主人，是被這個制度的意識形態及被它的生產關係所刺激起來的：官僚們不是合法的所有人，他們是以工人的名義而統治的。只有各種各樣的壓制——和工人們的被動——才能夠保持那個局面。但是，在危機發生時期中，當黨領導之間的分歧公開出現的時候，工人們的要求會突然增加了。曼德爾對的地方，是着重指出一個與巨大的集中、日益增高的技能和教育，以及一旦基本需要被滿足以後的、日益增多的要求有關的力量。

不管官方為派遣蘇聯坦克而辯護的理由，這個鬥爭的動力不是資本主義的復辟。它是工廠的社會控制。也許曼德爾過高評估了這個動力。是的，當時有大規模的自我組織。但是，因為它是被蘇聯坦克或官僚統治者所擊垮，這個事實是有影響的。這一點在曼德爾的——或者我們之中任何人的——樂觀主義中並沒有被考慮在內。

他的樂觀主義因波蘭的團結工會運動而更增強了。這個團結工會運動事實上代表一個轉折點。它是以一個非常感人的工人階級動員而開始的。但是，曼德爾接受了它的非常玫瑰色的圖畫，低估了這個運動中的主觀弱點和（自我管理派和工會主義派之間、親市場的專家們和社會主義者之間的）內部矛盾。私有化並不是團結工會運動的綱領。但是它對市場問題的觀點却非常混亂。市場對工人有利嗎？對自我管理呢？或者相反地，它是使工人階級四分五裂的一個工具，正像前南斯拉夫所發生的？

不管怎樣，鎮壓再一次成為破壞大規模自我管理這個團結工會運動經驗的主要正面方面的力量。波蘭成為積聚工人階級群眾鬥爭經驗的唯一社會。

總之，曼德爾低估了整個局面的好幾個方面，以

及它們對工人的意識的影響，特別是對蘇聯工人的影響：

1) 企業之作爲工人每日生活的社會化的一個形式，以及工人與管理部門在那個平面上所建立的、反對‘中央’的、本身包含着矛盾的同盟對工人的意識和進行‘階級’鬥爭的能力的影響。

2) 工人獨立鬥爭的積累經驗的缺乏——這不但是因爲直接的鎮壓，而且正是因爲工人在這個制度中的主要抵抗形式曾經是通過在工廠平面上對工作速度工作保障的控制。波蘭的情況有點不同，其原因，一來是工人在沒有類似的鎮壓的情況下積累經驗的可能性，二來是價格市場改革突然把工人階級團結起來，反對那些在中央負責決定改變價格制度的人們。

3) 市場和在企業平面上的集體私有化形式（這兩種被視爲抵抗中央官僚權力的形式）對工人的吸引力。

4) 危機本身。這個危機增加了集體鬥爭的困難。工人怎麼能夠抗拒通貨膨脹、日益增加的失業和不同地區、工業和工廠中日益分散的局面呢？他們怎麼能夠在常常爲了掙多一點錢不得不兼兩、三份工作的情況下鬥爭呢？

5) 這樣的幻想：通過私有化和市場不會失去什麼東西的。這種幻想鼓勵了對新政策的‘等着瞧’的態度。與非資本主義生產形式有關聯的社會進展已經在1970年代、1980年代惡化了。根據新自由主義的宣傳、市場和私有化應該帶來效率和自由、不是失業和貧窮。當這個實驗完成的時候，要反對都來不及了。

6) 所有革命實驗的危機或失敗與資產階級反工人攻勢的結合的國際背景。

7) 已經被低估的（可能與某些關於社會主義的爭論有關的）‘主觀困難’。工人階級僅僅是在直接民主的基礎上對不同的剝削形式進行抗爭，就其本身而言，並不給工人更好地組織生產/分配過程的能力。一條社會的、可供選擇的道路，是一個複雜的、必須被創立的制度。工人爲了能夠抵抗資本主義的環境、參與另一個生產模式，需要（而且意識到他們需要）一個以上的激進政治先鋒隊。

1.4 ‘軟性’反革命

曼德爾的說法：資本主義的復辟需要打破現有的國家，是真實的。真實的是，鎮壓的機構必須（或多或少地）被清除。單一的黨之作爲國家統治的一個主要工具必須被打碎，而這個制度及所有經濟機構的法定架構必須被改變。也真實的是，‘政治迫害’常常發生，新的資產階級政府試圖爲他

們的機構尋找新的人員。

…但是所有這些發生在沒有暴力革命的情況中。

這有幾個理由：

• 由於先前所分析的各種理由（官僚統治制度在經濟增長一旦停止時的危機），極大部份的官僚層，爲了他們自己的利益，準備通過私有化來穩固他們的特權，或者準備爲資本主義復辟的目標而服務。一黨制掩蓋了官僚層的混雜成份。高級幹部（Nomenklatura）〔‘Nomenklatura’是俄國術語，用來描述該國由蘇聯共產黨領導圈子所任命的高級職位持有人，或者可譯爲‘權貴們’——譯者註〕只是官僚層的一部份，而且是它的唯一部份靠一張黨員証爲其晉升、飛黃騰達的一個絕對先決條件。許多‘前官僚們’比較容易地轉移立場。大量的金錢和向這個制度施加壓力的國際資產階級機構，都幫忙使這樣一個行動方針有可信性。

• 也是由於先前分析過的理由，工人們不能夠抗拒這個在意識形態（宣傳）的平面上呈現爲反官僚、主張自由、講究效率的過程。市場和私有化都是抽象的東西。抵抗的力量是分散的，大都集中在工廠的平面上。

可是，復辟主義的過程缺乏社會基礎。這就以非常特定的方式說明曼德爾的某些關於這些社會的性質的觀點。

演變的一般進程是這樣的：1) 政府內部發生了一個轉變，將其所保衛的綱領從改革這個制度轉變爲進行‘有系統的改變’；2) 國家機構、立法制度和鎮壓機器開始轉變；3) 轉變的目的是改變社會——經濟的邏輯：廢除計劃、價格改革、私有化，所有這些都是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挾着日益增大的放外債的大權）的國際壓力下進行的。

對工人大眾而言，市場規則的發展意味着社會的退步。當他們發覺這一點的時候，已經太遲了。這並不使那些提倡了這些改變（謊報它們的效果）的當政者更得人心。

官僚不反對資本主義復辟，如果它幫助他們穩固他們自己的權力或社會地位。但是，官僚爲了能夠去做它，光是轉變他們自己爲資產階級是不夠的，其理由有幾點：

• 官僚（除了一些黑手黨成員以外）不能實行‘資本的原始積累’。現在，由於貨幣功能的改變（投資、投機的可能），資本的原始積累正在發生。與此同時，資本普遍地缺乏，如果與必須私有化的相比的話：每個國家的數以千計的工廠，通常是巨大的，其總量約佔國民生產總值的多數、勞動力的多數。每一個這些國家的儲蓄金總量，相當於要私有化的工廠的總價值的百分之十至二十，如果這些工廠以最低可能的水平

來估量的話。人民有儲蓄這個事實，不一定意味着他們準備投資在這些充滿着危機的工廠上。這就是為什麼，即使所有官僚都要變成資產階級，仍然普遍地缺乏資產階級（除了靠‘它自己’譬如西德或中國海外僑民的資本而成為資產階級的那些國家以外）。

- 官僚可以找到各種各樣的方法將他們所管理工廠以很低廉的價格‘賣給’他們自己。但是，這個做法既不普遍，又不安全。還有，這樣一種‘高級幹部的私有化’，並沒有給予官僚方法（金錢、合法性和因此是權力），去轉變、重建和現代化他們的工廠、以變得具有競爭力。因此，對所有的官僚而言，資本主義復辟並不意味着穩定和社會安定。在純正市場的情況下，大多數工廠就要關門。所以有些官僚用實幹抵抗私有化，當他們的市場條件非常差勁的時候。

- 他們準備要變成‘買辦資產階級’。但是外國資本沒有湧進來。當1,500億美元已經每年被德國資產階級投資在它的新國土的時候，在1995年，只有大約200億美元已被投資在整個東、中歐（一半在匈牙利），20億美元在俄國。信用貸款是有的，但是簡直是比不上馬歇爾計劃所給的。許多官僚可以賣他們的知識（特別是他們對這個制度的知識）。但是這並不保證每個人都有工作。

- 集體私有化在一定程度上是克服貨幣的短缺、高級幹部不得人心的私有化的一個方法。它以給每個人‘票券’使得改變工廠的法律地位、正式批准私有化成為可能。這裡所指的‘票券’，是一張有小量票面價值表示‘社會財產的一部份’的紙，人民可用它來購買股票。但是，例如在捷克共和國——處於這個過渡中的‘最先進’國家——，到現在為止，工廠的重建還沒伴隨着通過票券的私有化。破產法也還沒有生效；巨大的工廠間的貸款和壞賬破壞了銀行系統的穩定；私有化了的工廠沒有清楚的‘所有主’（除了在銀行背後的國家以外）。甚至股票集中在一個銀行或者大工廠的一個經理的手中，並沒有給他們重建它的力量。這對數以千計的工人而言，不但意味着工作的喪失，而且意味着住房、幼稚園、健康服務所等等的喪失。

- 國家本來是被用來強加市場行為準則的，但是在俄國却没有權力強加它，因為經理和工人都抗拒它。那並不意味經理們反對資本主義復辟。他們只反對犧牲他們的利益的復辟。所以他們要與國家討價還價來保護他們所經營的工業——同時為着將來增加他們的權力。那就是為什麼，在舊形式和離奇古怪的聯盟的背後，一個新的、真正的‘國家資本主義’能夠發展起來——在世界市場的真正壓力下，並且具有真正的資產階級國家的性質。這個資產階級國家，不但改變着

貨幣的角色和私有部門的角色，而且還迫着公有部門本身去進行重建。

這整個復辟過程掩蓋着斯大林主義反革命和資本主義復辟之間的不對稱。這就解釋了為什麼復辟，有一切有利的因素，仍然有困難。斯大林主義對私有制部門及對市場規律的激進的壓制，是被社會地位方面的大量向上流動所陪伴的。不管血腥的鎮壓和政治、社會方面的代價，這却使這個制度廣受歡迎。復辟的過程若要穩固它自己，必須至少要改進大部份人民的社會地位。由於實際情況一直不是這樣子，所以才有政府的不穩定、政黨繁多但無穩定的議會多數、日益增加的棄權率等等。波蘭的困難與羅馬尼亞的困難不同，匈牙利的困難與俄國的困難不同。但是政治的幻滅，在多個‘最先進’的復辟主義國家中，是在選舉上表現出來的。市場的起支配作用的影響還沒有完全被強加。資本需要貨幣和一個財政的、信用的制度。這就不生根在有機的、資本主義原始積累之中的資本主義復辟的最大弱點。

可是這個困難不是創立一個可供選擇的社會主義道路的充分條件。相反的，可供選擇的社會主義道路在國際上的弱點，幫助復辟動力的持續。

1.5 再一次討論過渡社會中的國家的社會性質

曼德爾曾經談起一個一般的馬克思主義的國家論。他這個說法也許不對。不管怎樣，關於過渡社會中的國家的這種理論是不存在的。曼德爾十分使人信服地引進了這個觀念：不管過渡社會（根據定義）不是一個穩定的‘生產方式’這個事實，它的確有‘多個生產關係’。這些生產關係涵蓋多個非常混雜的所有制形式和多個非常混雜的階級衝突的形式，一般說來，沒有任何階級有穩定的統治。無產階級的特徵是，無產階級（及其農民盟友）在奪取政權之前不是統治階級。

不斷革命的理論——那就是奪取政權之後社會主義轉變的任務的理論——可以是一個合適的骨架，用來發展出一個在向社會主義過渡的社會中包括有復辟的危險、官僚結晶化危險的國家的理論。

在這樣一個骨架中，分析這個‘過渡性國家’的矛盾的階級內容是必要的。唯一‘確定的’特色是，資產階級不再佔統治地位，因為假如它佔統治地位，或者假如它又佔統治地位，那末這個社會就不再是過渡性的了。但是，過渡性國家的‘資產階級外表’的確存在。托洛茨基着重指出了一些：一個國家以一個

分離的機構的形式而存在這個事實，以及形式上的法律平等（後一點應該加以討論）。這個國家一定會給私有財產某些保護，等等。我們也可以分析這個國家（在所有制上，在工人政黨的運轉上，在計劃制度上，在機構上等等）朝向官僚化的傾向。

社會主義的動力，只有在這個國家的‘無產階級特性’戰勝了資產階級和官僚層的反工人的特性的時候，才能夠得到保證。那末什麼是國家的無產階級性質的標準？在曼德爾的處理方法中，它是以反資本主義的特性（國有化和廢除利潤的佔主宰地位的角色）為中心。但是，那不是這個故事的終結。無產階級革命是為所有制的社會化、國家和階級的消亡而戰鬥；它應該為反對一切形式的壓迫而戰鬥。

所有這些轉變，所有這些（將被討論的）目標，都是不斷革命的任務。它們從社會主義革命的觀點來表達這個過渡的歷史功能。

這些任務的一切成就代表這個國家的無產階級特性所加強（就我已經在上面所指出的意義而言）——包括那個國家的看來並非、其實是走向消亡——以及無產階級力量的加強。

這些轉變可以從政府的平面上加以分析（當政的政黨的性質及它們的綱領）；從國家機構的平面上加以分析（國家通過自我組織、自我管理的發展而消亡）；從生產的社會關係的平面上；從所有制的社會化的平面上（不論任何形式的真正社會控制的發展）等等。

進展、後退和相互矛盾的階級邏輯能夠在所有平面上發生。奪取政權可以產生一個非常脆弱的工人國家，如果在其他的平面上（例如社會—經濟的平面上）沒有可能發生充分的轉變。但是一當它明顯地為反對資產階級統治而戰鬥，它就變成一個‘工人國家’了。從一個平行的方位來看，如果政府中的資產階級政黨不是以在工人國家的骨架中的一個折衷物而在那裡，而是能夠在復辟的方向上改變這個體制的骨架的話，它已經是一個資產階級國家了。它也許是一個脆弱的資產階級國家，如果它不能很快地找到一個社會基礎、不能夠強加利潤準則的主宰的話。我傾向於認為現在的東歐國家或多或少地是資產階級國家。但是，它們是強烈地受到強大的國際資產階級（不管它有什麼困難）、微弱的工人運動的幫忙。

2·重新思考、重新用公式表達關於社會主義的爭論

像‘社會主義’那樣的名詞已被盜竊了它們的意

義。但是人的價值和需要還沒有。正在進行中的資本主義‘全球化’更清楚地顯示，在人民不喜歡的‘主義’的背後，成問題的是什麼東西：要麼利潤的邏輯（愈來愈反對滿足基本需要），要麼滿足人類需要的邏輯（反對利潤的邏輯）。

為了教育學的理由，但是也是為了清晰起見，我們應該摒棄根據方法，不是根據目的來提出社會方案的公式。社會主義方案的目的，在今天，可以是激進的、清楚的（即使它是一個開着的方案）。方法（組織的‘模式’、如何達到那些目的、國有化的程度、計劃的任務和形式、貨幣和市場的角色）可以、必須與目的、經驗和各種有關情況相比而討論（23）。

這個問題必須是：需要怎樣能夠得到滿足？這個問題回答是比馬克思主義者們所預見的複雜一點點。但是，馬克思留下了精緻的指導原則，強調指出，每個社會都有它自己測量‘時間’的方法，而且根據它的目的安排時間，以致使生產根據全部它的需要而進行。

曼德爾是用古典方法來處理社會主義這個問題的。在他的這個處理方法中，兩個特徵常常被用來描繪那個（與‘向社會主義過渡’的概念和與‘共產主義’都不同的）社會的特性：第一個特徵是一個‘按照他或她的勞動向每個人’分配的模式；第二個特徵是經濟生活的自我組織，這種自我組織，可被解釋為商品範疇的逐漸消亡。這兩個準則都需要討論。

曼德爾為了反對諾夫（Alec Nove）的《可行的社會主義的經濟學》一書中的論點，於1986年至1988年間，在《新左派評論》這本雜誌上，就以上的第二個問題（貨幣、商品範疇的角色）有系統地發揚了他的論點。（24）我在這裡不聲稱我對那個非常重要的爭論作了一個有系統的評論，在那場爭論中，三個主要的邏輯被表達了：1）諾夫從在建立‘可行的社會主義’中馬克思關於社會主義的話語沒有一個是有用的（更壞的是，他們都是烏托邦的、誤導人的）這個信念出發，發展出一個‘市場社會主義’的模式。諾夫以對‘實際存在的社會主義社會’和對資本主義社會的分析為他自己的建議的出發點。他的模式是講究實際的，具有將它定義為社會主義的最低限度的‘準則’：對私有財產強烈的限制和有限的計劃。它的調節機制是市場。2）曼德爾保護一個在以自我組織為基礎的社會化的經濟中的、激進的、沒有貨幣的社會主義模式。埃爾森（Diane Elson）提出了一個將市場社會主義化的模式，在這個模式中，社會主義關係是作為一個控制、使用市場的方法而發展起來的。

事實上，曼德爾後來在1990年所寫的一篇文章中轉移了這個爭論的核心。所以這兩個時期必須加以區別。

‘社會主義的分配方式’

曼德爾在一些爭論中〈25〉，曾經着重指出，商品範疇在過渡時期中的殘存，是有機地與不可能在‘各盡所能、各取所需’這個口號的基礎上有條有理地進行分配聯繫在一起的。這個口號一般地是在思想上與成為‘共產主義’的特性的富裕聯繫在一起的。他也着重以個人生產力為基礎的貨幣獎勵的破壞性。〈26〉他接着堅決主張物質獎勵與以下的集體成果聯在一起、避免貨幣分配的任何增加：勞動時間的減少、工作條件的改善、社會消費的增加等等。

有幾個方面應該在這裡討論一下。

第一，過渡時期中和社會主義社會中的分配方式的規範性‘定義’並不令人信服。‘按照他或她的勞動向每個人’〔分配〕這個公式，既不是一個教條，又不是一個確切的公式。怎樣‘測量’勞動：按照它的量？它的性質及成果？它的技術水平？

在蘇聯和東歐，由於實際及意識形態的理由，不合意的、困難的體力工作，一般說來，是有得到補償的。從一個社會主義的立場看來，這似乎是合理的。

‘按照他或她的努力向每個人〔分配〕的口號也曾‘按照所負的責任的大小’（事實上官位的大小）而實施；這一點當然應該批評，即官僚的工資應該有嚴格的上限。

最後，在市場改革中，這個公式被解釋為‘按照勞動的成果’。在這裡，這個勞動成果是由市場來測量的。這就意味着，同樣的勞動量，你可以有非常不同的工資，一切由你的工廠或工業在市場中的位置來決定；這就會大大地產生了無可接受的不平等和衝突。

第二，一個與勞動分離的、按照需要來分配的準則，已在許多資本主義社會以及赫魯曉夫統治下的蘇聯和其他地方，呈現日益增大的重要性。不去擴大它是沒有理由的。

事實上，恩格爾在一封很少被人引用的信上，對馬克思關於這個問題的觀點，提供了一個有趣的解釋。他說，‘人們對於這個問題，是一反某些關於公平原則的唯心主義空話而處理得非常“唯物主義”的。…但是，合理的辯論只能是：（1）設法發現在開頭就使用的分配方式，（2）盡力找出進一步的發展將循以進行的總方向，〈27〉這是與社會主義被‘定義’為一個其分配方式早已被決定的社會這種規範性觀點大不相同。

我們的結論採取一個似非而是的說法的形式：如果社會主義的未來在貼近後資本主義社會中不存在的話，那就根本不將會有社會主義的未來。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轉變應該（再一次）被了解為一個全

球解放的運動，不應該被了解為一個明確地與‘過渡’社會不同的社會。因此，要被滿足的需要不一定要‘服從’決定論的、經濟主義的邏輯；它們一定要符合有可能鞏固人民對這樣一個方案的支持的優先考慮的事項。

方法必須與目的一致

縮短工作週、消除最精細最繁重的工作、允許訓練、教育、經理任務和悠閑的時間、向男女們提供控制影響他們的生活條件的方法——以及發展為它自己利益作決定的興趣——都能夠是非貨幣的物質獎勵的形式。這些能量和創造力的泉源，還沒有被開發利用，甚至當自我管理使它們成為真正可能的時候。

把目的本身——轉變社會關係、提高生產力來減少工作週——為一種獎勵，不是會更好嗎？重新使工人與他或她的勞動結合起來、鼓勵公眾自由地表達他們的需要和促進對獎勵本身的爭論，都會幫助丟棄這些問題的不合適的解答。

對分配網絡進行民主管理，可以把貨幣收入的增加與這個制度的一般生產力的增加連結起來；這就會激勵工人們散佈在他們的地點所達到的一切進展，促使‘成績最好’的人們與其他人協作，把他們的本領傳給別人。……這再一次提出什麼是工人們/消費者們能夠判斷這些進展和改進的最好時/空組合這個問題。他們應該在不透明的、被分隔的價值維度中測量它？或者在整個系列的社會勞動、使用價值的維度中？〈28〉

這就提出了這個制度作為一個整體的、更廣大的調節問題。

市場的角色：曼德爾與諾夫的爭論

曼德爾在《新左派評論》上與諾夫的爭論中〈29〉，以提出‘以沒有商品生產的社會為馬克思主義政治的目的’來開啓他的辯論。那麼，生產和成本——‘社會必需的’勞動——應該測量嗎？曼德爾的含蓄的回答是，這可以‘直接’測量。這就意味着按照使用價值或具體勞動——那就是不用貨幣及價格——來直接組織生產和分配。

關於全部生產和分配的直接、全面的計劃，提出托洛茨基對這樣一個嘗試的觀點，是會引起興趣的。在《危險中的蘇聯經濟》一文中，托洛茨基寫道，天下沒有一個‘萬能的頭腦’，能夠‘製訂一個沒有錯誤的、什麼都包括在內的經濟計劃，從麥田的數目開

始，一直到背心上最後一個鈕扣'。〈30〉這不是一篇'短期性'的文告，局限於評論物質相對地缺乏或生產力不發達的情況。這也不是他根據一個關於官僚層的行爲的分析報告，對斯大林主義者詳細計劃一切事情的企圖所作的批評。它是以這樣一個方案的不可能實行和以計劃經濟來回應以市場來表達需求的必要性爲基礎的。人們甚至可以堅決認爲，隨着發展，錯綜複雜的事物會更加增多，經濟的社會主義化並不消除按照價格進行經濟測量的必要。〈31〉事實上，托洛茨基的論點已被最近的科學進展所加強，因爲最近的科學證明，關於一個制度的資源和發展規律，甚至有了最好的資料，其結果仍然可以是無可預測的。

托洛茨基也着重指出這個事實：官僚層在集中它的決策權力時，已經'把它自己隔開來避免數以百萬計的關心的人民的干涉。'這就提出了這個問題的另一方面：不同選擇的可能性。對於斯大林主義的壓制市場，他提出對抗的觀念：'計劃是通過市場來控制、在很大程度上來實現的。'對他來說，要避免混亂，一個'穩固的貨幣單位'是必不可少的。托洛茨基認爲，在蘇聯的過渡時期的具體條件中，'只有通過國家計劃、市場和蘇維埃民主這三個因素的交互作用，過渡時期的經濟才能走向正確的方向。'〈32〉

曼德爾在與諾夫的辯論中，採取一個十分不同的方法來探究這個問題。以下的例子證明他怎樣把直接民主當作社會主義化經濟中的任何形式的市場的一個代替物：當作解決任何問題、包括每個人將會被允許得到的鞋子的數量和顏色在內的一般機制。

'在製造消費品的工廠中，產品混合（product mix）（即那一種產品應該生產多少）將會從工人會議與由公民群眾民主選出的消費者會議之間先前的協商而來。各種不同的模式——例如鞋子的不同樣式——可以遞交給他們，消費者們可以試驗、批評這些模式，可以以其他模式來替換。樣品陳列室和產品介紹單是上述的那個試驗的主要工具。產品介紹單可以扮演'公民複決'的角色——一位有權利每年接受六雙鞋子的消費者將會在一張包括一、二百樣供選擇的產品的介紹單上劃出六個樣品。'〈33〉

這種程序應該被用來決定在社會主義化了部門中的、工廠與工廠之間、工廠與消費者之間的生產和分配。'按照貨幣來交易的商品交換，在一方面，應該主要地局限於私人部門與合作部門的相互關係，另一方面應該主要地局限於個別消費者或者社會主義化部門。'〈34〉即使你接受曼德爾的論點：現在資本主義商品中有很多浪費、不一定要每個人都去決定一切事情、很多標準規格的产品可以事先計劃，你還得時常要化很多時間在開會上，而不是去購物、翻目錄或

查閱計算機。

這個論點，不能令人信服：

- 它的最不好的地方，就是減弱了曼德爾對於需要直接民主的、基本的和令人信服的保衛。爲細節問題而開太多次會、投太多次票，會使人民在真正需要對主要選擇作集體決策時，怯於參與。

- 貨幣和普通的買與賣的使用並不與一個計劃的效率相矛盾。它可以是精心製訂和實施它的一個工具，也可以用來檢查它的確滿足需求，不管是消費者們的需求，或者是社會主義化的工廠爲它們自己的生產而需要半成品。這就會開啓了選擇另一個供應者的可能性，如果原先的不令人滿意的話。

- 現在已經有的（而且正在資本主義的工廠中發展的），是利用新技術和計算機使生產適合直接定單的巨大可能性，因此減少了庫存物。許多選擇可以在家中作出，像通常翻目錄簿那樣，而後者可以根據個人設計在計算機上現出。用計算機來購買東西也是已經可以做到了——不過那只是用在購買方面而已。

- 也是真實的是，計算機可以大大地增加決策權下放的可能性，所用的方法可以與資源和約束的中央計量比擬。但是那仍然沒有告訴我們怎樣去計量生產（用直接勞動時間？）。

曼德爾的觀點清楚地來自他徹底反對資本主義市場中由商品關係所引起的異化。但是，批評資本主義的市場和異化，必定意味着反對貨幣和價格，還是意味着反對在它們背後的社會關係？而那些壓迫的社會關係，是與市場的存在有關係，還是與它的發號施令，包括勞動市場、資本市場的發號施令有關係？換句話說，那些壓迫的社會關係是與計量成本和需要的特定階級標準有關係嗎？

埃爾森在批評曼德爾'根據商品生產的不存在，來下社會主義的定義時，着重指出：

'馬克思的著作中的商品，基本上說來，不是一個爲貨幣而買、賣的貨物。...從馬克思的文章的結構上看來，他的意見是指不怎麼平庸的東西。商品之所以引起辯論，並不是單單由於賣與買這個事實，而且由於在使商品能夠有它們自己的獨立生存力的情況下的賣與買這個事實。就是商品的這種獨立性，才能夠使人與人之間的社會關係取得物與物之間的關係的這種想像出來的形式："人只是作爲商品的代表，因此是作爲商品的擁有人而互相存在"。'。〈35〉

這裡的關鍵問題是：'這個解釋開啓了創造這樣一個社會的可能性，在這個社會中，貨物是爲了貨幣而交換，但不具有它們自己的獨立的生存力；在這個社會中，人並不只是作爲商品的代表而互相存在'。埃爾森在她的這篇激勵的論文中分析了這個可能性，

那就是‘它並不需要買與賣的廢除，而需要買與賣的社會主義化’。〈36〉

我在《計劃、市場與民主》一書中討論同一題材時引用了貝特蘭的話。他在《經濟計算與財產形式》一書中正確地指出，過渡社會還沒有發展出‘測量社會勞動的合適概念，因為社會勞動從來沒有在體力勞動的維度中被概括過’。〈37〉他說，‘與“有用的社會效果”有關的“社會必要勞動”’在社會主義中的‘相等物尚未被發現’。我則着重指出，在過渡社會中，價格不但將會規定需要和成本被測量的方法，而且將會給社會關係下定義這個事實來與‘價值規律’形成對比。在資本主義世界，‘抽象勞動’佔首要地位，因為它是採取貨幣形式的價值的內容，而且因為如果貨幣不能造出更多貨幣，世界上就沒有資本主義。因此，‘具體勞動’和使用價值都是附屬範疇。在過渡社會中，這個對立物應該是慣常的事；但是，作合理判斷所需要的空間與時間也應該擴大，使合適計劃和社會控制成為可能。因此，我為進一步的詳細闡述建議了以下的指導原則：

‘正像商品……包含對成本、需要和社會關係這三個部門的判斷一樣，社會控制也必須擴張到這三個部門：但是記錄成本、把需要編目的技術必須附屬於總的社會選擇。’〈38〉

- 如果不反對資本市場的統治——當失業減少的時候，不反對資本市場‘作出負面反應’這種荒謬的事情；

- 如果不拒絕考慮勞動大軍為一個‘東西’，一個其成本與其他（例如機器的）成本比較的商品。工作權必須是一個起點，不是經濟受控制的方法的不確定結果；

- 如果沒有（通過男人和女人、工人和消費者、父母和子女、各種各樣的個人和社區）對每日生活和將來進行有人性的控制這個激進目標，這就意味對生活的完全改組，意味對‘必要的’勞動時間、對教育、閒暇和家務、對人的物質、文化條件、對人在生活各方面的關係、對我們與環境的關係的一個轉變；

- 如果沒有非此即彼的選擇：在工作及其組織的節律上；在為大家所滿足的需要的優先次序上；在獎勵制度上；在技術上；在團結的形式上；

- 如果不與最弱者團結、不擯棄任何部份反對整體的鬥爭；那麼，就不能夠有社會主義方案。

如果馬克思主義意味着什麼東西，它是對以下兩者的一個激進批評：

- 第一、隨着價格隱藏了以測量成本和需要的階級尺度為基礎的社會關係和選擇，價值規律在資本主義制度中以‘客觀規律’的面目出現。這也意味着只將能

由價格來表達的成本和需要考慮在內。

- 第二，為了一個所謂普遍經濟（或階級）理性而強加給人類的任何‘規範性’選擇的形式，不管是被市場或計劃所強加。

這就意味着‘價值規律’不能是社會主義社會的調節器。它也意含對於將社會關係隱藏在價格和商品關係背後的，不管是否被稱為‘社會主義的’任何‘模式’的激進批評。事實上，它反對任何試圖通過計算來給最佳效果‘下定義’的靜態模式。

這就意味着經濟的調節器不能是一個‘工具’，不管是市場本身或者計劃本身，都是這樣。計算和市場指示必須附屬於人的判斷，因為這是在理性上唯一與社會主義目標相依的‘調節器’。但是，由誰來做‘最後的判斷’，怎樣去做：由作為工人和消費者、男人和女人、個人和社區的人類。社會主義民主比先前所預見的要複雜得多。自我管理需要運用計算、市場指標的專家和持反對意見的專家。但是，為了不讓專家作最後的決定，它也需要通過保衛特定利益的政黨和群眾團體的政治爭論。為了擴大最後選擇的範圍，以上的所有這些都需要的。

因此，對於被認為是養育人類的成本，或者人類所應有的權利，必須盡可能有清晰的觀念：

- 充分就業，對資本主義社會是一個成本，對社會主義社會則是一個權利和一個更好效率的泉源。

- 經濟民主、教育和工作保障是應被資產階級減至最少的成本；在社會主義的邏輯中，它們是權利，是生產力的一個泉源。

- 在資產階級法律制度中，平等必須掩蓋、維持真正的階級和財產的不平等；在社會主義社會中，它是一個權利，這個權利需要努力和費用來真正地加以支持和保護。

需要的表示也不應該局限於貨幣或價格來表達的計量，即使我們今天知道怎樣用價格來使許多‘外在事物’‘內在化’（例如在環保政策方面）。

曼德爾的論點不能令人信服，因為他的論點傾向於將工人民主當作能夠解決所有問題的東西，不需要其他的工具及機構，包括‘社會主義化的市場’。在基本上，曼德爾所要着重的，是最後判斷必須需要工人來作出（讓我們說由作為工人及消費者的人類作出）。在這方面，他是令人信服的。

爭論的演變

1986年，曼德爾在與諾夫的爭論中着重指出：

‘目前爭論的真正關鍵，不是在於反資本主義革

命結束後的一段短時期需要依靠商品交換多久這個短期問題，而是在於社會主義本身之作爲無階級社會這個長期目標……是否值得去實現。」〈39〉

正如我們在上面所看到的，他認爲階級枯萎的過程是與商品枯萎的過程等同的（根據他的模式，後者只存在於與私有或合作社部門交換之中）。但是，曼德爾在一篇寫於1900年11月，以‘Plan ou marche, la troisieme voie’〔《計劃或市場，第三條‘道路’》〕爲題在《Critique communiste》〕《共產主義評論》上發表的文章中完全轉移了爭論的軸心，提出了以下的觀點：

‘這個爭論並不是在於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之間長長的過渡時期中人們是否仍舊能夠使用市場機制。……這個爭論是圍繞着以下問題：關於稀有資源的分配這個基本選擇是否應該由市場來作出？’〈40〉

在這裡，過渡時期——這個時期將會延續很長時間——就是這個爭論的視域。在過渡社會中，曼德爾一向是贊成使用某種市場標準，而且爭辯說，市場範疇的存在和使用並不證明市場資本主義關係佔優勢。那明顯地是埃爾森賴以形成她的研究態度的更精緻的問題。這個問題就是，根據貨幣的不同功能來使用貨幣時，促使它的使用的動力將會是什麼。

根據曼德爾的新公式，‘爭論的關鍵問題’在於：市場是否應該決定主要的‘選擇’？這個答案明顯地是‘不’。‘優先次序’必須要由‘工人/消費者/公民在一起民主地作出，從幾個有一貫性的不同方案中選出’〈41〉。但是到那時這個爭論不再是同樣了。曼德爾以一個更令人信服的方式展現出一個區別事物的標準：

‘限制消費者去自由選擇是沒有理由的。所有這些應該被擴張，不應該被限制。……假定在從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的過渡時期中貨幣的使用（這需要一個穩定的貨幣）和市場的使用，主要是爲了保證消費者的更大的滿足，應該被放在一邊或者甚至被減少，也是沒有理由的。唯一的條件是，它不應該讓市場來決定社會、經濟選擇的優先次序。……’

‘貨幣之作爲記帳的單位要與其作爲交換的工具有所分別，更要與其作爲積累財富、作出選擇和投資決定的方法有所分別。’

‘第一個用法將會在社會主義計劃中持續而且被一般化。第二個用法已經開始在資本主義之下衰退，而且會繼續在過渡時期中衰退，除了某些貨物與服務以外。貨幣的第三種用法應該嚴格地被限制而且逐漸地被消除。’〈42〉

這個問題，特別是不但在消費品部門，而且在製造生產資料的工廠中的計劃形式，明顯地仍然需要進

一步的討論。曼德爾一直很反對生產單位的‘自治’和任何形式的企業自籌資金。另一方面也是在這個領域，不同種類的‘市場社會主義’有非常不同的邏輯；主要是以下兩方面的競爭。在一方面，有獨立的（具有或多或少程度的工人自管的）單位和銀行，以獲利爲基礎；在另一方面，有埃爾森所建議的、沒有資本市場的‘社會主義化市場’和計劃，它的邏輯是鼓勵有系統的結合，不是‘掠奪成性的’競爭。

南斯拉夫經驗了計劃、市場和自我管理這三者之間的非常不同的、在這個制度的政治範圍之內的結合。（初期的）自我管理與官僚或技術官僚的計劃之間的衝突及（後期的）自我管理與市場邏輯之間的衝突却值得研究。我已經研究了這些矛盾〈43〉，因爲我與諾夫都有這樣的信念：我們能夠從所謂‘社會主義的’國家的具體分析中學到比從馬克思那裡更多的東西，如果你在馬克思那裡所尋找的是社會主義的具體模式的話。但是，爲了能夠根據經驗來判斷，你需要多種標準。諾夫對蘇聯、對南斯拉夫的改革制度所作的非常有趣的結算表，是以排斥馬克思主義標準爲基礎的。工人的自我組織和消除異化並沒有在他的模式中扮演任何角色。我也試圖從南斯拉夫所累積的‘多個模式’（四十年中四個不同模式）中作出結算表、汲取教訓。但是我是用與諾夫不同的‘景象’作出的。我試圖揭露工人自管的合理性，運用馬克思的指導原則——工人、公民解放的標準——對此事作出一個結算表。這就引導傾向埃爾森的觀點（及曼德爾的信念），多於諾夫的模式。

利用市場，不應該意味着放棄馬克思主義對市場背後所發生的事情的態度，也不意味着對市場之作爲一個中立的工具有天真的看法。這樣一個天真看法會導致接受它（市場）的發號施令。這在一個資本主義環境及一個私有資本主義所有權仍舊存在的過渡社會中更是真實。通過市場、價格，不同的效率標準在相互衝突。這是在目前的‘全球化資本主義’中被價值規律所決定的世界市場價格背後的一個問題。一個已被証實的事實是，最有壓制性的社會關係多半是‘最有競爭性的’：他們將會對任何以開始進行社會主義轉變爲目的的社會行使他們的壓力。這裡，我要再說一句，爲了要對最大程度、最好形式的‘進步保護主義’作出估計，以致只要資本主義存在一天與它勉強保持必要的、但是有衝突的關係，透明度是必需的。

最後，讓我們着重指出曼德爾的結論。曼德爾在1990年寫的（上面已經引用過的）文章的結尾，丟掉了某種閱讀馬克思的方法。

‘事實上，建立無階級社會的最有效力、最人道的的方法是通過實驗，而且它必須通過連續近似值的方法而得到改進。做這個工作是没有一本好“食譜”的——“全盤計劃”、“市場社會主義”都是沒有用的。’（44）

他接着爭辯地認為，我們一定要運用托洛茨基所明確指明的三個要素（計劃、市場和民主），同時加了第四個要素：徹底減少勞動時間，因要使工人有時間進行直接民主，這是一個非常緊要的措施。

如果我們回憶我此文的序言中引用了曼德爾關於馬克思主義向社會主義過渡的想法的局限性，以上所引的曼德爾的最後文句，讀起來像一種遺言——及修正。從最初的文句到這個最後文句，曼德爾似乎確信什麼不是社會主義：使用商品的社會。他在最後讓那個爭論開着——雖然他不明確地承認，他已經改變立場。必須承認，這不是進行爭論的最好方法。但是，這比完全不能改變立場好得多。

這也是比改變基本的原則立場好得多。這個基本的原則立場是：進行一場解放鬥爭的必要性和可能性。這場解放鬥爭是以人類在他們的生活的各個領域中及在世界規模上的自我組織、消除異化和負責狀態為基礎的。這些就是曼德爾的信念和他的出名的樂觀主義和激進主義的基礎。

註釋：

〈1〉埃內斯特·曼德爾，《什麼是官僚層？》，收集在Tariq Ali所編的《斯大林主義的遺產：它對二十世紀世界政治的衝擊》，Harmonds Worth 1984年，第78頁。

〈2〉曼德爾，《保衛社會主義計劃》，《New Left Review》[新左派評論]第159期，1986年9/10月號，第5頁。

〈3〉見例如曼德爾與Hillel Ticktin爭論的文章《再次討論托洛茨基主義關於蘇聯的社會性質的定義》，《Critique》[批判]雜誌，第12期，1979—1980秋/冬季號，第117—126頁。

〈4〉見例如曼德爾關於古巴的爭論文章《工人國家的經濟中的自我管理和投資的價值規律：關於在古巴討論問題的一些意見》，《World Outlook》[世界展望]1963年。

〈5〉見Bertram Silverman所編的、1971年紐約版的《古巴的人與社會主義：大辯論》中曼德爾的文章《過渡時期的商業範疇》；及曼德爾的1968年倫敦版的《馬克思主義經濟理論》的第二卷、第16章《過渡時期的經濟》。

〈6〉曼德爾，《東方的過渡政權》在《Revolutionary Marxism Today》[今日的革命馬克思主義]，倫敦1979年，第151—152頁。

〈7〉同上書，第142—143頁。

〈8〉同上書，第138—139頁。

〈9〉同上書，第145—147頁。

〈10〉同上書，第148頁。

〈11〉同上書，第150頁。

〈12〉見Henri Wilno寫的《東歐：困難的資本主義》一文。該文收集在1991年9月份的《Critique Communiste》[《共產主義評論》]第112—113期。我為了對這個必要的分析作一點貢獻，寫了‘La “transition” dans tous ses etats’ [‘在所有這些國家的“過渡”’]登在1995年2月份的《Inprecor》[《國際新聞通訊》]第388期上。該文的英文節錄以《五年來的東歐和前蘇聯：東方的經濟改革》為題登在1995年2月份的《International Viewpoint》[《國際觀點》]第264期上。

〈13〉見曼德爾與Chist Harman合著的《國際資本主義的謬論》。

〈14〉見沙瑪利的《在官僚集中化計劃之下的社會關係》一文。該文是國際研究與教育研究所（IIRE）的學習與研究筆記本第718號《計劃、市場與民主：所謂社會主義國家的經驗》（阿姆斯特丹1988年版）的一部份。

〈15〉說這樣一個制度是任何東西、但是不說它是資本主義，並不意味着它是好的制度。貝特蘭在《經濟計算與財產形式》（紐約1974年）一書中提出了有關於在一個向社會主義過渡的社會中的計算的必要與困難的主要問題。

〈16〉見薩皮爾在Victor Santer、薩皮爾合編的《Monnaie et Finances dans la transition en Russie》[《俄國在過渡中的貨幣與財政》]（巴黎1995年版）一書中的文章，第72—73頁。

〈17〉同上，第257—258頁。

〈18〉同上，第263—264頁。

〈19〉《局面》，1996年5月，第10頁。

〈20〉見沙瑪利的《計劃、市場和民主》。

〈21〉見 Gerard Roland 在他的巴黎 1989 年版的《Economie politique du systeme sovietique》〔《從蘇維埃制度而來的政治經濟學》〕一書中關於這一點的有趣評論和觀念建議。

〈22〉好幾年前，我用「反工人的工人國家」這個挑撥性的題目寫了一篇與人辯論的文章。它不僅僅是一個挑撥。我將會在第 1.4 節中回到那個爭論。

〈23〉見 Maxime Durand 關於這些爭論的文章：「Planification : 21 theses pour ouvrir le debat」〔策劃：為展開爭論而設的 21 個提綱〕，《Critique Communiste》〔《共產主義評論》〕，第 106—107 期，1991 年四、五月號。

〈24〉Alec Nove, 《The Economics of Feasible Socialism》〔《可行的社會主義的經濟學》〕，倫敦 1983 年版。

〈25〉見，例如，曼德爾的「Mercantile Categories in the Period of Transition」〔「過渡時期中幾個與商業有關的範疇」〕。

〈26〉曼德爾在 1970 年 9 月份的《第四國際》（法文版）第 45 期上的「Du “nouveau” surla question de la nature de l'URSS」〔《蘇聯的性質問題上的“新東西”》〕。

〈27〉恩格斯於 1890 年 5 月 8 日致康·施米特的信。〔這段文字的中譯文錄自 1972 年 5 月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四卷，第 475 頁。〕

〈28〉沙瑪利的《Plan, Market and Democracy》〔《計劃、市場與民主》〕第 56 頁。

〈29〉曼德爾在 1986 年 9/10 號的《新左評》第 159 期上的《In Defence of socialist Planning》〔《保衛社會主義計劃》〕；諾夫 (Alec Nove) 在 1987 年 1/2 月號的《新左評》第 161 期上的《Market and Socialism》〔《市場與社會主義》〕；曼德爾在 1988 年 5/6 月號的《新左評》第 169 期上的《The Myth of Market Socialism》〔《市場社會主義的神話》〕。

〈30〉見 1972 年紐約版的《Writing of Leon Trotsky (1932)》〔《托洛茨基文集 (1932 年)》〕上托洛茨基的《The Soviet Economy in Danger》〔《危險中的蘇聯經濟》〕 (1932 年 10 月 22 日)，第 274 頁。

〈31〉貝特蘭 (Charles Bettelheim) 在巴黎 1949 年版的《Problemes theoriques et partiques de la planification》〔《計劃的理論和實踐的問題》〕一書上以及以後的像《Economie Calculation and Form of Property》〔《經濟計標的需要意味着社會主義計劃中價格不能被廢止。像這樣子的問題需要特別的討論。〕

〈32〉托洛茨基，《危險中的蘇聯經濟》，第 274—5 頁。

〈33〉曼德爾，《保衛社會主義計劃》，第 27—8 頁。

〈34〉全上，第 32 頁。

〈35〉見埃爾森 (Diana Elson) 在 1988 年 11/12 號的《新左評》 (第 172 期) 上的「Market Socialism or Socialization of the Market?」〔「市場社會主義還是市場的社會主義化?」〕一文，第 4 頁。

〈36〉同上。

〈37〉原文在貝特蘭的《經濟計算與財產形式》的第 11 頁。我在《計劃、市場與民主》的第 56 頁引用了這段句子 (我在這裡改正了該書的英譯本中譯錯的地方)。

〈38〉沙瑪利，《計劃、市場與民主》，第 58 頁。(加重線是原文有的)。

〈39〉曼德爾，《保衛社會主義計劃》，第 9 頁 (着重線由本文作者所加)。

〈40〉曼德爾，《計劃或市場，第三條道路》《共產主義評論》，第 106—107 期，1991 年四、五月號 (着重線由本文作者所加)。《共產主義評論》上也登載了好幾篇爭辯由 Tony Andreani 所提議的模式的文章。Tony Andreani 的這個提議發表在該刊第 116—117 期、1992 年二、三月號的「Pour un socialisme associatif」〔《為一個聯合的社會主義》〕。也見 J. Vanek 的《由勞工所管理的經濟：論文》，1977 年 Ithaca 出版。

〈41〉曼德爾，《計劃或市場》，第 16 頁。

〈42〉同上文，第 20—21 頁 (着重線由本文作者所加)。

〈43〉沙瑪利，《Le Marcho contre l'autogestion : l'esp'eriencce yougoslave》〔《與工人管理背道而馳的市場：南斯拉夫的經驗》〕，1988 年巴黎出版。

〈44〉曼德爾，「計劃或市場」，第 21 頁 (着重線由本文作者所加)。

〔這篇文章原載於 Gilbert Achcar 所編輯的《The legacy of Ernest Mandel》(《埃內斯特·曼德爾的遺產》)(紐約 1997 年版)一書中。〕

Capitalism in China Today

Zhang Kai

In recent years, China is restoring capitalism. On 25 February 2005, the State Council issued a document "On encouraging and supporting individually or privately run business in the non-public sector" (*Wen Hui Bao*, 28 February 2005). From then onwards, private enterprises have started to take over the sectors of heavy industries, infrastructure and public services. Statistics show that among 27% sectors, private enterprises constitute over 50%, and some even over 70%. According to *China Market Economy Development Report 2005*, conducted by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China has been further integrated into the global market economy system after its accession to the WTO. The report further stated that China's marketization index was 69% in 2001, 72.8% in 2002 and 73.8% in 2003.

One of the means of accumulating capital used by private entrepreneurs is to bribe government officials or management of state-owned enterprises, for the purpose of buying national assets at a cheap price. According to some official research institutes, national assets of around 40 billion yuan (USD 1 = RMB 8.2 yuan) every year have been lost (*Apple Daily*, 17 August 2005, quoting *China Economics Times*). Private capital has speedily expanded under the existing market economy system. According to Wenzhou branch of People's Bank of China in Zhejiang Province, the scale of private loan has reached 41 billion yuan at the end of 2004. Expansion of private capital has led to rampant usury. Wenzhou City government announced that if any interest rate of personal loan was four times more than what People's Bank of China regulated, it was defined as an illegal usury. Moreover, the local government claimed that they would continue to tackle with the expanding underground financial activities.

On the other hand, disputes on land and property between people and local governments have increased. The Property Law of the Constitution clearly states that private property must be protected, however, in reality, people's land and property are always seized by local governments with little compensation, which is much less than the actual value of their possessions. Worse still, the Supreme People's Court announced that starting from 11 August 2005, all courts at different levels will no longer handle any civil lawsuit of demolition and compensation. In other words, if the people are not satisfied with official arrangement and compensation, they can just complain but get no legal support (*Apple Daily*, 13 August 2005).

Nowadays China still claims that public ownership is the main body of national economy. Yet this cannot be applied to state enterprises. Chen Qingtai, the Deputy Director of the Development Research Center of the State Council, disclosed that state enterprises have undergone the second reform that they would be wholly listed to the stock market. Chen estimated that the proportion of state capital in GDP would gradually decrease, from one-third to 20% (*Wen Hui Bao*, 30 May 2005). As Leon Trotsky remarks, state ownership is the primary condition of the workers' state. Based on Trotsky's point of view, due to the decline of state ownership, China is actually restoring capitalism. Furthermore, in June 2005, Li Rongrong, the Director of the State-owned Assets Supervision and Administrative Commission of the State Council, pointed out that half of the state-owned enterprises had gone into bankruptcy. Now the number of state-owned enterprises is 150,000, of which the medium and small scale is 147,000, the large scale is only 3000.

Shortly after 1949, China carried out the planned economy, which was nonetheless formulated and controlled by bureaucrats, but not by the working people. The last two decades of economic reform has led to overheated economic growth. Recently China has adopted macroeconomic control policy to solve the problem, but there are loopholes in national investment and production plan, for example, non-public enterprises have borrowed a total of 3,000 billion yuan of loans from banks. Wang Jian, the Deputy-Secretary General of the Association of Macroeconomics of the National Development and Reform Commission, explained, "according to the statistics, in the whole investment of 2004, 65% came from non-public enterprises. In the first quarter of 2005, it increased to 70%. Non-public enterprises have taken away bank loans. If they have any problem, such as they cannot sell their products and cannot repay the loans, our government will no longer be able to help them. If this happens, the enterprises will surely go into bankruptcy and our banking system will be much affected. Overproduction may become widespread. In the coming years, China may have to confront this issue which is the real challenge to the macro-economic control policy".

Now the wholly owned foreign enterprises are allowed to run business, which constitutes 65% of foreign investment in China and dominates the market. In 2004, the products of foreign enterprises constitute 55% of

export industries, particularly dominating the high-tech industries (Yu Yang's "China, whose economy is on the rise?", quoted in *Wen Hui Bao*, 29 March 2005). In addition, China provides foreign companies a lot of privileges, for example, the actual tax rate is merely 11%, whereas for domestic companies it is around 23%. According to Zeng Puiyan, the Deputy Premier of the State Council, two-thirds of foreign companies have earned great profits in China. As the statistics show, from 1990 to 2004, foreign investors have sent around 250 billion yuan of remittance out of China (*Wen Hui Bao*, 9 September 2005).

While China goes capitalist, the people have generally become selfish and money-minded. Officials and capitalists have complicity in taking over public property through illegal means. Peasants and workers therefore suffered a lot. This can be shown in the following examples: (1) Workers' life and health are in danger. Factory owners always force workers to work under dangerous working conditions. This has led to a lot of cases of death and casualties. A recent typical case is Xingning Coal Mine of Guangdong Province. The local officials were offered bribe from the coal mine owners to allow miners to work underground, even though experts warned that there would be serious leakage. Eventually, 123 coal miners died. And in Shanxi Province, due to heavy mining, one-seventh of the ground has been emptied and may collapse, which endangers the lives of millions of people (*Ming Po*, 28 August 2005). (2). Capitalists exploit the nature just for making profits. They produce toxic wastes and pollute air and water. People cannot drink clean water any more. Ecology is totally in crisis. (3) Capitalists produce fake and toxic food products. They irrigate the land with polluted water, and put banned industrial additives into food products. This greatly do harm to people's health. (4) After the medical reform, public hospitals force people to pay expensive fees for medical treatment and medicine. Research shows that 50% of patients are too poor to see a doctor, whereas 30% are unable to receive treatment in hospital even though they are in desperate need. In the countryside, among the children who died of illness, half are too poor to get medical treatment. (5) Universities, secondary schools and primary schools illegally collect extra school fees. Over the past ten years, a total of 200 billion yuan has been illegally collected. Just in 2003, over 2.1 billion yuan have been illegally collected. In 2004, secondary and primary education has become no. 2 of the top ten profitable sectors, just after property and estates. And the medical one sector ranks no. 8 (*Ming Po*, 21 February and 3 September 2005).

According to the statistics given by the 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me, the Gini coefficient of China is 0.45. The poorest 20% of the whole population constitutes only 4.7% of income or consumption. In

contrast, the richest 20% of the population occupies 50% of income or consumption. The Ministry of Labor and Social Security recently warned that the gap between the rich and the poor has reached the serious "yellow" sign. It will turn to the dangerous "red" sign if the situation becomes worse in five years (*Ming Po*, 20 September 2005). The State Statistics Bureau estimates that the annual income of urban people will be over 10,000 yuan. In contrast, rural people have only an annual income of 2,936 yuan. The former even has 8-9% growth but the latter has only 4-5% growth every year.

China going on to capitalism has caused high unemployment, expensive medical system, coercive demolition, landlessness, and others. There are widespread grievances among people. Many have come together to protest and demonstrate. In mid July 2005, Zhou Yongkang, a Politburo Member of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CP, expressed worriedly that mass incidents have already affected social stability. The number of mass incidents increased from 10,000 in 1994 to 74,000 in 2004. And the number of involved people also increased from 730,000 to 3,760,000 (He Yang's article quoted in *Apple Daily*, 25 July 2005).

Because of public pressure, the media also generate debates on the state enterprises reform. According to Yao Zhongqiu, a researcher of Cathay Institute for Public Affairs in Beijing, the dispute between Lang Xianping and Gu Chujun in 2004 has generated heated debates about the state enterprise reform. Lang proudly claimed that 95% of people in the internet supported him. This clearly shows that most people oppose the reform because they consider that the drain and loss of state enterprises are due to corrupt officials and greedy private entrepreneurs.

Recently the failure of medical marketization reform has become the focus point of criticisms. The formal report of the Development Research Center of the State Council concludes,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door policy, China's medical system ... has disclosed more and more serious problems. On the whole, the medical reform is unsuccessful." Actually, many officials from the Health Bureau have already negated the medical marketization reform in the internal discussions since the end of 2004 (*Apple Daily*, 17 August 2005).

The CCP leadership still controls the power of drafting and implementing the national policies. The people, including producers and consumers, have no power. Only if people resist, seize the power, and remove the autocratic bureaucracy, can the wrong policies be fundamentally corrected and the rights of the people be safeguarded.

18 October 2005

歡·迎·郵·購

香港郵政總局信箱10144 號

中國革命問題

彭述之選集第一卷	彭述之著	30元
彭述之選集第二卷	彭述之著	45元
彭述之選集第三卷	彭述之著	35元
中國第二次革命的前因後果 ——評張國燾的《我的回憶》	彭述之著	6元
毛澤東思想論稿	雙山著	30元
毛澤東思想與中蘇關係	雙山著	15元
論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	雙山著	4元
印支問題	雙山著	3元
毛澤東以後的中國	伊文思著	3元
斯大林與中國革命	托洛茨基著	4元
中國革命底總結與前瞻	托洛茨基著	6元
托洛茨基檔案中致中國同志的信	托洛茨基著	10元
托洛茨基致中國托派的信	托洛茨基著	4元

馬克思主義經濟理論

資本主義發展的長波	曼德爾著	8元
從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過渡諸問題	曼德爾著	30元
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導論	曼德爾著	8元
過渡時期的經濟	曼德爾著	8元
過渡時期的社會和經濟	曼德爾著	20元
關於過渡社會的理論	曼德爾著	10元
晚期資本主義	曼德爾著	45元
從斯大林主義到歐洲共產主義	曼德爾著	24元

托洛茨基著作

托洛茨基文集	托洛茨基著	40元
斯大林評傳	托洛茨基著	30元
托洛茨基自傳	托洛茨基著	25元
被背叛的革命	托洛茨基著	40元
過渡綱領	托洛茨基著	9元
論蘇聯的國家性質	托洛茨基著	22元
蘇聯的歷史大冤獄	托洛茨基著	5元
文學與革命	托洛茨基著	25元
十月教訓	托洛茨基著	10元
他們的道德與我們的道德	托洛茨基著	5元
論學生與知識份子	托洛茨基著	3元
熱月反動	托洛茨基著	3元
新路向	托洛茨基著	5元
流亡日記三種	托洛茨基著	5元
戰爭與第四國際	托洛茨基著	5元

第四國際簡史	法蘭克著	14元
古巴革命戰爭的回憶	格瓦拉著	20元
匈牙利悲劇	弗萊雅著	8元
1968年法國革命	南燦譯	18元
鄭超麟回憶錄	鄭超麟著	20元
雙山回憶錄	王凡西著	20元
我的回憶	陳碧蘭著	30元
記尹寬	鄭超麟著	40元
馬克思主義與第四國際	曼德爾著	30元
第四國際文獻（第一卷）	兆立譯	40元
第四國際文獻（第二卷）	兆立譯	40元
第四國際文獻（第三卷）	兆立譯	40元
先知三部曲（托洛茨基傳）3卷集	多伊徹著	100元
從蘇聯歸來	紀德著	12元
史事與回憶（3卷集）	鄭超麟著	200元
托洛茨基及其思想研究（第一卷）	劉家良等著	30元
托洛茨基及其思想研究（第二卷）	曼德爾等著	30元
香港的前途與社會主義運動	新苗	10元
論基本法與政制改革	新苗	10元
香港人的出路：爭取民主收回主權	新苗	10元
八九民運的回顧與前瞻	新苗	10元
從官僚社會主義到官僚資本主義	向青、劉宇凡著	70元
論中國官僚社會主義	向青著	40元
台灣人民怎樣選擇	新苗	20元
新婦女論	柯俞泰著	54元
苦口詩詞草	謝山著	30元

十月評論

October Review

第32卷第2/3期（總第219期）

2005年11月30日出版

出版 / 編輯 / 承印：<十月評論>編輯委員會

通訊處：香港郵政總局信箱10144號

電話：9846 3428 傳真：3494 1762

Address：G.P.O. BOX 10144 HONG KONG

Tel.No.：(852) 9846 3428 Fax：(852) 3494 1762

E-mail Address：october_review@yahoo.com

【十月評論內一切具名文章，不一定代表編輯部立場】

Address：G.P.O. BOX 10144 Hong Kong Website：http://www.october_review.org/

香港	2 堅拒政改方案 齊心爭得普選.....本刊評論員
	3 歡迎各國民間組織來港反世貿！.....微波
	4 阻止當局偷聽竊密 維護市民私隱等權利.....振言
中國	5 中國的生態危機——兼論現政權的性質.....喬治·菲殊著...兆立譯
	8 資本主義在今日中國.....張開
	13 中國——資本主義的超級強國？.....吉爾伯特·艾其卡爾著...王敬澤譯
	14 史學界平反「中國托派是漢奸」錯案.....軍行
國際	16 關於委內瑞拉的決議.....第四國際著...兆立譯
	17 拉美的盧拉和查韋斯的兩極化.....薩巴多著...兆立譯
	18 九月二十四日的舊金山反戰遊行.....趙京
	19 美帝的一次慘敗：西貢的陷落.....史密斯著...兆立譯
	20 解放三十年以後的越南 ——法籍越南裔社會活動家段的訪問錄.....兆立譯
回憶	23 憶籍雲龍.....李平
	24 附錄：老問題的新發展.....竹雲龍
歷史	25 中國托派對抗戰的主張和行動.....張開
理論	35 曼德爾關於向社會主義過渡的理論.....沙瑪利著...兆立譯
英譯	53 Capitalism in China Today.....Zhang Kai

OCTOBER REVIEW VOL.32 ISSUE 2/3 2005.11.30

Hong Kong

- 2 Be determined to reject political reform proposal and fight for universal suffrage...October Review Commentator
3 Welcome the international civil society to Hong Kong against WTO.....Wei Bo
4 To prevent the authorities' wiretapping and defend people's privacy rights.....Zhen Yan

China

- 5 A massive destruction of nature: China's ecological crisis.....George Fish...(tr.) Zhao Li
8 Capitalism in China today.....Zhang Kai
13 China—capitalist superpower?.....Gilbert Achcar...(tr.) Zhao Li
14 Historians righting the wrong case alleging Chinese Trotskyists as spies.....Jun Xing

International

- 16 Resolution on Venezuela.....Fourth International...(tr.) Zhao Li
17 Polarization: Lula and Chavez in Latin America.....François Sabado...(tr.) Zhao Li
18 Anti-war demonstration in Los Angeles on 24 September.....Zhao Jing
19 Thirty years ago: the fall of Saigon.....Mussay Smith...(tr.) Zhao Li
20 Vietnam: 30 years after.....Tuan...(tr.) Zhao Li

Memory

- 23 In memory of Ji Yunlong.....Li Ping
24 Appendix: new development of old problem.....Zhu Yunlong

History

- 25 Chinese Trotskyists' positions and actions for anti-Japanese war.....Zhang Kai

Theory

- 35 Ernest Mandel's views on the transition to socialism.....C. Samary...(tr.) Zhao Li

Article in English

- 53 Capitalism in China today.....Zhang Kai